



第七十六届会议

议程项目 131

调查导致达格·哈马舍尔德及其 随行人员罹难的原因和情况

2022 年 8 月 25 日秘书长给大会主席的信

谨提及大会关于调查 1961 年 9 月 17 日午夜至 18 日凌晨前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及其 SE-BDY 号飞机随行人员罹难的原因和情况的第 74/248 号决议。

根据第 74/248 号决议第 1 段，2020 年 3 月，我再次任命穆罕默德·钱德·奥斯曼为知名人士，继续负责审查收到的资料和会员国、包括个人和私营实体可能提供的新资料，以评估其证明价值，并从已经进行的调查中得出结论。由于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大会在我的支持下，于 2020 年 12 月决定延长知名人士的任期，并请我在第七十六届会议结束前向大会报告所取得的进展。

我记得，我之前曾分别根据大会第 72/252 和 71/260 号决议于 2018 年和 2017 年连续任命奥斯曼先生为知名人士，并在 2019 年(A/73/973)和 2017 年(A/71/1042)向大会报告了取得的进展。我还记得，我在此之前任命奥斯曼先生为根据大会第 69/246 号决议设立的独立专家小组负责人。

我再次向知名人士深表谢意。联合国感谢他在追查关于这一死难事件的全部真相方面所做的堪称楷模的重要工作。

令我感到鼓舞的是，知名人士收到了重要的新信息，并在审查数千页记录及法证检验和咨询专家后，掌握了更多相关情况。我注意到这些新信息包括下列领域：会员国很可能截获了相关通信；加丹加武装部队或其他方面对 SE-BDY 航班发动可能袭击的能力；该地区有外国准军事人员和情报人员；与 1961 年的背景和周围事件相关的更多新信息。

同 2019 年报告中一样，知名人士评估认为，外部攻击或威胁仍有可能是坠机的原因。我注意到知名人士的结论，即目前根据现已掌握但不完整的信息就死难事件的原因作出结论是不合理的。与此同时，令我感到鼓舞的是，知名人士的



结论是，鉴于证据越来越多，解释那个灾难性夜晚发生的事情的假说现在只剩下有限的几个。

我谨感谢会员国、会员国为审查其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而任命的独立高级官员(独立任用人员)以及私人 and 实体与知名人士合作并愿意提供更多信息。

令我感到鼓舞的是，关键会员国在高级别承诺充分合作，并保证检索请求有或将会有适当的安全、情报和国防机构参与，一些会员国的独立任用人员已经并可能在今后提供更多信息。我还对私人 and 非政府实体向知名人士提供的重要信息感到鼓舞。

与此同时，知名人士指出：(a) 自 2017 年年中以来，关键会员国没有提供任何重要信息；(b) 几乎可以肯定存在更多的相关信息，包括无线电或其他通信；(c) 会员国尚未履行举证责任，以证明它们已对其记录和档案进行了全面审查，从而作出充分披露；(d) 独立任用人员可能需要更多时间来提供信息；(e) 在已证明几乎肯定存在可能的重要信息的情况下，在没有掌握所有这些信息时就得出结论既不明智，也不负责任。

因此，我支持知名人士的建议，即联合国任命一名独立人士，继续按照知名人士目前的任务规定开展工作。我还支持知名人士的建议，即再次敦促关键会员国任命或重新任命独立任用人员，以确定其安全、情报和国防档案中是否存在相关信息。广而言之，我促请会员国在死难事件发生 60 多年后，确保全面查阅所有档案的途径并提供相关信息，并同意知名人士的提议，即向会员国提供可能的披露方式和保密条件，而不一定要求全面或公开披露相关信息。

我还支持知名人士的建议，即鼓励所有会员国向独立人士提供协助，包括法证分析或其他研究。

最后，我支持知名人士的建议，即联合国继续致力于通过一个专门的在线资料集公开达格·哈马舍尔德调查获得的关键文件，包括与 1961 年联合国调查委员会、2013 年哈马舍尔德委员会、2015 年联合国独立专家小组以及知名人士 2017 年和 2019 年报告及本份报告有关的文件。

带着新的紧迫感找寻 1961 年那个灾难性夜晚所发生的全部真相，仍然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为了达格·哈马舍尔德及其随行人员和他们各自的家人，我们必须这样做。为了联合国，我们也要这样做。我把这当作我们的庄严责任，我会尽我所能支持这项工作。

我促请大会继续处理此事，并核可上述知名人士的报告及其建议。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签名)

2022 年 7 月 26 日根据大会第 74/248 号决议任命的知名人士给秘书长的信

我谨作为根据大会第 74/248 号决议再次任命的知名人士提交报告，说明导致前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及其随行人员罹难的原因和情况，以及我的主要调查结果、结论和建议。

2020 年 3 月，很荣幸根据第 74/248 号决议我再次被任命为知名人士。在这项任命之前，我被任命担任处理同一专题的类似职位，首先是 2015 年根据大会第 69/246 号决议任命的独立专家小组主席，然后是 2017 年和 2018/19 年任命的知名人士(以下统称为达格·哈马舍尔德调查)。

根据大会第 74/248 号决议规定的当前授权任务，我继续请会员国公布其拥有的任何相关记录，并确保它们对其档案和记录进行了全面审查。正如我的报告所详述的那样，我评估了所收到的新资料的证明价值，其中大部分来自个人和非政府实体。

按照授权，我还试图从已经进行的调查中得出结论。与 2019 年一样，我的评估是，外部攻击或威胁仍有可能是坠机的原因。然而，根据目前可获得但并不完整的资料就得出关于这一死难事件原因的结论是不合理的。这是因为似乎由会员国创建或持有的重要信息仍未披露。我在本报告中进一步讨论了这一点。

在程序方面，大会第 74/248 号决议实施了一个旨在便利会员国披露相关信息的机制。因此，正如我在本报告中所述，在 2020 年 3 月及其后，我向在 2019 年确定的四个关键会员国发出了提供信息的请求，大会敦促这些会员国进一步参与披露相关记录的进程：俄罗斯联邦、南非、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从 2020 年到 2022 年，我还与比利时、刚果共和国、埃塞俄比亚、法国、德国、瑞典、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等其他会员国通信并寻求协助。我很高兴得到一些前述国家和其他会员国的大力合作。

我在 2020 年至 2022 年期间从上述四个关键会员国收到的答复摘要如下：

关于俄罗斯联邦，我感谢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上诉分庭前法官巴赫季亚尔·图兹穆哈梅多夫在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中协调进行的审查。尽管那次审查没有查明相关材料，但目前没有收到任何其他信息表明，俄罗斯档案中很可能存有未披露的具体材料。

关于南非，我感谢收到国际关系与合作部长的答复。然而，截至编写本报告之时，我尚未收到任何新的资料或对我所确定的事项的具体答复。

关于联合王国，我感谢外交和联邦事务部一名高级敏感性审查员和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答复。然而，虽然对我确定的事项提供了一些答复，但我没有收到任何文件或其他记录形式的新资料，无论是在 2018/19 年度期间，还是在 2020 年至 2022 年期间。

关于美国，我感谢美国国务院主管国际组织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的答复。我没有收到对我所确定的事项的具体答复。除了我在 2018/19 年度收到的一份文件外，我的确在 2021 年收到了两份公开的文件。

在审议了关键会员国的答复并注意到它们在 2020 年至 2022 年期间没有提供任何重大信息后，我认为仍有必要进一步开展合作和进行披露。2017 年和 2019 年报告的结论是，举证责任已转移到某些会员国，以表明它们对其保管或拥有的记录和档案进行了全面审查。我谨此提出，对记录和档案进行全面审查以便作出充分披露的举证责任目前尚未得到履行。事实上，根据当前授权任务从其他来源收到的信息突出显示，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会员国创建、持有或以其他方式知道关于这一死难事件原因的具体和重要信息。这一信息尚未披露。

作为这类信息的具体例子，历史记录表明，会员国知道或通过其情报人员和机构生成了信息，提到这些信息的说法已被公开或保存在私人档案中。会员国截获了敏感通信，包括联合国的通信，并部署了大量情报人员，他们密切参与了哈马舍尔德一行人在遇难时正前往参加的灾难性会议的周遭事件和与之有关联的事件。在意识到秘书长坐机坠毁时，必定生成和分享了使用情报资产和来源的机密报告。尽管如此，这些或类似来源的文件尚未披露。尽管会员国自己的调查和前情报人员已公开证实，他们当时在有关区域开展了具体行动，以支持他们在这一时期的政治目标，但情况仍是如此。

尽管如此，仍然有各种积极的事态发展值得指出，我对此表示赞赏。南非、联合王国和美国都在高级别上承诺充分合作，并保证检索请求已经或将涉及适当的安全、情报和国防机构。此外，在 2022 年，联合王国几年来首次对提供信息的具体请求作出了一些回应。所作的表示是，这种合作可能会继续下去，具体的询问可能会得到充分答复。

除了会员国的行动外，个人和非政府实体的努力在 2020 年至 2022 年期间继续沿着令人印象深刻的轨迹发展，从私人 and 公共档案中产生了重要的新信息，并使证明性评估得以进行。因此，掌握了更多相关情况，尤其是在以下领域：会员国很可能截获相关通信；加丹加武装部队或其他人袭击 SE-BDY 航班的能力；外国准军事人员和情报人员在该地区的存在；与 1961 年的背景和周围事件有关的进一步新信息。

在我们继续努力尽可能获得解密信息的同时，我承认，会员国在确保敏感信息得到适当处理方面具有正当利益。我认为，最好酌情向会员国提供可能的披露方式和保密条件，以便利确认相关信息，而不一定要求全面或公开披露相关信息。为完整性起见，我还指出，在我的任务范围内开展的工作并不是为了追究过去披露或未披露的责任；而是仅寻求必要的披露，以便能够根据现有信息就坠机原因得出合理结论。

虽然我能够在我的报告中得出某些调查结果，但目前缺乏充分披露的情况是就这一死难事件的原因得出结论的主要障碍。这是因为，在已证明几乎肯定存在

潜在重要信息的情况下，在没有掌握所有这些信息时就得出结论既不明智，也不负责任。我在本报告中的结论和建议是根据这一调查结果提出的，其摘要如下。

在不影响秘书长的特权和大会最终决定的情况下，我在报告中提出五项彼此兼容且相辅相成的建议。这些建议是：(a) 联合国任命一名独立人士继续按照知名人士的当前授权任务开展工作；(b) 再次敦促关键会员国任命或重新任命独立的高级别官员(独立任用人员)，以确定本国的安全、情报和国防档案中是否有相关信息；(c) 如果继续开展工作，鼓励所有会员国酌情协助独立人士；(d) 具体要求任何被任命的独立人士在授权任务结束时得出结论：会员国是否遵行了大会概述的进程，以及是否可因未遵行而得出任何推论；(e) 联合国继续致力于通过一个专门的在线资料集公开达格·哈马舍尔德调查获得的关键文件。

最后，我要感谢会员国代表、联合国工作人员和私人为这一进程提供的合作。这项工作的势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一些个人的努力，他们无偿和慷慨地提供了他们的时间、专门知识和信息。除了在这么多年之后对真相进行全面解释之外，这些人没有其他目的。谨向你表扬我的报告中具体提到的那些人和其他人所作的努力。

我还向在 1961 年 9 月 17 日午夜至 18 日凌晨为联合国的工作献出生命者的家属表示深切敬意。在当前的授权任务下，我有机会到前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墓前默哀致敬，铭刻此事的重要意义，并亲自会见了一些家属的代表。他们在这一过程中的耐心和坚定不移令人钦佩。时间的流逝并没有降低此事对他们、对联合国或对国际社会的重要性。

穆罕默德·钱德·奥斯曼(签名)

知名人士

执行摘要

A. 引言

1. 1961年9月17日午夜至18日凌晨，一架名为“*Albertina*”、注册号为SE-BDY航班的DC-6型包机于午夜刚过时在当时属于英国保护地北罗德西亚的恩多拉附近坠毁。机上载有在刚果执行和平任务的联合国第二任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及其他15名具有奉献精神的男女乘客。哈马舍尔德及15名随行人员中的14人当场死亡。唯一的一名幸存者哈罗德·朱利安中士数天后死于坠机时所受创伤。哈马舍尔德死后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2. 坠机发生后的61年间开展了一系列调查，探究有关坠机原因的各种假设，包括空中或地面袭击或其他外来威胁(“外来袭击或威胁”)、人为破坏、劫机和人为失误。继1961/62年度的两次罗德西亚调查后，联合国的一个调查委员会在1962年确定，它找不到证据来支持或排除为解释坠机原因提出的任何一种假设。因此，大会在1962年决定将这一事项留待进一步审议，请秘书长向其通报可能出现的任何新证据。

3. 约50年后，由四名知名法学家组成的私营志愿机构哈马舍尔德委员会提请大会注意新证据。该委员会在2013年得出结论认为，联合国无理由恢复对这一悲剧事件的审查。因此，大会于2015年指派了一个独立专家小组负责审查和评估新信息的证明价值。由我担任主席的独立小组有效排除了有关坠机原因的某些假设，但建议还需进一步的查证或调查。此后在2017年，我被任命为知名人士，任务是审查潜在的新信息并评估其证明价值，并确定任何进一步查证或调查应涵盖的范围。在2018年和2020年的后续任命中，我的任务反映了2017年的任务，但增加了一项授权，即在可能情况下，从已经进行的调查中得出结论。

4. 我作为知名人士编写的报告已于2017年(2017年报告)、2019年(2019年报告)和2022年(2022年报告)提交大会。本文件是2022年报告所载关键信息的执行摘要。由于与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有关的挑战，大会将该报告截止日期延长至2022年。

B. 当前的授权任务和2022年报告

5. 与2017年报告的调查结果相呼应，2019年报告认为，会员国不披露重要信息，阻碍了就坠机原因得出结论的努力。在我的2019年报告中，我得出结论认为，“现有的具体资料和历史记录均显示，南非、联合王国和美国几乎肯定掌握着重要的未披露信息”。我还指出，相关资料可能存放在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档案中，并建议将这些档案也包括在检索范围内。

6. 大会在第74/248号决议中请秘书长重新任命知名人士，并除其他外欢迎2019年报告，促请报告中提及的会员国向知名人士提供充分合作和协助。为执行这些明确规定，我在2020年至2022年期间向俄罗斯联邦、南非、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发出了提供信息的具体请求。我还与其他会员国通函，

并向它们寻求协助，这些会员国包括比利时、刚果共和国、埃塞俄比亚、法国、德国、瑞典、赞比亚和津巴布韦。我的一些协助请求得到了回应。一些仍待答复。

7. 我在 2020 年至 2022 年期间与 2019 年报告中确定需要进一步接触的四个会员国的互动情况如下：

- 关于俄罗斯联邦，我请求任命一名独立的高级官员(独立任用人员)对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进行检索。虽然我没有具体资料表明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知晓具体事件，但我认为，鉴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当时是该地区的一个重要行为体，必须由一名独立任用人员进行这些检索。2020 年，我高兴地收到确认，俄罗斯联邦已任命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上诉分庭前法官巴赫季亚尔·图兹穆哈梅多夫协调所请求进行的检索工作。俄罗斯联邦独立任用人员协调的检索结果没有提供任何具体信息。尽管如此，我认为目前的检索工作是令人满意的，因为没有收到任何其他信息表明，未披露的材料很可能保存在俄罗斯档案中。在我的报告中，我指出，与任何此类评估一样，这一点可能会基于未来的信息而发生变化；
- 关于南非，我很高兴收到国际关系与合作部长的答复，其中表示全力支持。然而，无论是在 2018/19 年度期间，还是在 2020 年至 2022 年期间，我都没有收到任何新的信息或对我所确定的事项的具体答复；
- 关于联合王国，我感谢外交和联邦事务部一名高级敏感性审查员和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答复。提供了对我所确定的问题的一些答复。然而，在 2018/19 年度期间或 2020 年至 2022 年期间，我没有收到任何以文件或其他记录为形式的新信息；
- 关于美国，我感谢美国国务院主管国际组织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的答复。除了我在 2018/19 年度收到的一份文件外，我在 2021 年收到了两份公开的文件。考虑到它们的已知内容，我评估这些文件不具有证明价值。我没有收到对我所确定的问题的具体答复。

8. 此外，我还与其他几个会员国进行了有益的互动。津巴布韦政府重新任命 Sydney Sekeramayi 为独立任用人员。他在 2018/19 年度提供了有价值的新信息。Sekeramayi 先生与他的团队进行了进一步的重要研究，得出了新的信息，他在一系列报告中向我传达了这些信息，包括关于截获的无线电通信和北罗德西亚政府在事件中所发挥作用的信息。在完成 2022 年报告时，其中一些工作仍在进行。瑞典政府也为我的活动提供了大量支持。这包括法证照片分析和相关弹道测试，以及通过前独立任用人员 Mathias Mossberg 建立进一步接触，并便利与这一悲剧事件的一些受害者的家属联系。德国政府还继续通过其前独立任用人员 Thomas Fitschen 为我的工作提供便利，他对私人档案进行了研究，以得出关于 2019 年报告所标记的未决事项的重要信息。我还感谢法国和比利时政府分别让其前独立任用人员 Maurice Vaisse 和 Serge Lipszyc 答复就它们以前提供过信息的事项提出的

问题，这些答复很有帮助。2022 年报告详细讨论了 2020 年至 2022 年期间与所有会员国互动的细节。

9. 尽管某些会员国提供了合作，但 2020 年至 2022 年期间产生的几乎所有新信息都来自个人研究者和非国家实体。这表明在以往任务授权下获得新信息的方式发生变化。从个人研究者那里，在无线电通信和截获、特定雇佣兵飞行员或其他人员的可能参与以及外国情报机构和特工的存在和作用等领域产生了重要的新信息。这些个人研究者的工作使许多证明性评估得以进行。他们的宝贵贡献继续为寻求真相提供巨大的助益。2022 年报告列出了为我的工作提供协助的个人；我特别感谢 Manuel Fröhlich、Torben Gülstorff、Sven Hammarberg、Colin Hendrickx、Henning Melber、Maurin Picard、Andreas Rocksén、B. Rosato、Kristian Simensen、David Wardrop 和 Susan Williams 提供的协作和新信息。其他要求匿名的个人也提供了重要的新信息。

10. 尽管会员国查明的信息量有所减少，但个人和非国家实体提供的新信息的数量和质量突出表明，主要会员国的记录和档案中极有可能存在更多的信息。已向这些会员国具体和有限地指明了可能存在此类信息的地方，并在 2022 年报告中提及了这些情况。

11. 据信信息仍未予披露的一个主要相关专题涉及坠机当晚的无线电通信记录。如下文进一步描述的那样，历史记录表明，联合王国和美国很可能已经创建、持有或知晓这种无线电通信的记录。这一论断的依据是，如 2022 年报告所述，1961 年 9 月 17 日和 18 日，在刚果和北罗德西亚境内及周边有两国各自的人员和资产存在和活动。因此，我在 2022 年请联合王国和美国各自具体确认它们是否：

在 1961 年 9 月 17 日格林尼治时间 20:00 至 1961 年 9 月 18 日 02:00 之间的任何时候，创建、持有或以其他方式获知与在北罗德西亚恩多拉或附近发生的事件有关的任何无线电通信、传输或其他通信的记录，这些事件涉及：秘书长的坐机(包括飞机接收、发出或关于飞机的通信)；任何飞机在恩多拉降落或进近；和(或)该地区飞机的任何遇袭或坠毁。

12. 2022 年 7 月，联合王国表示，它没有无线电通信的存档记录。2022 年 7 月，美国让我参看了它之前的检索，这些检索没有找到这样的记录。虽然上述询问得到部分回应，但我并不认为任何一个会员国的答复都是对上述询问的确凿或完整答复。

13. 如果 SE-BDY 航班受到袭击或威胁，袭击者很可能使用了无线电通信，或者 SE-BDY 可能在已知通信之外还进行了或试图进行通信。许多人提到无意中听到了这种通信，恩多拉空中交通管制塔当晚的一些记录被毁，则进一步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在这种情况下，特别重要的是要确凿地确定这种通信的记录是否曾经存在。如果我向联合王国和美国提出的问题得到明确和确定的答复，将大大有助于评估剩余的假设，包括坠机是否可能是由外部干扰造成的。2022 年报告指出，这是一个有待最终确定的问题。

C. 被视为已确定的事项

14. 上文已讨论，在 2020 年至 2022 年间，对私人 and 公共档案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新信息，使证明性评估得以进行。掌握了更多相关情况。这一点在以下领域最为显著：会员国可能截获了相关通信；加丹加武装部队或其他方对 SE-BDY 航班发动袭击的能力；该地区有外国准军事人员和情报人员以及与 1961 年背景和周围事件有关的更多新信息。

15. 此处提供了在截至 2022 年报告所审查的信息(包括 2022 年报告中的信息)基础上似已确定的事项的综合摘要。以下摘要以 2019 年报告所载摘要为基础。如果 2019 年报告的调查结果没有修改，则在下文中以与以前基本相同的说法得到反映。如果在 2020 年至 2022 年期间收到的新信息证明对先前调查结果作出补充或修改是合理的，则说明这一点。为清楚起见，我说明已向主要会员国提供了机会，对以前作出的涉及其实体或人员的调查结果作出回应。如果在 2019 年报告中就可归因于某一会员国的行为得出了调查结果，而该会员国没有试图澄清调查结果，我则认为这一结论还有待加强。

16. 以下摘要的目的并不是要搜罗所有相关信息，而是列举可以得出重要结论的领域，并指出调查线索表明仍需在哪些方面开展进一步工作。摘要并未提供详细参考材料。关于此类参考，应全面参阅 2017 年、2019 年和 2022 年报告。

1. 背景

17. 1961/62 年度的调查(早期调查)对历史记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却存在重大缺陷。特别是，未适当考虑当地“非洲人”目击者提供的证据，因而丧失了一个大好机会。这项工作的每一个后续阶段均已发现早期调查未看到或因其他原因未考虑的证据。

18. 早期调查未能全面考虑各种可能坠机原因，特别是 SE-BDY 航班可能遭到外来袭击或威胁这一假设被轻易否定，部分原因是未能充分考虑 1961 年 9 月事件的背景。这一背景包括当时正在发生激烈武装冲突，多方卷入了冲突，包括联合国。因此，SE-BDY 航班前往区域正处于高度军事化状态，刚果和北罗德西亚之间边界两侧都有军事行动，大量处于随时交战状态的部队集结在飞行航线沿线和飞机坠毁地点附近。

19. 1961/62 年度调查还受到不公正性的影响。英国和北罗德西亚官员试图影响这些调查的结果，从而得出结论，坠机是飞行员失误造成的，而不是任何类型的外部干扰。罗德西亚官员还似乎试图限制人们在恩多拉医院中的朱利安中士还活着的时候接触他。

2. 关于坠机原因的调查结果

20. 根据手头已有的全部资料，无论是通过直接袭击还是通过在准备着陆的关键阶段对飞行员的干扰导致 SE-BDY 坠机，都似乎有理由认为外来袭击或威胁可能是造成坠机的一个原因。虽然在当时的普遍条件下袭击 SE-BDY 存在困难，但当时的情况和现有的消息来源都表明，有可能以数种方式之一发动了袭击。

21. 哈马舍尔德将于当晚乘机前往恩多拉的情况事先已广为人知。这一点不仅在刚果和北罗德西亚当地，而且在联合王国和美国等其他国家，都广为人知。因此，SE-BDY 航班的目的地和时间并不是秘密，尽管飞行员试图保持低调，但飞机在飞往恩多拉的途中可能面临恶意或敌对行动。

22. 许多目击者称，他们看到空中有不止一架飞机，另一架可能是喷气式飞机，SE-BDY 坠毁前已着火以及(或者)SE-BDY 遭到射击或被另一架飞机以其他方式进犯。这些目击者包括早期调查未听取的 12 名“新”目击者中的 9 人。

23. 没有证据表明机械或其他材料故障影响了 SE-BDY 航班，包括发动机或测高仪故障或气体泄漏。根据目前的信息，与机械或材料故障有关的假设似乎已被排除。

24. 没有证据表明飞行员使用了错误的测高仪设置(QNH)或使用了不正确的着陆图。根据目前的信息，与飞行员错误使用测高仪设置或着陆图有关的假设似乎已被排除。

25. 尚不能断定人为破坏是否可能是造成坠机的原因，部分原因是在南非查阅相关文件遇到了困难，特别是与南非海洋研究所(海研所)和据称的“Celeste 行动”有关的文件。

26. 根据医学证据，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SE-BDY 航班的乘客死于飞机坠毁时受的伤。(哈罗德·朱利安中士在坠机几天后因急性肾功能衰竭并发症在医院去世。如果他在坠机后更及时接受治疗，他可能会活下来。)因此，可以排除关于死因的其他说法，包括达格·哈马舍尔德坠机前或坠机后生还遭刺杀的说法。

27. 同样根据医学证据，包括 2017 年拿到的初步毒理分析结果和独立专家意见，没有证据表明任何一名飞行员或机组人员受到了药物或酒精的影响。机长 Hallonquist 在登上 SE-BDY 航班前似乎有充足的休息机会，但机组 4 名成员中的其他 3 人没有。因此，疲劳可能影响了 SE-BDY 副驾驶和飞行工程师的能力，包括在发生任何意外情况时的应对能力。

28. 目前不能排除坠机有可能是人为(飞行员)失误造成的。在做出这一结论前，必须确信对所有潜在相关证据都进行了审查。在所有相关证据显然还未完全披露的情况下得出没有外部攻击或威胁的调查结果不合逻辑。因此，在没有看到所有潜在重大信息的情况下得出任何此种结论，既不明智也不负责任，更何况已显示这种信息几乎肯定存在。

3. 截获通信

29. 1961 年 9 月，多个会员国和地区都在监控和侦听刚果境内和周边的通信。在联合国未知晓或同意的情况下，联合王国、美国和北罗德西亚(英国保护地)在整个 1961 年都截获并接收到了截获的联合国秘密通信。这包括获取和分享被截获的无线和信号通信，包括那些与敏感军事事项有关的编码通信。

30. 哈马舍尔德使用 CX-52 型密码机发送的加密通信，包括在他最后一次飞行期间发送的通信，似乎已被会员国的信号和情报机构截获和读取。有关会员国没

有反驳关于中央情报局(中情局)和(或)国家安全局(国安局)秘密监听联合国通信的说法。这是中情局一项行动的一部分,最初代号为“Thesaurus”,后来代号为“Rubicon”。很有可能创建了相关的通信记录,但尚未披露。

31. 坠机当晚,至少有一个会员国(美国)在恩多拉机场及其附近部署了先进的通信资产,包括移动军事资产(飞机),机上配有高功率通信设备和人员,还有设在该地区及以外范围的监听站。在恩多拉的美国飞机配备的通信设备可以长距离(包括在洲际间)侦听、传输和接收通信。

32. 除了在恩多拉机场的具体监听活动外,包括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在内的美国机构在 1961 年左右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展了监听活动。1961 年 9 月 17 日午夜至 18 日凌晨恩多拉的所有本地和地区无线电通信极有可能被国家安全局跟踪和记录,也可能被中央情报局跟踪和记录。在这方面,两名美国人员(Charles Southall 和 Paul Abram)提供的信息似乎证实,1961 年 9 月 17 日午夜至 18 日凌晨,当他们正在为国家安全局工作或为国家安全局活动提供支持时,无意中亲耳听到了关于 SE-BDY 航班遇袭的通信传输或录音,或亲眼读到传输或录音誊本。尽管自 2015 年以来每一年、包括在 2022 年都请求美国予以澄清,但就他们的说法美国一直没有作出实质性回应。截至 2018 年,这两人都已去世。美国仍有必要确认所称事件的细节,包括是否存在或曾经存在事件记录,是否向 Southall 和 Abram 的同事(包括 2022 年报告中新确认的那些人)进行了询问,以及是否查询了相关机构的记录。还有必要确认这些查询的结果,以及自 1960 年代以来对 Southall 和 Abram 的说法进行的任何美国内部调查的全部细节。

33. 1961 年,英国官员协助外国实体重新建立和管理通信,包括北罗德西亚和加丹加之间的通信,此前这些通信被切断。具体地说,1961 年 9 月,Neil Ritchie(英国秘密情报局(军情六处))用飞机将工程师 Manfred Loeb(上加丹加矿业联盟(矿业联盟))带到北罗德西亚的基特韦。Loeb 在那里与 Gordon Hunt(英美矿业和罗德西亚边境电力公司,他自称英国情报人员)合作,支持各方之间的信息传输。Ritchie、Hunt 和 Loeb 密切参与协调加丹加省、北罗德西亚和联合王国政府与商业实体之间的关系,包括通过矿业联盟在加丹加和布鲁塞尔的办事处。

4. 1961 年 9 月坠机现场及其附近的武装部队

34. 加丹加空军在打击刚果部队和平民以及联合国刚果行动(联刚行动)部队的作战行动中发挥了有效作用。供应给加丹加并由加丹加空军在 1961 年使用的飞机包括: Douglas DC-3、Dornier DO-28、De Havilland Dove、Fouga Magister 和各种 Piper 飞机。证据表明,加丹加空军控制下具有进攻能力且 1961 年 9 月可使用的飞机包括一架 Fouga Magister、一架 Dornier DO-28 和一些 De Havilland Dove 飞机。加丹加空军将这些飞机进行改装,使其可用于对联刚行动和刚果地面和空中目标发动空袭和轰炸。加丹加空军行动的军事装备似乎包括购买的装备以及在采矿公司——矿业联盟——的参与下在当地制造的装备。

35. 1961 年，加丹加空军使用了刚果和国际领土上的已建和临时机场，机场所在地点包括加丹加、北罗德西亚、安哥拉和刚果共和国(刚果布拉柴维尔)等地。飞机在昼夜作战行动中都有使用。

36. 尚未断定 1961 年 9 月 17 日和 18 日有哪些非加丹加飞机、人员和装备在恩多拉或恩多拉附近运作。加丹加和北罗德西亚军队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合作并共同利用边境地区。除了加丹加空军飞机，驻扎在恩多拉或附近的其他飞机包括罗德西亚皇家空军的 18 架 Canberra 喷气式战斗轰炸机、30 架 Vampire 喷气式战斗轰炸机、12 架 Provost 和美国 Dakota 轻型攻击机。除了在加丹加的正规军和雇佣兵部队外，加丹加雇佣兵还试图在北罗德西亚境内建立突击行动和其他行动。此外，有大量罗德西亚陆地部队驻扎在边界附近。

37. 加丹加空军少校 Joseph Delin 在早期的调查中证实，加丹加空军只有一名加丹加飞行员能够驾驶飞机袭击 SE-BDY，但与 Delin 所提证据相反的是，加丹加空军有多名现役飞行员。加丹加当局试图阻止查明这些飞行员的身份。许多参与加丹加武装部队行动的非飞行员涉案人当时也在该区域，而且在 1961 年 9 月，外国雇佣兵在加丹加及其周围地区组成了一股重要力量，但早期调查对其存在方式并不了解或重视。目前没有一个确定性清单，说明在 1961 年 9 月 17 日和 18 日在加丹加或恩多拉附近究竟有哪些人。但在相关时间，无疑有更多涉案人积极参与了打击联合国的战斗，人数比早期调查所考虑的要多。

38. 据说承认参与袭击 SE-BDY 的比利时雇佣兵、加丹加空军飞行员 Jan Van Risseghem 有可能在 1961 年 9 月 17 日前返回了加丹加。根据他自己的飞行日志，1961 年 7 月至 9 月期间，Van Risseghem 与多个不同的副驾驶为加丹加空军驾驶了以下类型的飞机：Douglas DC-3、Dornier DO-28、De Havilland Dove、Fouga Magister 和 Piper。

39. 许多消息来源称，在正式发现坠机地点之前，有不明身份的人来到该地点，这可能表明有人参与了一次地面攻击，或者试图掩盖或推迟发现坠机事件。

5. 外国情报机构

40. 1961 年，该地区有大量外国情报人员，而早期调查根本没有提到这一点。前情报人员自己也曾公开说明他们当时在该地区的活动。不过，尽管提出了请求，但会员国没有披露外国情报人员创建的记录。已被曝光的官方记录是独立研究的结果。

41. 英国情报人员和外交官员发挥了关键作用，协调哈马舍尔德与要脱离刚果的加丹加省领导人莫伊塞·冲伯在恩多拉的拟议会议。SE-BDY 坠毁时哈马舍尔德及其随行人员正是在赶往恩多拉会晤的路上。军情六处的特工 Neil Ritchie 与包括英国驻加丹加领事丹齐尔·邓内特和英国驻索尔兹伯里高级专员 Alport 勋爵在内的其他人一起，在会议之前和飞机坠毁之后作出安排。就在坠机之前，Ritchie 正在直接与冲伯、Roy Welensky 爵士和 Alport 勋爵(以及其他)通信。Ritchie 与冲伯分享了关于联合国军事活动的信息，并要求英国政府采取步骤，不允许联合国获得埃塞俄比亚喷气式飞机用于对付加丹加部队。在飞机坠毁的当晚，Ritchie、

Hunt 和 Loeb 留在了同一地点，坠机后 Loeb 和 Ritchie 前往加丹加，目的是将从坠机现场找到的哈马舍尔德的文件带给邓内特。尽管 Ritchie 在飞机失事后撰写了一份秘密报告，并传递给伦敦的联邦关系事务部(Ritchie 报告)，但联合王国没有披露军情五处(英国安全局)或军情六处人员的记录。

42. 1961 年，中央情报局在刚果派驻了大量人员。中央情报局在利奥波德维尔站和伊丽莎白维尔站的行动包括空中行动(例如包括站长 Larry Devlin 协调特工“WIROGUE”和“QJWIN”)和包括计划暗杀的活动，如在“ZRRIFLE”计划和其他计划下开展的行动。1960 年代，虽然很可能是在 SE-BDY 坠毁几年后，中央情报局雇用了雇佣兵 Mike Hoare，他曾于 1961 年在加丹加服役，他说 SE-BDY 坠毁不是一起事故。同样，参议员 Frank Church 据说声称，美国拥有与 SE-BDY 坠毁有关的重大未披露信息，此人在美国参议院特别委员会(Church 委员会)和涉及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等实体的情报行动的相关调查中发挥主导作用。

43. 西德和中央情报局的记录和 2022 年分析的一名德国记者的叙述显示西德在刚果开展了多个行动，包括与特工 STAHL(Wolf Meister)和德国联邦情报局特工 Hans Germani 有(各种)关联的行动。

44. 北罗德西亚情报官员卷入北罗德西亚和加丹加之间的军事交流和通信，包括通过与加丹加空军飞行员的联络。目前还没有披露北罗德西亚情报机构的记录。正如前英国殖民领土的现任政府所确认的那样，内容敏感的记录是在罗德西亚联邦内创建的，但在北罗德西亚的情况下，是被联合王国保管。津巴布韦独立任用人员指出，殖民当局“精心清除了几乎所有与达格·哈马舍尔德坠机事件有关的记录或档案”。某些记录，包括警察、情报、军事和入境记录，可能具有核心重要性。

6. 其他

45. 恩多拉机场空中交通管制保存的 SE-BDY 最后通信记录不完整，其中可能缺乏重要通信内容。空中交通管制员 Arundel Campbell Martin 承认销毁了他的原始笔记，尽管他说他知道这架飞机以及机上的乘客极其重要，而且他也知道恩多拉空中交通管制没有录制对话内容磁带。

46. 关于人为破坏假设，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南非似乎有一个名为南非海洋研究所(海研所)的准军事组织。由于南非档案中的相关信息尚未提供，无法确认 1961 年是否存在海研所，或者说海研所是否参与了所谓的“Celeste 行动”，据说此次行动的目的是“干掉”哈马舍尔德。

47. 罗德西亚当局的官方记录是，SE-BDY 的残骸是于 1961 年 9 月 18 日约 15 时 00 分被发现的，此时据其未能着陆已经过去了大约 15 个小时。但来自多个消息来源的信息已经证实，残骸在此时间之前已被发现。

D. 结论和建议

48. 2019 年报告认定，关于飞机坠毁原因的最终问题，几乎可以肯定存在相关材料，而且少数关键会员国尚未披露此类材料。2022 年报告分析的新信息和报告中得出的结论加强了这一调查结果。从历史记录来看，现有信息表明，某些会员国

肯定已经创建、持有或知晓由各种来源包括其情报人员和资产获取或生成的信息。然而，尽管其他材料提到了这种信息，但这种信息尚未披露。

49. 大会在第 74/248 号决议中概述的办法得到了部分遵行。一些会员国有意义地参与了大会指示开展的进程，并应请求提供了支持和信息。另一些会员国提供了一些答复或信息，但据信仍持有重要的未披露信息。在 2020 年至 2022 年期间，关键会员国没有披露任何具有证明价值的文件，也未收到对我向其提出的问题的明确答复。注意到这一点，我谦卑地认为，如 2022 年报告所述，转给这些会员国的举证责任仍有待履行。

50. 在 2022 年报告中，标出了需要跟进的几个事项。这些事项除其他外包括：会员国关于无线电通信记录和声称无意中听到这种通信的人员(包括 Southall 和 Abram)的记录明确答复；关于 SE-BDY 无线电通信可能受到干扰的信息；与外国情报人员活动有关或提及外国情报人员活动的报告(包括与 Ritchie 报告有关的信息)；罗德西亚联邦的记录(例如来自警察、情报、消防部门和通信兵等实体的记录)；会员国与涉案人员和飞机有关的入境和机场记录；会员国移民和其他当局持有的外国雇佣兵的记录；关于涉案飞行员的飞行记录的信息。

51. 在不损害秘书长和大会特权的情况下，2022 年报告含有五项相互兼容且相辅相成的建议。这些建议是：(a) 联合国任命一名独立人士继续按照知名人士的当前授权任务开展工作；(b) 再次敦促关键会员国任命或重新任命独立的高级别官员(独立任用人员)，以确定本国的安全、情报和国防档案中是否有相关信息；(c) 如果继续开展工作，鼓励所有会员国酌情协助独立人士；(d) 任何进一步的授权任务规定做出结论，说明会员国是否已遵守大会概述的进程；(e) 联合国继续致力于通过一个专门的在线资料集公开达格·哈马舍尔德调查获得的关键文件。

52. 可能涉及对联合国秘书长发动了敌对行为的这一事件是公众最为关心的一个事项。六十年过去了，这一事项对本组织的重要性并未降低，对为实现其崇高目标而献身的人员的家属而言，其重要性也并未降低。我的评估仍然是，很有可能存在具体和重要的信息，但少数会员国没有披露。缺乏充分披露仍然是就这一悲剧事件的原因或可能原因作出确定结论的主要障碍，因为只有在评估所有可能的重大信息之后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大会重启调查所提供的这一正当时机应当完全抓住。这一进程寻求结案和了结，重要的是，所有会员国都必须提供所需程度的合作和披露，以便最终实现对全部真相的探寻。

大会第 74/248 号决议任命的知名人士的报告

目录

| 章次 | 页次 |
|----------------------------------|----|
| 一. 导言 | 16 |
| A. 初步问题 | 16 |
| B. 调查结果摘要 | 17 |
| C. 背景：以往的调查和质询 | 17 |
| D. 任务和定义 | 20 |
| E. 方法和活动 | 21 |
| 二. 搜寻新资料 | 22 |
| A. 导言 | 22 |
| B. 会员国的答复 | 23 |
| C. 联合国档案 | 30 |
| D. 对会员国答复的意见和资料搜寻工作遇到的限制 | 30 |
| 三. 关于坠机的可能原因的新资料 | 31 |
| A. 空中或地面攻击或其他外来威胁 | 31 |
| B. 人为破坏：Celeste 行动/南非海洋研究所 | 58 |
| C. 人为(飞行员)失误 | 61 |
| 四. 其他新资料 | 63 |
| A. 地方和外国当局的行为 | 63 |
| B. 其他事项 | 77 |
| 五. 分析结果和建议 | 80 |
| A. 坠机的原因 | 80 |
| B. 其他事项 | 85 |
| 六. 建议和结论 | 90 |
| A. 建议的依据 | 90 |
| B. 建议 | 91 |

一. 引言

A. 初步问题

1. 1961年9月17日午夜至18日凌晨，一架名为“Albertina”、注册号为SE-BDY 航班的DC-6型包机于午夜刚过时在当时属于英国保护地北罗德西亚的恩多拉附近坠毁。机上载有在刚果执行和平任务的联合国第二任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及另外15名尽职奉献的男女工作人员。哈马舍尔德及15名随行人员中的14人当场死亡。唯一的一名幸存者哈罗德·朱利安中士数天后死于创伤。哈马舍尔德死后被追授诺贝尔和平奖。对坠机的原因(或多种原因)一直有很多假说，但从未明确确定。

2. 坠机发生后的61年间开展了一系列调查，探究有关坠机原因的各种假设，包括空中或地面袭击或其他外来威胁(“外来袭击或威胁”)、人为破坏、劫机和人为失误。到目前为止，这些调查还没有得出结论。继1961/62年度的两次罗德西亚调查后，联合国的一个调查委员会在1962年确定，它找不到证据来支持或排除为解释坠机原因提出的任何一种假设。因此，大会在1962年将这一事项留待进一步审议，请秘书长向其通报可能出现的任何新证据。

3. 由四名知名法学家组成的私营志愿机构“调查达格·哈马舍尔德罹难原因法学家委员会”(哈马舍尔德委员会)2013年发布的报告促成大会于2015年设立了一个独立专家小组，负责审查和评估有关这一死难事件的新资料的证明价值。虽然独立小组有效排除了一些说法，但最终建议需要进一步查证或调查。为此，秘书长经大会授权在2017年和2018年连续任命本人为知名人士，负责审查可能存在的新资料，评估其证明价值，确定任何进一步查证或调查应涵盖的范围，并在可能情况下，于2018年从已经进行的调查中得出结论。根据会员国和个人提供的新信息，我在工作过程中能够排除某些假设，同时为某些假设找到佐证。我在2017年7月(A/71/1042, 2017年报告)和2019年7月(A/73/973, 2019年报告)向秘书长提交了知名人士报告。

4. 2020年，根据大会第74/248号决议我再次被任命为知名人士。注意到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及其对会员国、个人和私营实体构成的挑战，大会于2020年12月将我的工作报告截止日期延长一年(见第75/542号决定)。

5. 本报告以1962年以来个人所做研究和哈马舍尔德委员会的建议为基础，延续了独立小组于2015年在联合国框架内重新启动、后由知名人士编写报告继续开展的进程。为便于参考，执行摘要(见上文)综合了根据2015至2022年期间获得的信息能够得出的临时结论。报告第三和第四节概述和评估了在2019年报告结束后的当前期间收到的相关新资料的证明价值以及需要进一步查证的事项。第五节阐述了本报告的调查结果和结论。第六节是我的建议和结论意见。

6. 为便于参考，本报告遵循大致与以前报告相一致的结构。这种做法本身并不是对任何一种坠机原因(或综合原因)假设的相对可能性表示认可。相反，其目的

是提供本报告和以往报告之间的一致性，因为要全面处理该主题事项，必须一并阅读以往报告。

7. 我要指出，我的授权任务无论从结构安排还是从资源分配角度来看都不是进行全面调查或查证，我也无权强迫他方提供信息。因此，本报告中分析的材料或者是会员国、个人或具有技术或专长的专家自愿提供的材料，或者是来自可以电子方式查阅的公开文献。

8. 这一事项的调查看起来正在变得越来越透明，多国政府及其根据大会第 74/248 号决议委派开展审查的独立高级别官员(独立任用人员)的工作一般而言堪称楷模。我感谢会员国及其独立任用人员的合作，下文对此有进一步讨论。与独立小组自 2015 年开展工作以来的情况一样，我一直享有联合国秘书处的无保留支持，得以无限制查阅秘书处的记录。我特别感谢法律事务厅及档案和记录管理科。我还要再次感谢我的助理西蒙·托马斯提供的出色支持。

9. 许多人在我的工作中帮助了我，许多人无偿地提供了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时间，没有他们，这一进程就不可能成功地进行。我的报告提到了个人提供的具体信息，但我要鸣谢下列人员，非常感谢得到这些人提供的信息和(或)帮助(按照英文字母顺序排列)：Mandy Banton、电影《哈马舍尔德悬案》(Cold Case Hammarskjöld)剧组人员，特别是其研究主管 Andreas Rocksén、Ove Bring、Hans Corell、Jan Eliasson、Manuel Fröhlich(及其特里尔大学研究生团队)、Richard Goldstone、Torben Gülstorff、Sven Hammarberg、Colin Hendrickx、Henrik Larsen、David Lea of Crondall 勋爵、Joseph Majerle、Henning Melber、Mathias Mossberg、B. Rosato、Stephen Sedley 爵士、Hans Kristian Simensen、Ravi Somaiya 和 David Wardrop。与以往的授权任务一样，应特别感谢苏珊·威廉姆斯的贡献，这些贡献是历史性的、持续的和重要的。我还特别感谢莫林·皮卡德，他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并在我目前的任期内，优先向我提供他的工作成果，而不是由他自己出版这些成果。我还得到了其他不愿透露姓名的人的帮助；我也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B. 调查结果摘要

10. 可将构成本报告一部分的执行摘要视为是关键事项当前已知情况摘要。当然，关键事项已知情况会根据今后的事态发展而进行调整。

C. 背景：以往的调查和质询

11. 坠机发生后，立即在罗德西亚和尼亚萨兰联邦(也称为罗德西亚联邦和中非联盟，本报告使用前者)境内开始最初调查。该联邦是英国的殖民地，由被保护国北罗德西亚、自治殖民地南罗德西亚和被保护国尼亚萨兰组成，联合王国对其保留外交事务和其他事项的责任。罗德西亚联邦政府民用航空部调查局(罗德西亚调查局，其于 1961 年 9 月 19 日至 11 月 2 日开展调查活动)最先对坠机事件进行了调查。随后，根据 1955 年《联邦调查委员会法》成立了联邦调查委员会(罗德西亚调查委员会)。之后，大会依据第 1628(XVI)号决议于 1961 年成立了联合国调查委员会，对导致这起死难事件的原因和情况进行国际调查。我把这三个实体在 1961/62 年进行的工作统称为“早期调查”。

12. 正如我在 2017 年和 2019 年的报告中总结的那样，早期调查存在缺陷。罗德西亚调查局的时间有限，在没有听取证人口头证词的情况下，在几个星期内就完成了工作。后来的罗德西亚调查委员会似乎有一种倾向，认为事故可归咎于飞行员的失误，这影响了本应对所收到的物证和证词证据进行公正审查。值得注意的是，罗德西亚委员会在考虑是否可能涉及另一架飞机时，第一句话就指出：“首先我们想说，没有提出任何理由，我们也想不出任何理由，为什么可能有能力从空中攻击这架飞机的人会想到在飞机载着哈马舍尔德先生执行任务时攻击它”（见 [A/5069/Add.1](#)，附件三）。罗德西亚委员会显然在开始工作前就已经形成了某种观点。

13. 同样明显的是，罗德西亚的两次调查对他们所说的“非洲人”证人(指当地的黑人证人)普遍不信任(例如，见 2017 年报告，第六.A 节)。此外，早期调查否定或低估了唯一的第一手证人 Harold Julien 下士提供的证据。根据记录，他在 1961 年 9 月 18 日入住医院后几乎立即作了陈述。这些缺陷最终也反映在 1961 年联合国委员会的工作中，尽管委员会在其程序中以更加公正和公开的方式运作，但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罗德西亚调查所收集和分析的证据。这导致这些证据的一些缺陷被带到了联合国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中，特别是考虑到委员会本身只听取了 27 名证人的证词。虽然联合国委员会确实作出了更大努力来询问当地证人，但它忽略了一些关键证词，例如，证人 Chappell、Joubert 和 Laurie 等人的证词，他们说在 SE-BDY 坠毁之后，他们听到空中有第二架飞机飞行。

14. 联合国委员会在结论中找不到证据来支持或排除关于坠机原因的任何假设。因此，在委员会报告 ([A/5069](#)、[A/5069/Add.1](#)、[A/5096/Add.1/Corr.1](#) 和 [A/5096/Add.1/Corr.2](#))发表后，大会在第 1759(XVII)号决议中表示注意到该报告，并请秘书长向大会通报任何新证据。

15. 2013 年，私人自愿机构哈马舍尔德委员会公布了一份报告，其中得出的结论是，联合国无理由重启对这起死难事件的审查。哈马舍尔德委员会由四位著名的国际法学家组成，他们审查和报告了大量材料，包括个别研究人员所做的重要工作，如 2011 年出版的《谁杀死了哈马舍尔德？联合国、冷战和非洲的白人至上》一书的作者哈苏珊·威廉姆斯开展的工作。哈马舍尔德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联合国无理由重启 1961 年联合国委员会的调查，因为有充分证据表明有必要进一步调查飞机是否因遭遇某种形式的敌对行动而迫降。

16. 2014 年 3 月 21 日，联合国秘书长(当时是潘基文先生)将哈马舍尔德委员会的报告提交大会，并附上一份说明，表示他的评估意见是，该报告载有新证据 ([A/68/800](#) 和 [A/68/800/Add.1](#))。在此基础上，大会于 2014 年 12 月 29 日通过了第 69/246 号决议，其中请秘书长任命一个独立专家小组，负责审查新证据，评估其证明价值，并鼓励会员国向秘书长公布和提供其掌握的任何相关记录。

17. 2015 年 3 月 16 日，秘书长宣布，他已按照大会要求任命了独立专家小组，审查新证据并评估其证明价值。他任命当时担任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首席大法官的我——穆罕默德·钱德·奥斯曼为独立小组组长，并任命航空安全专家 Kerry Macaulay(澳大利亚)和弹道学专家 Henrik Larsen(丹麦)为小组成员。独立小组完成工作的时间只有 10 周，2015 年 6 月 12 日，独立小组向秘书长提交了报告。根据

独立小组的报告(见 A/70/132), 秘书长在 2016 年对小组向会员国提出的未获答复的某些索要资料请求进行了后续跟进。2016 年 8 月 16 日, 秘书长向大会报告了后续跟进情况(A/70/1017), 随后, 大会于 2016 年 12 月 23 日通过了第 71/260 号决议。大会在该决议中除其他外, 请秘书长任命一名知名人士审查可能存在的新资料并评估其证明价值, 确定任何进一步查证或调查应涵盖的范围, 并在可能情况下, 从已经进行的调查中得出结论。

18. 作为 2017 年 3 月根据大会第 71/260 号决议任命的知名人士, 我于 2017 年 7 月完成了 2017 年报告, 秘书长于 2017 年 9 月将报告转交给大会。作为 2019 年 3 月根据大会第 72/252 号决议任命的知名人士, 我于 2019 年 7 月完成了 2019 年报告, 秘书长于 2019 年 9 月将报告转交给大会。2017 年报告的结论包括, 似乎有理由认为外部攻击或威胁是造成坠机的原因, 同时举证责任已转到会员国, 它们需证明已对其保管或掌握的记录和档案进行了全面审查。2017 年报告的结论在 2019 年报告中得到了肯定。2019 年报告还认为, 南非、联合王国和美国几乎肯定掌握未披露的重要资料, 因此指出, 2017 年报告中描述的举证责任没有得到履行, 而且责任分担是不对称的。(若想全面审议本报告中的说法, 需一并阅读独立小组的完整报告以及我的 2017 年和 2019 年报告。)

19. 在审议了我的 2019 年报告之后, 大会在第 74/248 号决议中要求重新任命知名人士, 其授权任务反映了第 72/252 号决议所载任务规定。此外, 大会敦促会员国提供信息, 并呼吁会员国与知名人士充分合作, 包括毫不拖延地任命一名独立的高级别官员, 负责确定本国安全、情报和国防档案中是否存在相关资料。还呼吁会员国鼓励个人和私营实体向知名人士提供资料。

20. 在介绍早期调查时, 必须指出, 它们几乎没有提到坠机发生的历史背景和形势环境。联合国当时正介入一场支持刚果重新融合的激烈冲突, 但罗德西亚调查局和罗德西亚调查委员会几乎没有提到加丹加省的分裂, 也没有提到哈马舍尔德前往恩多拉的目的, 即会见加丹加省分离主义领导人莫伊塞·冲伯以促成停火谈判。在 SE-BDY 航班坠毁前飞越的地区, 联合国部队每天都受到攻击。1961 年联合国委员会的报告介绍了一些背景情况, 包括联合国刚果行动(联刚行动)的行动背景和秘书长此行的目的, 但它主要依赖罗德西亚调查局和罗德西亚委员会所做的工作。例如, 这份报告除了介绍页外没有提到加丹加的雇佣兵活动, 并且报告所做的分析几乎完全限于那些与坠机有关的技术问题。事实上, 计划飞行但未成功飞行 SE-BDY 航班的时代背景是, 1961 年时政治和军事局势极其动荡, 去殖民化和冷战并存, 这一事实鲜被提及。因此, 早期查证工作没有考虑到广泛的潜在重要信息, 其中许多信息是最近几年才被发现的。

21. 2015 年以来, 向会员国提出了搜寻请求, 同时在联合国档案中进行搜寻, 目的是更好地了解坠机事件发生的相关背景。这种方法在确定一些领域(包括联合国通信被截听和加丹加武装部队的能力)的事实方面大有裨益。我在目前任期内开展的工作中再次认识到充分了解相关背景的重要性。了解有关事件发生的背景使我们能够确定是否可以根据某个人或物资或其他设备当时在该地区存在与否

的事实，排除或支持某种假设。资料搜寻工作做得越多，或者公开的资料越多，出现新的相关资料的可能性就越大。

22. 另一个初步问题是，我想指出，如果 2017 年或 2019 年报告就可归因于某一会员国的行为提出了某项调查结果，而该会员国提供了信息作进一步澄清，这一澄清即已被考虑进去，并在下文中讨论。如果就 2017 年或 2019 年报告中提出的某项调查结果，会员国未提供任何澄清或补充信息，我即认为该调查结果得到了加强，直至且除非收到值得重新审议的进一步资料。

D. 任务和定义

23. 如上所述，指派给我的知名人士的角色反映了独立小组的工作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推进。根据大会第 71/260、72/252 和 74/248 号决议，知名人士的作用虽然不是全面调查或查证，但需要审查新的资料并评估其证明价值。知名人士的任务还包括确定任何进一步调查或查证应涵盖的范围，并在可能情况下，从已经进行的调查中得出结论。

24. 独立小组将“新资料”的定义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联合国委员会在 1961 年时没有看到的资料；第二类是联合国委员会当时可能已经看到，但由于新材料、科技发展或最佳做法的出现，现在能够从新角度加以审视的资料。我采取了类似的定义方法，并视需要，根据新出现的资料重新审查以前分析过的资料。

25. 与往年一样，在本授权任务下，我在考虑收集和评估新资料的方法中哪些内容可能“相关”时，采用了广泛的、非排他性的定义。我要求会员国也这样做，而不是采用一个特定的或技术性的定义。定义“相关”资料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所有可能最终影响对坠机原因的评估的资料都被查明。因此，即使国内法律或其他框架不要求或不允许披露某项资料，该资料仍应被确定为具有潜在“相关性”。为此，已要求会员国确保准确说明其搜寻的性质和地点，确保搜寻是由具有充分背景知识的人员进行的，并确保审查可以说是不受限制、不受约束和详尽无遗的。

26. “证明价值”的定义自独立小组成立以来一直适用，我也将继续使用。“证明价值”是指有关资料独自或与其他资料结合在一起，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倾向于证明或否定存在或不存在某件或某些相关事实。对于每一项潜在的新资料，我都根据以下非详尽的标准进行了考量：资料的真实性(包括前后一致和当时性)、资料的类型(如主要资料、次要资料、传闻或间接资料)、资料的可信性(包括与其他资料或已核实情况的一致性)、专家技术评估结论以及有关资料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其他材料的支持。例如，一项新资料的证明价值或许被评定为“弱”，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它所涉及的假设已被推翻。相反，评估结果针对的是某一项具体证据及其是否趋向于证明或否定有关事实。此外，一项资料的评估价值可能会随着其他进展信息发生变化，其证明价值可能会被评估为增强或减弱。

E. 方法和活动

1. 方法和活动说明

27. 根据上述决议的授权，知名人士的作用要求对会员国和个人提供的资料进行评估，与政府代表和私人信息来源进行协商，约谈证人，包括专家证人。我在工作过程中邀请各种来源提供具有可确定的事实、法律、环境或推理依据的潜在新资料，以供审议。然而，尽管任务要求我收集和分析新资料，我的一个关键作用也是排除没有证据支持的论述或说法，以便能够将搜寻重点放在那些仍然有据可依的问题上。当有人提出可以说是无凭无据的断言时，我鼓励找出适当的依据或证据基础。

28. 在评估新资料的证明价值方面，我沿用了独立小组描述的四个类别：无、弱、中或强。

29. 根据大会第 69/246、71/260、72/252 和 74/248 号决议的规定，敦促会员国公布其掌握的任何相关记录，我于 2020 年 3 月向以下会员国发出了索要资料请求：俄罗斯联邦、南非、联合王国和美国。在目前的任期内，我还与其他会员国通信并寻求协助，这些国家包括比利时、刚果共和国、埃塞俄比亚、法国、德国、瑞典、赞比亚和津巴布韦。下文第二至四节进一步讨论这些索要资料请求和得到的结果。

30. 一些个人也继续自愿向我提供资料，下文第三和第四节将予以讨论。有时，这些资料是直接由私人来源提供的，有时则是从电影、文学和学术作品等出版材料中获得的。本报告的编写也得到了许多个人志愿者的协助，他们向我提供了专家意见和技术评估。我再次感谢他们的慷慨、专业知识和不求回报提供协助的合作精神。在与飞机有关的专家评估方面，我再次得到了前战斗机飞行员和事故调查员 Sven Hammarberg 的协助。我注意到，Hammarberg 多年来经常在极为紧迫的时间内，以高度的专业精神和合作精神自愿提供专家协助，对此我深表感谢。

2. 制约和限制

31. 如前所述，作为知名人士，我既没有授权也没有相应的资源来进行全面调查。我的工作受到的另一个限制是，虽然我与许多会员国进行了有益的互动并对所有合作表示感谢，但这些合作都是在自愿基础上进行的。我没有权力强迫任何政府搜寻或提供信息。在目前的授权任务下，这已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我将在下文进一步讨论。

32. 我的索取资料请求大多是具体的，主要针对少数会员国。这是若干因素造成的，其中包括地理上的邻近以及当时这些会员国及其人员在刚果境内和周围地区派驻了机构或人员。不应将这一做法理解为意味着其他会员国或私人来源没有重要信息，也不意味着进一步的搜寻工作不会涉及到以前未考虑过的地点的信息来源。

33. 本报告是对这起空难事件的全部真相进行反复探寻的一部分。报告本身不会自诩为是对该主题或被称为对坠机一事提供相关背景的各种历史事件的全面论

述。我在 2019 年的报告中指出，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关于是什么原因导致飞机坠毁这一根本问题，我们还没有看到所有相关材料。基于本任务期间分析的新资料，这一结论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我将在第五节中再次谈到这一问题。

二. 搜寻新资料

A. 引言

34. 有必要简要概述如何搜寻新资料以及搜寻工作及其结果如何随时间变化。

35. 2015 年，独立小组收到了前几年整理的大量资料，包括哈马舍尔德委员会分析的资料。要求所有会员国在其记录和档案中查找有关资料。会员国提供的资料相对较少，但审议了大量新资料。

36. 2017 年，为跟进独立小组确定的需要进一步调查的领域，我请最有可能直接掌握相关资料的八个会员国和联合国本身扩大以往的搜寻主题范围，将早期调查未考虑的背景资料纳入其中。特别是，独立小组得出结论认为，在新的目击者证词、据称截获有关飞机失事的通信的说法以及关于加丹加武装部队及其空军(Avikat)能力的资料中，可能有“明显的线索”。因此，我在向会员国和联合国提出的请求中，要求重点搜寻关于 1961 年刚果加丹加省和周边地区局势的以下非详尽类别的资料：(a) 截获的有关飞机失事或相关事件的通信；(b) 加丹加武装部队，包括其空军的能力；(c) 外国军事、准军事或非正规(包括雇佣军)部队和(或)人员的存在；(d) 外国情报机构或人员的存在；(e) 对联刚行动的攻击；(f) 与加丹加省政府的情报、安全、技术和(或)政治合作。

37. 2017 年的搜寻结果包括重要的新资料，收到的答复产生了数千页材料，在 2017 年报告第四节进行了分析。我特别感谢比利时、加拿大、德国、联合王国和美国提供了大量新资料。然而，除了比利时和德国提供的有限文件外，提供的所有资料似乎都来自外交和(或)政治档案。我注意到有情报表明，某些会员国当时在刚果境内和周围地区派驻了情报、安全和国防人员，他们肯定提供了情报，因此我建议这些会员国各自任命一名独立于政府行政部门的高级别官员，该官员应拥有全面审查相关情报及安全和国防档案所需的许可和资源。提出这一建议是为了使会员国能够遵守本国的法律框架和敏感性要求，同时查明是否存在可能有助于了解 SE-BDY 坠毁情况的信息。

38. 在 2017 年报告之后，大会在第 72/252 号决议中鼓励会员国任命一名独立的高级别官员，对本国的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进行专门的内部审查。因此，2018 年，我请 14 个会员国各自任命一名独立的高级别官员(独立任用人员)，对各自的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进行专门的内部审查。这 14 个会员国是：安哥拉、比利时、加拿大、刚果民主共和国、法国、德国、葡萄牙、俄罗斯联邦、南非、瑞典、联合王国、美国、赞比亚和津巴布韦。这是首次通过大会的明确指示，具体要求会员国确保其搜寻工作涵盖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

39. 2019 年的报告介绍了独立任用人员的工作成果，并载有一个显示其任命状况的表格。虽然大多数会员国开展了大会要求的进程，并产生了重要的新资料，但某些主要会员国没有进行实质性披露。2019 年的报告特别指出，南非、联合王国和美国没有提供来自其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的任何资料，尽管有具体情报证实，这些会员国几乎肯定掌握未披露的重要资料。关于俄罗斯联邦，虽然它确认在其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中进行了搜寻，但没有采用提名独立任用人员的程序。因此，我指出，俄罗斯联邦最好也应遵循大会概述的程序。

40. 在 2019 年报告之后，大会在第 74/248 号决议中呼吁 2019 年报告中提到的会员国与知名人士充分合作并提供协助，包括毫不拖延地任命独立任用人员，并鼓励知名人士与所有高级别官员，包括那些已经完成工作的官员保持接触。因此，我在 2020 年写信给俄罗斯联邦、南非、联合王国和美国，请它们重新开展大会要求的进程。如前所述，我还与比利时、刚果共和国、埃塞俄比亚、法国、德国、瑞典、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等其他会员国通信，寻求它们的协助。

41. 下文概述了我在 2020 年至 2022 年期间从会员国收到的答复。我再次感谢得到许多方面的大力合作。如下文更充分讨论的那样，关于南非，我没有收到任何新资料或对我所提问题的具体答复。关于联合王国，我没有收到任何新资料，只收到了对我所提问题的一些答复。关于美国，我没有收到对我所提问题的具体答复。我确实从美国收到了两份题为“总统情报清单”的公开文件，下文将予以讨论。我将在下文讨论这些问题的意义。

42. 除了向会员国索要资料外，2020 年至 2022 年期间，我还收到了来自研究人员个人和私人档案馆的资料。我非常感谢这些人的努力，本报告中分析的几乎所有新资料都是他们提供的。我将在下文将讨论这方面的意义。

B. 会员国的答复

答复摘要

43. 以下是我在 2020 年至 2022 年期间与会员国的主要通信摘要，内容涉及要求会员国进行专门搜寻，包括在其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中进行搜寻。2019 年报告中提到了 2018/19 年度(但不是在本任务下)接触的其他会员国。对会员国各自答复的更多评论载于下文第五节的结论部分。

刚果共和国

44. 尽管向刚果共和国提出了具体的资料要求，但在 2018/19 年度没有要求该国任命一名独立任用人员(见 2019 年报告，第三节 A.4 和附件)。

45. 2020 年至 2022 年期间，我多次致函刚果共和国，要求搜寻有关人员和飞机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1961 年 9 月从布拉柴维尔入境的移民和机场记录。在编写本报告时，尚未收到刚果共和国的答复。

埃塞俄比亚

46. 2018/19 年度没有要求埃塞俄比亚任命一名独立任用人员。但在 2022 年 5 月，我写信给埃塞俄比亚，要求对 Tore Meijer 显然在 1961 年向埃塞俄比亚帝国空军司令提交的一份报告进行具体信息搜寻。据回顾，Meijer 是埃塞俄比亚空军飞行学校的一名瑞典教官，他说他在 1961 年 9 月 17 日至 18 日凌晨左右无意中听到短波电台上的一段对话。Meijer 说，对话是在飞行控制员之间进行的，其中一人在恩多拉机场，飞行控制员对一架飞机意外地被另一架飞机跟踪表示惊讶。

47. 根据 *Dagens Nyheter* 1994 年 3 月的一篇文章，Meijer 特别说到：“我的一个美国同事带着一个漂亮的短波收音机回家，这是一件稀罕物，他问我想不想买。9 月 17 日晚上，我在 10 点左右(格林尼治标准时间)测试收音机。我正在测试不同频率，突然听到一段英语对话，显然是来自一个机场控制塔。我还听到了‘恩多拉’这个名字。那个声音说：‘他正在接近机场。他在转弯。他在拉平’，飞行员正在接近实际的着陆跑道。然后我听到同一个声音说：‘另一架飞机正从后面接近——那是什么？’。这个声音说：‘他中止了计划。他继续’，之后传输结束”。1961 年 9 月 18 日或 19 日，Meijer 将这一事件通报或试图通报埃塞俄比亚空军司令和美国同事(见 2019 年报告，第三节 A.1)。

48. 在编写本报告时，尚未收到埃塞俄比亚的答复。但我注意到，在我最近一次写信之后时间有限。如果收到埃塞俄比亚的答复，将转交给秘书长。

法国

49. 针对我 2018 年 3 月的请求，2018 年 5 月，我获悉法国已任命巴黎政治学院名誉教授、《法国外交文件》编辑 Maurice Vaïsse 为其独立任用人员。2019 年 6 月，Vaïsse 先生提交了最后报告，其中确认他在 2019 年被专门授予查阅相关文件的接触国防机密文件许可，他可以充分查阅法国的档案，包括情报、安全和国防机构的档案。2019 年的报告中讨论了他的报告结果。

50. 继 2019 年法国独立任用人员的工作之后，2022 年我有理由向法国提出进一步的具体询问。我于 2022 年 6 月收到了 Vaïsse 先生的答复，对此我表示感谢。下文将在相关专题领域下讨论他的答复。

德国

51. 针对我 2018 年 3 月的请求，2018 年 5 月，我获悉德国已任命了一名独立任用人员，在他退休后由联邦外交部网络外交政策和网络安全特别代表 Thomas Fitschen 接替。2019 年 6 月，Fitschen 先生提交了最后报告，其中确认德国允许他全面查阅所有文件和档案，包括联邦情报局和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情报局的文件和档案。2019 年的报告讨论了他的报告结果。

52. 继 2019 年开展的工作之后，2020 年，我收到了 Fitschen 先生提供的关于在德国私人档案馆进行的进一步调查的更多信息，我对此表示感谢。这些信息及其他调查问题将在下文相关专题领域下讨论。

53. 2022年5月，我写信给德国独立任用人员，提出了进一步询问。虽然在本报告定稿时我还没有收到答复，但我注意到，在我最近一次写信之后时间有限。如果收到 Fitschen 先生的进一步答复，将转交给秘书长。

俄罗斯联邦

54. 针对我2018年3月的请求，俄罗斯联邦于2018年5月通知我，其主管当局正在对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进行审查，以确定是否有与达格·哈马舍尔德调查有关的资料。然而，在2019年报告发布之前，并没有任命独立任用人员。

55. 2020年3月，我写信给俄罗斯联邦，请求进一步开展大会规定的独立任用人员进程。我指出，虽然我没有具体情报表明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了解具体事件，但它是当时该地区的一个重要行为体，为了完整和统一起见，应确保俄罗斯联邦任命一名独立任用人员并随后进行全面彻底的审查，这将是有益的。

56. 作为回应，2020年，俄罗斯联邦任命 Bakhtiyar Tuzmukhamedov 为独立任用人员。Tuzmukhamedov 先生曾任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上诉分庭法官，现任俄罗斯国际法协会副主席、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成员、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秘书处成员。

57. 2021年，Tuzmukhamedov 先生与国防部、外交部、联邦安全局(内部安全和反情报)、外国情报局、外交政策档案馆和外交学院(外交部培训和研究附属机构)协调在俄罗斯联邦境内的搜寻工作。我很感谢 Tuzmukhamedov 先生所作的努力，但他并没有发现任何相关信息。我目前收到的其他信息都没有表明俄罗斯档案中可能存在未披露的资料。与任何此类评估一样，如果今后有信息表明情况并非如此，这一点可能会改变。

南非

58. 针对我2018年3月的请求，2019年5月，在收到其他独立任用人员的最后报告的最后期限之后，南非通知说，它已任命国际关系与合作部副司长 Mxolisi Nkosi 为协调人。2019年没有收到南非的实质性报告，尽管 Nkosi 先生在2019年报告公布后通知我，未能找到提及 Celeste 行动的文件原件。

59. 2020年3月，我写信给南非，请求进一步开展大会规定的独立任用人员进程。我指出了需要提供哪些调查领域的资料，包括提供有关 Celeste 行动的文件(另见下文第三.B节)，但也包括以下方面的资料：有关从南非向加丹加转移人员和装备的事项、有关为加丹加服务或以其他方式与加丹加有牵连的南非雇佣兵和情报人员的资料、加丹加、比利时和南非实体(包括安全部门和准军事部门)之间的联系以及其他事项。

60. 2021年7月，我很感激地收到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长格蕾丝·纳莱迪·曼迪萨·潘多尔的回复。该回复称，由预防犯罪、国防、司法、情报和安全部门的高级政府官员组成的一个机制已开始搜寻我索要的资料，但“没有发现与前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之死有关的文件”。

61. 鉴于我提出的具体信息要求没有得到南非的实质性回应，在 2021 年和 2022 年初进行了几次非正式接触后，我于 2022 年 5 月再次写信给南非，概述了我希望进行搜索的具体调查内容。2022 年 6 月，我很感激地收到潘多尔女士的进一步答复，其中表示，南非完全支持知名人士的工作和任务，并将尽一切努力查找我所索要的资料。

62. 尽管自 2015 年以来每年都向南非提出请求，但没有收到任何文件。下文将进一步讨论这一问题。在编写本报告时，没有收到南非的进一步答复，但我注意到，在我最近一次写信之后时间有限。如果收到南非的进一步答复，将转交给秘书长。

瑞典

63. 针对我 2018 年 3 月的请求，2018 年 4 月，我获悉瑞典已任命 Mathias Mossberg 为其独立任用人员。2019 年 5 月，Mossberg 先生提交了最后报告，其中确认外交部于 2018 年 9 月 9 日允许他全面和不受限制地查阅所有档案。他不受限制地搜寻了所有档案和记录，包括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及私人档案。2019 年报告讨论了该报告的结果。

64. 鉴于瑞典独立任用人员编写的 2019 年报告非常全面，我没有具体的尚未得到回复的索要资料请求。然而，2020 年至 2022 年期间，我有理由就进一步的事项，包括法医照片分析和相关弹道测试以及核实某些信息，寻求瑞典及其独立任用人员的协助。这些事项将在下文相关专题领域下讨论。

65. 此外，2021 年，我获悉，在瑞典议员 Gudrun Brunegård 主持的一个小组对瑞典档案进行非正式审查之后，瑞典议会召开了一次会议。该小组的研究工作得到了独立研究员 Simensen 和 Melber 的协助(他们两人都为我在当前和以往授权任务下的工作提供了信息)。据称，该小组的工作是进行研究，以确定瑞典档案中是否有更多相关文件，并了解瑞典政府在早期调查中的作用、反应和参与，特别是考虑到 1960 年代初瑞典的地缘政治和外交形势。

66. 在我 2020 年至 2022 年的整个工作过程中，Simensen 向我提供了大量资料，包括在 Brunegård 小组的研究工作中收集到的资料。本报告在下文相关专题标题下酌情对这些资料进行了评估。虽然有些资料超出了我的任务范围，例如涉及国内政治考量的资料，但鼓励本着善意采取补充性举措。在这方面，我承认瑞典愿意支持大力开展这一主题领域的工作，以最终增进我们在集体寻找事件真相过程中的知识。

联合王国

67. 针对我 2018 年 3 月的请求，联合王国于 2018 年 11 月表示，它不打算任命一名独立任用人员，因为对调查有直接价值的所有资料都已提供。我在给联合王国的答复中强调了为什么我认为联合王国的档案中似乎极有可能存在尚未披露的其他相关资料。

68. 2019年5月，在我最初提出请求15个月后，在收到其他独立任用人员的最后报告的最后期限之后，联合王国表示已任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敏感问题高级审查员、前大使Graham Hand为审查员。2019年6月，Hand先生给我回信，称获得了必要的接触机密文件许可，并且充分了解英国政府文件。但是，联合王国不会提供进一步资料，因为他说，联合王国已全面彻底地审查了其记录和档案，并提供了所有相应文件。我提出的具体询问没有得到答复。出于2019年报告中概述的原因，我在该报告附件中附上了我2019年3月给联合王国的信函，指出该信函中提出的问题没有得到答复，这些问题可以作为今后审议的基础。

69. 2020年3月，我写信给联合王国，转达了2019年报告的调查结果，重申了先前提出的具体索要资料请求，并要求联合王国任命一名独立任用人员。2020年7月，联合王国表示，Hand先生将继续担任联合王国独立任用人员，并请我向他提出任何具体问题。据此，我于2020年8月写信给Hand先生，按照建议概述了具体问题，解释了为什么我认为联合王国创建了或掌握着未披露的记录，提供了应审查其记录的相关个人和实体的身份，并要求任何回复都包括一份详细清单，列明已搜寻的档案、被排除在搜寻范围之外的档案以及适用于这项工作的方法，包括所用的搜索词。

70. 我很感激Hand先生在2020年12月作出答复，其中保证联合王国将充分致力于此事。然而，答复信没有提供任何新信息，也没有对我提出的多页具体询问作出任何答复。Hand先生重申他以前的观点，即英国政府掌握的载有与已故秘书长之死调查有关资料的所有文件均已找到，并已根据以前的要求提交。他再次请我在了解到可能源自英国系统的文件时提出更多询问。

71. 2021年，我与联合王国进行了类似的通信，联合王国向我保证会充分合作，并请我提出其他来源提供的信息所引起的具体询问。我确实提出了这些询问，2021年8月收到的回复与Hand先生2020年12月的回复相似，即所有相关资料都已提供或已发布并可公开获得。我还向联合王国提出了津巴布韦独立任用人员的意见，即在津巴布韦独立之前，罗德西亚当局“小心翼翼地移除了几乎所有与达格·哈马舍尔德坠机事件有关的记录或档案”。

72. 联合王国独立任用人员在2020年和2021年的答复中没有回应我提出的具体索要资料请求。我曾要求提供一份清单，列明已搜寻的档案、被排除在搜寻范围之外的档案以及适用于这项工作的方法，包括所用的搜索词，但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73. 应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邀请，我于2022年6月致函联合王国，提出了我注意到的新信息引起的进一步的具体询问。2022年7月收到了答复，下文第五节将做进一步讨论。

74. 考虑到我收到的其他资料，包括公开资料，仍有理由相信，联合王国的记录和档案中还存在其他未披露的资料。我将在下面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

美国

75. 针对我 2018 年 3 月的请求, 2018 年 4 月, 我获悉美国已任命了一名独立任用人员, 2018 年 10 月, 由国务院国际组织事务局代理首席副助理国务卿 Joseph Manso 接替。2019 年 4 月, Manso 先生表示, 美国的搜寻工作很全面, 涵盖了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我收到一份文件, 在 2019 年的报告中对其进行了评估。Manso 先生没有就实质性问题提交中期报告或最后报告, 也没有对我提出的具体询问作出任何答复, 只表示仍在进行更多搜寻, 但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出于 2019 年报告中概述的原因, 我在该报告的附件中附上了我 2019 年 3 月给美国的信函, 指出该信函中提出的问题尚未得到答复, 这些问题可以作为今后审议的基础。

76. 2020 年 3 月, 我写信给美国, 转达了 2019 年报告的调查结果, 重申了先前提出的具体索要资料请求, 并要求美国任命一名独立任用人员。我还要求提供关于 Manso 先生在 2019 年提到的搜寻结果的最新情况, 包括已进行搜寻的档案清单。我收到的答复是, 由于 COVID-19 大流行, 美国当时无法做出回应。尽管我进一步致函, 但在 2020 年没有收到美国的答复。

77. 2021 年, 我又写信给美国, 概述了具体问题, 再次向美国提出请求。我还附上资料, 解释为什么我认为美国创建了或掌握着未披露的记录, 具体说明了应审查其记录的相关个人和实体的身份, 并要求在任何答复中包括一份详细清单, 列明已搜寻的档案、被排除在搜寻范围之外的档案以及适用于这项工作的方法, 包括所用的搜索词。我很感谢 2021 年 8 月有机会与美国新任独立任用人员、国务院国际组织事务局副局长 David McFarland 交谈。

78. 2021 年 11 月, McFarland 先生写信给我, 表示美国已与情报界联系, 以确定是否可能存在任何新资料。这包括与国家情报局局长 Avril Haines 接触, 后者已责成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搜寻当代档案记录。据 McFarland 先生说, 由中央情报局协调的这次搜寻取得的唯一结果是确定了 1961 年 9 月 18 日和 19 日的两份总统情报清单。除了这两份文件外, 据称“当时审查的或之后获得的所有资料都没有提到坠机事件或哈马舍尔德之死”, 尽管据说中央情报局、国防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都进行了彻底搜寻。

79. 美国独立任用人员 2021 年的答复没有回应我提出的具体索要资料请求。我曾要求提供一份清单, 列明已搜寻的档案、被排除在搜寻范围之外的档案以及适用于这项工作的方法, 包括所用的搜索词, 但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80. 2022 年 6 月, 我写信给美国, 提出了我注意到的新信息引发的进一步的具体询问。虽然在本报告定稿时我还没有收到答复, 但我注意到, 在我最近一次写信之后时间有限。如果收到美国的进一步答复, 将转交给秘书长。¹

¹ 在 2022 年 7 月向秘书长提交报告后, 我收到了美国对我 2022 年 6 月信函的答复。美国的答复让我参考其 2021 年 11 月的信函, 并指出, 关于我提出的具体询问, “搜寻工作没有发现任何此类记录”。没有对其他具体问题作出答复或提供资料。

81. 考虑到我收到的其他资料，包括公开资料，仍有理由相信，美国的记录和档案中还存在其他未披露的资料。我将在下面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

赞比亚

82. 针对我 2018 年 7 月的请求，2019 年 2 月，我获悉赞比亚已任命总统办公室主任 John Zulu 为独立任用人员。2019 年 6 月，Zulu 先生提供了由他和外交部长共同签署的最后报告，其中确认他已获准充分和不受限制地查阅所有记录和档案，包括情报、国防和安全档案，无论其密级如何。我在 2019 年的报告中讨论了该报告的结果。

83. 2022 年 5 月，我写信给赞比亚，提出了个别研究人员提请我注意的新信息引起的进一步询问。Zulu 先生确认收到了我的信，并将进行搜寻。虽然在本报告定稿时我还没有收到答复，但我注意到，在我最近一次写信之后时间有限。如果收到 Zulu 先生的进一步答复，将转交给秘书长。

津巴布韦

84. 针对我 2018 年 7 月的请求，2018 年 10 月，我获悉津巴布韦已任命参议员、前国防和国家安全部长兼国务秘书 Sydney Sekeramayi 为独立任用人员，由 Asher Tapfumaneyi 准将及其团队提供协助。2019 年 5 月，津巴布韦独立任用人员提交了最后报告，其中确认他已获准充分和不受限制地查阅所有文件和档案，无论其密级如何，包括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Sekeramayi 先生指出了他在工作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在津巴布韦独立之前，罗德西亚当局已“小心翼翼地移除了几乎所有与达格·哈马舍尔德坠机事件有关的记录或档案”。

85. 继津巴布韦独立任用人员 2019 年的工作之后，2020 年，我与津巴布韦政府及其独立任用人员进行了通信，后者继续在我先前确定的领域进行搜寻。这包括对剑桥大学、埃塞克斯大学和牛津大学的档案进行搜寻。2020 年和 2022 年之间，在 Sekeramayi 先生和他的团队在津巴布韦境内外所做工作的基础上，向我提供了几份报告和重要的新资料。Sekeramayi 先生在其中一份报告中指出，对 Denard、Hoare、Puren 和 Van Risseghem 等雇佣兵在加丹加的一名已知同伙进行的某些调查表明，这可能是一个仍有待追查的潜在信息来源。调查工作因 COVID-19 大流行的影响而受阻，在编写本报告时，这一调查线索尚未产生足以评估的信息，但注意到这是未来的一个潜在信息来源。

86. 我再次非常感谢津巴布韦独立任用人员所做的工作以及为支持知名人士的任务而提供的领导和合作。从津巴布韦独立任用人员的工作中获得的关键信息将在以下相关专题领域下讨论。

87. 针对 Sekeramayi 先生提供的信息以及关于罗德西亚和尼亚萨兰联邦前联邦内政部长档案的新信息，我于 2022 年 5 月和 6 月写信给 Sekeramayi 先生，要求做进一步搜寻。鉴于搜寻重点是情报、安全和国防来源，我以前没有要求对内政部档案进行搜寻，但这似乎是一个潜在的额外信息来源。虽然在本报告定稿时我

还未收到答复，但我注意到，在我最近一次写信之后时间有限。如果收到 Sekeramayi 先生的进一步答复，将转交给秘书长。

C. 联合国档案

88. 同往年一样，我确认我可以不受限制地查阅联合国所有档案，不论其密级如何。秘书长告知我，除 23 份档案外，联刚行动的所有档案均已公开，不受任何限制。根据联合国的既定政策，这 23 份档案依然处于“绝密”状态。在 2018/19 年度，我获准不受限制地查阅这 23 份档案。如 2019 年报告所述，根据我向会员国提出的相同的“相关性”定义，这些档案中没有任何与达格·哈马舍尔德调查有关的资料。

89. 2022 年，档案和记录管理科告知我，正在进行联刚行动档案的数字化工作。我感谢该科多年来及时提供协助。这些资料的数字化是提高透明度的一个重要手段，因为数字化后可以在线查阅信息和核实源文件。

D. 对会员国答复的意见和资料搜寻工作遇到的限制

90. 在 2019 年的报告中，我得出结论认为，就这一事项的资料搜寻工作不能说已经结束。这一结论在目前的任务下得到了加强。

91. 从以下章节中可以看出，2020 年至 2022 年期间发现并分析了大量新资料。在此期间，几乎所有具有证明价值的资料都来自个人的工作，而不是由会员国提供。

92. 许多会员国提供了相当程度的合作。然而，不能说所有会员国都以足够的透明度进行了全面搜寻，从而使我们可以完全相信所有潜在的相关资料都已被找到。尽管大会明确敦促，而且我要求提供的信息非常具体，但被确定为几乎肯定掌握相关信息的少数几个会员国似乎最不愿意进一步披露信息。

93. 在历史档案中进行搜寻存在操作上的困难。在技术层面上，这些困难包括，例如，那个时代的许多档案没有数字化，需要投入大量人力进行人工搜寻。即使材料已被扫描并可进行电子搜寻，搜寻结果也可能不尽人意，原因是老式排版或手写文件的数码字符识别度低、材料质量下降或使用了不同的单词拼写方法。通常需要进行人工审查。

94. 除了搜寻工作遇到的技术困难外，还有一些实质性的困难。其中包括，如果对这一问题和 1961 年刚果境内及周边的关键事件没有适当的背景知识，搜寻人员可能不知道某些信息可能是相关的。例如，他们可能不了解相关人员的身份，或者不了解某些地点的地理位置或飞机类型的重要性。简而言之，如果一个会员国仅仅搜索“哈马舍尔德”或“飞机失事”等关键词，即使是在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中进行这种搜索，也无法确保全面搜索。下面举一个例子，但并非专指某个相关会员国。美国在 2021 年提供的两份总统情报清单文件分别提到“哈马舍尔德的飞机”和“哈马舍尔德之死”，并解释说，“当时审查的或之后获得的[其他]资料都没有提到坠机事件或哈马舍尔德之死”。不管是否真是这样，正如我在 2019 年 3 月 24 日给美国的信(2019 年报告附件)和 2020 年至 2022 年的各种信函中向美国概述的那样，有许多具体询问需要答复，但尚未收到答复；还有各种重要的

搜寻领域，其范围比直接提到飞机坠毁的范围更广。事实上，2019 年的报告充满了由个别研究人员提供的来自美国记录的信息实例，这些例子突显了在哪些领域肯定存在进一步的信息。

95. 我在 2017 年解释了上述原因，当时我为会员国制定了详细的搜寻标准，包括人员姓名、设备、主题事项和地点。2019 年，部分出于类似原因，我要求任命独立任用人员，目的是让他们既能不受限制地查阅档案，又能充当中央协调人。在阅读以前的报告和信函后，他们必然会对主题事项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这是有益的。如果会员国按照设想开展这些进程，结果非常好(见 2019 年报告，第二.B 节)。然而，由于在某些情况下没有按照设想开展这些进程，就这一事项的搜寻过程不能说是完全令人安心或完整的。这是一个问题，我在下文中会再次谈到。

三. 关于坠机的可能原因的新资料

96. 本节介绍并分析 2020 年至 2022 年期间会员国和个人提供的关于坠机可能原因的新资料。对某项资料是否具体评估其证明价值，取决于资料的性质和类型。如果资料不完整或需要进一步查证，则会予以说明。本节讨论的新资料在调查结果累积摘要中做了汇总，见随附的执行摘要。

97. 尽管时间久远，但与坠机可能原因相关的知识体系仍在不断取得重大进展。在本任务期间，又发现了一些新资料，涉及可能截获的有关通信、雇佣兵飞行员或其他特工可能参与蓄意攻击 SE-BDY 航班、任何此类行动中可能使用的飞机类型、对 SE-BDY 航班进行地面攻击或破坏的可能性、外国行为者(包括情报机构和人员)的存在和作用及有关事项。

A. 空中或地面攻击或其他外来威胁

98. 近年来披露的重要新资料表明，SE-BDY 航班在最后降落恩多拉机场时可能受到了攻击或威胁。如果发生这样的事件，可能会直接导致飞机坠毁，或者导致飞行员在着陆进场的关键时刻分心。攻击或威胁的有形证据痕迹是重要的信息，但仅仅缺乏这种痕迹并不能排除发生这种事件的可能性。自独立小组完成审查以来，每年都继续收到关于这一主题的新的相关信息，包括在 2020 年至 2022 年期间。

99. 2019 年报告在本标题下审查的被认为具有证明价值的信息包括：

(a) Paul Henry Abram 说，1961 年 9 月 17 日至 18 日晚，他在希腊 Irakleio (Heraklion) 的一个美国国家安全局监听站工作时，无意中听到一架飞机受到攻击的无线电通信。2017/18 年，Abram 在 2018 年底去世之前向我提供了有关他的服役和教育经历的更多记录，这些记录倾向于支持他的说法。2018/19 年，我曾给美国机会，让其提供有关 Abram 的服役记录或说法的资料或澄清说明，但美国没有提供；

(b) Charles Southall 说，1961 年 9 月 17 日至 18 日晚，他在尼科西亚附近的国家安全局通信拦截设施工作时，无意中听到一架飞机受到攻击的无线电通信。至少从 1960 年代起，Southall 就一直向瑞典和美国官员通报此事，称他听到的是

中央情报局截获并与国家安全局分享的无线电通信，其内容描述了对被认为是哈马舍尔德飞机的攻击；

(c) 罗德西亚官员在整个 1961 年一直都在截听联合国的通信，包括机密的加密军事通信。截听活动和截听到的内容在高级别进行讨论，包括由英国高级专员 Alport 勋爵、美国驻伊丽莎白维尔领事 William C. Canup 及罗德西亚和尼亚萨兰联邦总理 Roy Welensky 爵士以及各自的首都进行讨论。对津巴布韦国防军档案的审查表明，罗德西亚联邦当局当时拥有无线电信号拦截能力，并且在监测加丹加的通信；

(d) 恩多拉空中交通管制员 Arundel Campbell Martin 在 SE-BDY 航班坠毁前与该航班进行了最后一次已知的对话，但他没有记录这些对话，这有悖当时的政策。此外，Martin 说他销毁了原始谈话笔记，尽管他承认他知道这架飞机和机上乘客是非常重要的。是否可能制作了空中交通管制通信的其他记录(如磁带)但未予以披露，这是下文讨论的问题；

(e) 比利时雇佣兵 Jan Van Risseghem 是 1961 年为加丹加飞行 Fouga、De Havilland 和 Dornier 飞机(可能还有其他飞机)的若干 Avikat 飞行员之一。据称 Van Risseghem 承认对 SE-BDY 航班进行了空袭，但这一点没有得到证实。无法确定 Van Risseghem 是否在 1961 年 9 月 17 日之前返回了加丹加。如下文相关专题领域下讨论的那样，为加丹加服务的其他各种 Avikat 人员和雇佣兵当天都在加丹加或恩多拉；

(f) 1961 年 2 月，一家美国商业航空公司向加丹加交付了 Fouga Magister 飞机。所审查的证据表明，与向 1961/62 年调查所作的陈述相反，Fouga 飞机能够进行空对空攻击并在夜间使用，而且它曾攻击过加丹加的外国飞机；

(g) 1961 年 8 月，Heinrich Schäfer 和 Jean Cassart 驾驶一架多尼尔 DO-28 飞机从西德起飞，运送到加丹加供 Avikat 使用。这架飞机后来显然被改装用于空袭和轰炸。它对联合国实施了日夜轰炸行动，似乎至少有一次企图进行空对空攻击。1961 年 9 月，它在加丹加、北罗德西亚和布拉柴维尔等地之间进行了国际飞行；

(h) 恩多拉及其周边可用的机场数目比早期调查最初认为的要多，Avikat 部队既使用加丹加的机场，也使用北罗德西亚的机场。北罗德西亚军方知道 Avikat 使用它的机场；

(i) 大量北罗德西亚部队，包括武装士兵、物资和飞机，沿加丹加边界集结，处于战斗准备状态，有时还驻扎在加丹加境内；

(j) 不排除在 SE-BDY 航班即将着陆前，可能单独或与空中攻击相结合对该航班进行了地面攻击。然而，从独立小组的证明性评估来看，乘客的死因是坠机本身瞬间造成的，而不是坠机落地后的暗杀等原因。

100. 2020 至 2022 年间收到的信息拓展了 2019 年分析的信息，并提供了以下新信息。

1. 无线电通信

(a) Paul Abram

101. 2015 年，独立小组评估了前美国空军安全事务官员 Paul Abram 提供的资料，其中他描述了 1961 年 9 月 17 日午夜至 18 日凌晨在希腊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的一个国家安全局监听站听到的关于在刚果或其附近击落一架飞机的无线电通信。Abram 表示，他将这些信息录在一盘磁带上，这盘磁带应该交给了位于马里兰州米德堡的国家安全局，以及英国情报安全组织——政府通信总部。

102. 2015 年至 2017 年期间，美国起初没有回应索取有关 Abram 服役记录信息的请求，后来又表示没有关于他的信息。在 2017 年收到来自 Abram 的进一步信息(包括他的空军编号和服役记录、服役和教育记录以及代号/代码“AbelBaker”)后，美国于 2019 年确认 Abram 是一名语音侦听规程专家。然而，尽管美国在 2019 年 4 月表示已经扩大了搜索工作，纳入了更多的美国情报机构，但没有提供任何信息证实 Abram 所称的服役历史，或者证实或推翻他的说法。

103. 2019 年，在审查其他信息的过程中，我评估了 Abram 提出的说法，认为有关美国在监控无线电通信的主张具有很强的证明价值，与对 SE-BDY 的攻击有关的说法具有中等的证明价值。我还指出，美国很有可能创建了相关录音内容记录。

104. 2019 年报告完成后，我在 2020 年获悉 Abram 去世。美国没有把握机会，在他仍然在世、能够对任何相反的说法作出回应时，最终澄清他的服役历史和说法。

105. 2021 年，我从志愿研究人员 Rosato 那里得到了关于 Abram 服役历史的新信息。这部分信息包括 Abram 在相关时期似乎是在位于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的第 6930 号无线电移动小组服役，该小组的任务是监控语音传输。其他似乎在 1961 年加入第 6930 号无线电移动小组的人包括 Roger Adams、Gerald Bussure、Ora Clark、Stephen Gellman、Ronald Hei、Brian White、Robert Ampula 和 Salvatore Lamanna。

106. 2022 年，我向美国转达了这一信息，并请求回应。具体而言，我请求美国在彻底搜索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的记录后，确认有关 Abram 所称事件的任何信息或细节，包括是否存在记录，是否询问过 Abram 的同事(包括上文所列的同事)和相关机构，任何这种调查的结果以及美国内部对 Abram 所提说法的任何调查的全部细节。未收到任何回复。

107. 新的信息必须结合之前分析的信息加以考虑，包括 Abram 于 2017 年 7 月最后重申他在有关日期确实在克里特岛，就他所称的持有安全许可并且专长是语音侦听规程专家所提供的信息，他说他在国家安全局监听设施执行的任务的性质，以及让人相信他在相关时间与所提到的同事在第 6930 号无线电移动小组工作的新信息。总体而言，我确认我之前的评估，认为 Abram 的说法具有很强的证明价值，即美国当时正在监控无线电通信，并且美国很有可能创建了相关录音内容记

录。关于 Abram 无意中听到对 SE-BDY 的攻击的说法，我继续将这部分信息的证明价值评估为“中”。

(b) Charles Southall

108. 2015 年，独立小组评估了 1961 年驻扎在尼科西亚附近国家安全局通信设施的前美国海军军官 Charles Southall 提供的信息。至少从 1960 年代起，Southall 就一直向瑞典和美国官员通报，1961 年 9 月 17 日午夜至 18 日凌晨，他在该地点为国家安全局服务时，无意中听到了与国家安全局共享的中央情报局的无线电侦听，其中描述了对据信是哈马舍尔德飞机的攻击。

109. 2015 年，美国没有回应索取有关 Southall 服役记录信息的请求。2016 年，美国确认 Southall 于 1955 年加入海军，1969 年解除现役，1978 年作为指挥官从海军预备队退役。然而，尽管自 2016 年以来每年都向美国提出请求，但没有收到任何信息来证实或推翻索索尔的说法，包括对所提出的 Southall 驻扎在哪里，他是否为国家安全局工作，或者是否创建了他所说的录音记录等问题，都没有任何回应。

110. 2019 年，在审查其他信息的过程中，我评估了 Southall 提出的说法，认为有关美国在监控无线电通信的主张具有很强的证明价值，与对 SE-BDY 的攻击有关的说法具有中等的证明价值。我还指出，美国很有可能创建了相关录音记录。

111. 2021 年，我从 Rosato 那里得到了关于 Southall 服役历史的新信息。这部分信息包括可公开查阅的美国海军记录(1949-1971 年第 2339 号海军名册，以及 1961 年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现役军官和准尉登记册)，似可证实 Southall 在相关时期至少在 1961 年 7 月至 10 月期间在尼科西亚的国家安全局服役，编号为 1310 和 1610，他接受过密码战训练。此外，Southall 似乎与其他人一起驻扎在该地点，包括 Gaspare Tamburello、Paul Dillingham、William Hawley、Robert Jennings、Robert Perusse、Leory Sommer 和 Wat Tyler Cluverius。Southall 此前曾提到 Cluverius 的名字，并表示后来当 Cluverius 被任命为美国外交官时，他曾就此事打电话给 Cluverius，但 Cluverius 表示“我不能谈论此事”，因为当时使用的是一条公开的电话线路。后来，还没等到 Southall 能够有机会与 Cluverius 当面谈论此事，Cluverius 就去世了。

112. 2022 年，我向美国转达了有关 Southall 服役记录的进一步信息，并请求回复。具体而言，我请求美国在彻底搜索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的记录后，确认有关 Southall 所称事件的任何信息或细节，包括是否存在记录，是否询问过 Southall 的同事(包括上文所列的同事)和相关机构，任何这种调查的结果以及美国内部对 Southall 所提说法的任何调查的全部细节。我要求美国列入 1990 年代或其后进行的任何内部调查，包括但不限于情报和研究局 1991 年至 1993 年期间的任何报告和信件。未收到任何回复。

113. 这一新的信息必须结合之前分析的信息加以考虑，其中包括美国显然承认 Southall 在作为海军预备队指挥官退休之前曾在美国海军工作，他的专长是担任“处理和报告”军官，他于 1961 年被派往尼科西亚附近的海军通信设施。Southall

对许多人的说法都是一致的，至少从 1967 年到 2013 年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如此，因此，新的信息似乎证实了他在 1961 年 7 月或前后被派往尼科西亚，可能是与特别指明的同事一起，在那里他有两个代号，1310 和 1610，后者的专长是密码战。总体而言，我确认我之前的评估，认为 Southall 的说法具有很强的证明价值，即美国当时正在监控无线电通信，并且美国很有可能创建了相关录音内容记录。关于 Southall 无意中听到对 SE-BDY 的攻击的说法，我继续将这部分信息的证明价值评估为“中”。

(c) 拦截和知悉哈马舍尔德的旅行安排

114. 2022 年，志愿研究人员 Simensen 根据 Picard 对上加丹加矿业联盟(矿业联盟)档案的研究，提醒我注意一份资料，内容是 Conor Cruise O'Brien 于 1961 年 9 月 17 日 16 时 25 分从恩多拉发送的哈马舍尔德给英国驻加丹加领事丹齐尔·邓内特的一封电报。这条消息就像其他的矿业联盟消息一样(另见下文第四.A.1 节)，可能通过比利时工程师 Manfred Loeb 安装的无线电设备转发，并受到英国秘密情报局(军情六处)特工 Neil Ritchie 监听，消息称确认哈马舍尔德“今天将尽早”前往恩多拉。正如 George Ivan Smith 的笔记中所讨论的那样(例如，见 2017 年报告，第四.A.3 节)，Jacques de Troyer 曾告知克洛德·德凯穆拉里亚雇佣军事先知道哈马舍尔德的旅行计划，因为他们读过一份大意如此的电报，我认为当时提到的可能是这条消息。

115. 哈马舍尔德的预先旅行计划似乎也立即被传达给了英国(很可能是由 Ritchie 传达的)，因为掌玺大臣爱德华·希思 1961 年 9 月 17 日给英联邦事务国务大臣邓肯·桑迪斯的一封信确认，“冲伯和哈马舍尔德定于今天下午在恩多拉举行会晤”。Alport 将飞去迎接哈马舍尔德，但他将留在幕后。载有高级专员署代表的直升机正在去接冲伯。最后一句提到去接冲伯的“高级专员署代表”显然是指 Ritchie。这一信息也在 Alport 勋爵 1961 年 9 月 25 日给桑迪斯的信件中有所反映，该信件证实，在哈马舍尔德离开之前，Alport 勋爵在 1961 年 9 月 17 日已经通过电话得知了这次会面。

116. 与此相关的是，邓内特在他的回忆录中(如下所述)说，他“接到指示，要前往基普西，护送冲伯去恩多拉，冲伯将在恩多拉与哈马舍尔德会面”。他从何处获得的指示尚不明确；但是，鉴于 Ritchie 的报告载于 Alport 的文件中，而且这两名英国人以及邓内特和 Landsdowne 勋爵在哈马舍尔德去世前后会过面，因此，将 1961 年 9 月 18 日 Landsdowne 的报告及任何相关报告标记为或可与联合王国后续跟进。

117. 我在 2017 年的报告中指出，“第三方在刚果和恩多拉拦截联合国通信的任何行动都令人关切。但更重要的是，是否有可能拦截了有关秘书长访问恩多拉的旅行安排以及有关活动的通信。如果这些通信确实被截获或以其他方式获取，那么联合国为保证这一行程的机密性而做的努力(包括 Hallonquist 上尉提议提交一份目的地为 Luluabourg 的假飞行计划)便前功尽弃了。这种拦截联刚行动通信的行为也意味着此次飞行在途中有可能遭遇恶意或敌对行动。我只想指出，尽管早些时候我曾将某些会员国拦截联刚行动通信的可能性的证明价值评定为‘中’，

但我不知道有任何证据证明 1961 年 9 月 15 日至 17 日秘书长在利奥波德维尔期间的通信或与此次致命飞行有关的通信被第三方截获”。

118. 上文提到的掌玺大臣希思于 1961 年 9 月 17 日下午发给国务大臣桑迪斯的电报,推进了先前已知的信息。它表明,英国官员不仅在协调恩多拉当地的活动,他们还将这一情况实时传达回伦敦。这封电报使用矿业联盟的设备发送给在北罗得西亚的邓内特,再转发给冲伯,这突出了先前观察到的事实,即加丹加、罗得西亚联邦、联合王国和矿业联盟的官员在哈马舍尔德飞往恩多拉的航班起飞前就知道了他计划的行动。在这方面,Simensen 也回顾说,助理专员 Hicks 在 1961 年联合国委员会作证时指出,早在 1961 年 9 月 16 日,就有计划讨论哈马舍尔德和冲伯在恩多拉机场空中交通管制塔进行会晤的可能性。

119. 与此相关的是,Rosato 提醒我注意,1961 年 9 月 19 日《纽约时报》一篇题为“刚果恐有新动乱,联合国秘书长的主要助手失踪”的文章说,“刚果政府消息来源报告说,三名比利时人和一名刚果人因被指控‘泄露联合国的飞行计划和时间表’而被捕”。虽然这里提到的是指控而不是调查结果,但这篇报道表明,早在坠机后的第二天,就有人怀疑 SE-BDY 的飞行计划没有得到严格保密。

120. 与此相关的是,Simensen 在 2022 年提醒我注意,包括美国和刚果在内的其他国家政府可能也已经提前知道秘书长将亲自前往会见冲伯。1961 年 9 月 16 日,哈马舍尔德给 Bunche 的一封电报提到,哈马舍尔德已经通知“内阁”(根据上下文理解为刚果内阁),哈马舍尔德建议与冲伯会面,讨论可能的停火(当时提议的地点是 Bancroft,也在北罗得西亚,靠近与加丹加交界处)。哈马舍尔德证实,已向英国和美国大使通报了这一情况,并可由 Bunche 在纽约进一步向其他代表团通报。

121. 有关第三方预先知道哈马舍尔德旅行计划的新信息证实了 SE-BDY 航班的目的地和时间不是秘密的说法。因此,尽管飞行员试图保持低调,但该航班在飞往恩多拉的途中可能遭到恶意或敌对行动。据回顾,已知的情况包括联合国在刚果的通讯遭到拦截和监测,英国和矿业联盟的中间人在 SE-BDY 航班从利奥波德维尔启程之前就在协助冲伯安排与哈马舍尔德的会晤。有鉴于此,我认为,事先知晓秘书长访问恩多拉的旅行安排的人比早期调查所知的更多,这一点具有中等的证明价值。

(d) 罗德西亚官员截获的通信

122. 2018/19 年,津巴布韦独立任用人员提供了包括安全部门档案在内的材料,证实“罗德西亚联邦当局当时有无线电信号拦截能力,当时正在监控加丹加地区的通信”。对于这一看法,Rosato 补充的信息显示,罗德西亚和尼亚萨兰信号部队专门负责监测和拦截北罗德西亚的无线电传输。该实体的任何记录均未披露,因此无需对该信息进行具体评估。然而,我将此事标记为或可进一步调查,因为信号部队的记录(如果有)可能包含重要信息。根据 Rosato 的进一步观察,Don Grainger 中校在 1961 年担任了该部队的指挥官。如果可以获得 Grainger 的个人

记录，也可能以此作为信息来源。虽然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确认这一来源是否可用，但我将其标记为或可后续跟进。

(e) 空中交通管制在通信方面的作用

123. 据回忆，根据 1961 年 9 月 25 日 Alport 勋爵给国务大臣桑迪斯的通信(以及如他在《突发任务》中的自传所述)，他怀疑在恩多拉的美国 Dakota 飞机可能听到但未报告来自 SE-BDY 的无线电传输信息；同样，他的私人秘书 Brian Unwin 似乎也持类似观点(见 2017 年报告，第五.C.2 节)。关于 SE-BDY 的最后一次已知通信，Alport 勋爵在给桑迪斯的信件中也指出，“恩多拉管制中心与飞机失去了联系，尽管后者似乎正在向其他目的地发送信息”。这一说法的依据尚不清楚。两天后，一架飞过恩多拉的联合国飞机被其中一架 Dakota 飞机而不是恩多拉的空中交通管制部门引导回机场(进行这一沟通的美国人员后来受到北罗得西亚官员的严厉批评)，这一事实加深了 Alport 勋爵的怀疑。

124. 1961 年 9 月，中央情报局刚果站站站长 Larry Devlin 也提到，美国的 Dakota 飞机可能与 SE-BDY 进行了沟通，但未作披露。正如 Rosato 提醒我注意的那样，2004 年 9 月，在关于 1960 年至 1961 年刚果危机的关键口述历史会议上，Devlin 公开报告说，一名美国驻恩多拉的空军武官“提前就与[SE-BDY 的]飞行员保持着联系”。如果属实，Devlin 明显提到该空军武官在 SE-BDY 前往恩多拉途中与其进行通信的说法至关重要，因为这种通信没有正式披露过。这也是我标记为或可后续跟进的事宜。

125.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人员(下文三.A.5 节更详细地讨论他提供的资料)注意到，恩多拉空中交通管制员 Martin 在早期调查中提供的证据前后不一致。他特别注意到，尽管 Martin 给罗德西亚调查局的证词声称，在相关时间他独自在管制塔，但他后来告知罗德西亚调查局和联合国委员会，其他人也在场，Unwin 和 Alport 后来也提到了这一点。此外，Martin 表示，他在向罗德西亚调查局提供的证据中提到 SE-BDY 表现“奇怪”的原因是它正从西边接近恩多拉。然而，这似乎并不是奇怪的行为，因为这是在恩多拉着陆正常的仪表进近方向，从杰普森手册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

126.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曾有一次经过协调的空中和(或)地面攻击，攻击者之间必然会使用无线电通信。第二，如果无线电通信受到干扰(故意干扰)，这可能会被其他监测电波的人员注意到。SE-BDY 在最后时刻的通信记录缺失，这样的问题让人更有动力搜索有关该主题的未披露信息，并突显出现有信息存在严重的不一致，如 Martin 叙述中的不一致。最重要的是要确定是否可能曾创建或存在任何其他未披露的无线电通信记录，特别在 Martin “毁掉了”他与 SE-BDY 在坠机前的无线电交流记录的情况下(他在早期调查作证时是这么说的)。

(f) 潜在无线电干扰

127. 上一小节提到的匿名研究人员假定，根据提到飞机坠毁当晚无线电通信问题的记录，攻击者可能从恩多拉机场附近的一个地点使用了无线电干扰(故意干扰)。SE-BDY 和恩多拉空中交通管制中心的最后一次通信发生在午夜过后，当时

SE-BDY 于零时 10 分报告：“已看到你的灯光，在恩多拉上空，正在下降，确认修正海平面气压”，恩多拉方面就此指示，“收到修正海平面气压 1021 毫巴，报告接近 6 000 英尺”。SE-BDY 回复确认修正海平面气压读数，说“收到 1021”，此后没有记录到进一步的通信。如果无线电通信受到故意干扰，或可解释为什么 SE-BDY 在最后时刻没有进一步传输任何信息。该研究人员注意到，有几份记录提到了坠机当晚的通信问题，其中包括 Mufulira 警察局的记录和恩多拉空中交通管制员 Martin 提供的证据，Martin 向罗得西亚调查局表示，在最后一次通话后 20 到 25 分钟内，他多次试图联系 SE-BDY，但没有成功。Martin 告诉联合国委员会，当晚高频无线电的状况很糟糕，并表示“如果情况非常糟糕，我们必须用电传打印机发送一些讯息，因为我们无法解读信号，这可能是由于部分传输受到了干扰”。

128. 匿名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份对无线电传输的详细分析，包括使用的设备和频道。如果匿名来源假设的某些方面是正确的，那么一定创建过或保存有未披露的无线电通信记录。如下文进一步讨论的那样，这些记录如果曾经创建或保存，很可能存放在美国、联合王国和北罗得西亚当局那里。这也是我标记为或可后续跟进的事宜。

(g) 克里普托股份公司

129. 2020 年，我获得了有关瑞士广播电视台、《华盛顿邮报》和德国电视二台等新闻和广播实体开展的调查工作和报道的新信息。作为调查工作的结果，推出了一集电视节目，并发表了以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和联邦情报局被指参与情报行动为主题的书面文章，这些情报行动旨在允许美国和西德秘密获取克里普托股份公司制造的设备中的加密通信。据说这些装置已出售给联合国和各国政府并投入使用。

130. 有说法称，中央情报局和(或)国家安全局利用加密环节中的“后门”，监测哈马舍尔德访问刚果期间使用的 CX-52 型密码机发送的讯息，并同联合王国政府通信总部、可能还与其他国家的情报部门分享情报，此前已对这一说法进行了分析(见 2017 年报告，第五.C.1 节)。2017 年，美国通知我，该国“对此事不予置评”。

131. 瑞士广播电视台、《华盛顿邮报》和德国电视二台的报道可公开查阅，报道的依据据称是中央情报局情报研究中心 2004 年完成的一份 96 页的报告和德国情报官员 2008 年汇编的口述历史。虽然报道中提出的许多说法超出了本调查的时间和实质范围(本调查仅限于可能有助于了解 1961 年 9 月 SE-BDY 航班命运的事件)，但某些方面是相关的。其中包括以下指称：该行动是中央情报局和联邦情报局的联合行动，中央情报局内部最初以“知识宝库”为代号，后来以“卢比孔河”为代号指代该行动，其他各会员国(不仅仅是联合国)可能使用了像哈马舍尔德的 CX-52 密码机这样被破解的加密设备。

132. 据回顾，尽管联刚行动的比约恩·埃格上校强烈要求，但哈马舍尔德的 CX-52 型密码机在坠机后没有立即归还联合国，联合国官员对此感到怀疑。如 2017 年

报告所述，美国驻卢萨卡领事 1961 年 9 月 27 日递送国务院的一份通信称，英国高级专员 Alport 勋爵“奇怪地……拒绝将联邦当局在残骸中找到的密码机和书籍交还联合国代表”。

133. 如果有任何政府能够接触到飞机坠毁前哈马舍尔德用 CX-52 型密码机发出的通信，那么披露这一信息至关重要。来自 2020 年报道的新信息还揭示了另一个重要的维度和调查方向：如果联合王国、美国、西德或其他国家可通过“后门”接触到其他会员国提及坠机事件的任何高层通信，这也可作为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源。应对此类信息进行搜索。

134. 独立小组评估了有关从哈马舍尔德的 CX-52 密码机发送的通信被美国国家安全局以及可能被其他情报机构截获的信息，认为这部分信息具有中等的证明价值，这一评估在 2017 年得到了确认。在我目前的任期内，我曾请联合王国和美国就此事发表意见，但没有收到任何意见或澄清。鉴于现有记录、2020 年收到的新信息以及向会员国提供了充分机会来澄清此事或提出解释，我认为可以确定从哈马舍尔德 CX-52 密码机发出的通信被特定会员国秘密截获或分享。我认为，这些会员国在监听秘书长机密通信这一点具有很强的证明价值。我还认为，这些通信的相关记录很可能已经创建，但并未披露。

135. Simensen 也从档案研究中提供了关于这一主题的新信息。其中包括 1961 年 12 月 16 日英国驻索尔兹伯里代表 Scott 给北罗得西亚政府官员 Chadwick 的一封信电报，是对后者早先所发电报的答复，答复电报被转递给韦伦斯基。Scott 在电报中说，“所收到的证据的累积结果表明，毫无疑问，某些联邦机构深度介入了北罗得西亚和加丹加之间的军事运输。特别是据可靠报告，联邦情报和安全局的恩多拉代表定期向加丹加飞行员介绍和盘问他们频繁进出的情况”。电报接着详细说明了 Scott 相信这一指控是正确的理由，并指出北罗得西亚总理办公室秘书 Parry 曾承认“某些人做了‘一些非常愚蠢的事情’”。

136. Scott 的电报似乎提到了飞机坠毁前后北罗得西亚和加丹加之间的信息、人员和设备转移。在这方面，这似乎加强了以前的调查结果，即罗得西亚联邦可能创建了或持有重要的未披露记录，罗得西亚官员参与了拦截通信(并与联合王国和美国分享)，北罗得西亚部队在北罗得西亚和加丹加之间边界的军事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例如，见 2019 年报告第三.A.1 和三.A.6 节)。如下文第四.A.1 节所述，新的补充信息说明在北罗得西亚建立了一个可能的加丹加部队游击训练区。

(h) **Tore Meijer**

137. 如上所述，Meijer 是埃塞俄比亚空军飞行学校的一名瑞典教官，他说他在 1961 年 9 月 17 日午夜至 18 日凌晨左右无意中听到短波电台的一次谈话。梅耶尔说，这次谈话是在飞行管制人员之间进行的，其中一人在恩多拉机场，飞行管制人员对一架飞机意外地被另一架飞机跟踪表示惊讶。他听到了“恩多拉”这个词，机场管制塔的一个人用英语说，“他正在接近机场。他在转弯。他在拉平。另一架飞机从后面过来了。怎么回事？”，随后传输中断。1961 年 9 月 18 日或 19 日，Meijer 将此事告知或试图告知埃塞俄比亚空军司令、美国同事和泛航在刚果

的总工程师 Bo Virving。他后来向记者描述了这一事件，1994 年 3 月《每日新闻》的一篇文章反映了这一情况。

138. 2019 年，与梅耶尔的遗孀取得了联系，但她无法提供有关此事的进一步信息。2022 年 5 月，我写信给埃塞俄比亚，请求进行具体搜索，寻找关于一份显然是由 Meijer 于 1961 年向埃塞俄比亚空军司令提交的报告的任何信息。在编写本报告时，尚未收到埃塞俄比亚的答复。这被标记为后续跟进的事宜。

2. 新发现的 1961 年进行检测的照片

139. 2019 年，我从瑞典独立任用人员那里获得了新的文件资料，包括照片，来自北罗德西亚警察局助理警司 Michael Cary 的记录。Cary 是第一批到达坠机地点的人之一，并参与了初步调查。他还参与了对残骸上的金属板进行弹道测试，目的是确定子弹从不同角度穿透金属对金属的影响；正如瑞典独立任用人员在 2019 年所指出的，这些测试是根据瑞典专家在 1961 年的要求，于 1961 年 10 月 25 日在罗德西亚调查局工作期间进行的，当时有许多人在场，包括 Cary、Evans、Landin 和 Danielsson。

140. 我收到的一些照片似乎显示金属板上有孔洞，这些照片似乎没有在早期调查的报告中讨论过。相关照片所拍内容分别是：一片有大约 1 厘米大小的圆孔的金属；一片被举着的金属，上面有三个看上去相同的孔洞，以及一个相框膜，在几乎中间的位置有一个类似的孔洞(照片上的印章和日期与前一张相同)；一片长条金属板，有一个看上去与另外两张照片上的孔洞非常相似的孔洞(这张照片的背面写着“支持 3 号发动机冷却器”和“334/61”，也印有相同的印章，日期为“1961 年 10 月 20 日”)；机翼的一部分，有一个看起来与其他照片类似的孔洞(这张照片的背面写着“右翼”和“pw 334/61”，日期和印章与前一张相同)。

141. 瑞典警方和瑞典国家法证中心在 2019 年进行的非正式分析表明，所显示的孔洞可能是小口径武器的弹孔。因此，2020 年，我请求瑞典协助获得弹道学专家关于材料的进一步报告，包括但不限于四张具体照片中所拍到的材料类型、材料中的孔洞可能是如何造成的、从照片中获得的任何元信息以及对最初进行测试的人员所作解释的任何意见。

142. 我很高兴收到瑞典防务研究局进行的全面和专业分析的结果。这份长达 40 多页的分析在由 Patrik Appelgren 和 Martin Nilsson 撰写的报告中提交，以防务研究局进行的照片分析和弹道测试为依据。弹道测试包括对飞机铝材使用 7.62 毫米和 9 毫米弹药，以产生分析用的参照材料。鉴于报告中提出的结论，没有必要在此全文转载分析；以下对该资料的探讨概述了对防务研究局所得出的结论和这样做的原因。

143. 照片一(共四张)背面印有“北罗得西亚警察，西部分部，C.I.D.总部，1961 年 11 月 28 日”字样，并有一个“pw 361/61”标记。照片展示了一名男子拿着一个有三个孔洞的金属板。防务研究局发现，所展示的金属片在孔的出口侧显示出相对对称的叶状变形(花瓣状)，变形的对称性表明接近零度的冲击角度。防务研究局进行了综合分析，考虑了飞机的相对速度、孔洞的对称性和间距、射击武器

的散布效果以及弹药的精度。鉴于已知的情况，包括 1961 年 10 月 25 日 Cary 用.303 步枪对铝板射击的事实和情况，防务研究局得出结论认为，上面有孔洞的铝板极不可能是 Albertina 号残骸的一部分，而更有可能是用于弹道测试的金属板。防务研究局还指出，板上附有一个纸标签，并被拍照，这对用于弹道测试的靶板来说是合理的做法。

144. 第二张照片印有“北罗得西亚警察，西部分部，C.I.D.总部，1961 年 11 月 28 日”，并有“pw 361/61”标记。这张照片似乎显示了飞机仪器的一部分，可能是从后面看的，带有标准的 46.6 毫米螺栓图案。仪器中心有一个较大的孔洞，位于两个较小孔洞之间的直线上。防务研究局称，较大的洞缺乏叶状变形，而如果高速射弹穿过物体，本应出现这种变形。防务研究局关于第二张照片的结论是，较小的孔可能来自用于组装仪器的螺栓，中心孔可能用于销轴或类似物体。

145. 第三张照片印有“北罗得西亚警察，西部分部，C.I.D.总部，1961 年 10 月 20 日”，并有一个“支持 3 号发动机冷却器，335/61，1961 年 10 月 20 日”的标记。照片看上去显示了一只手拿着一片长条金属板，手指向三个等距的不规则孔洞中的一个，三个孔洞与金属板的长轴成直角。

146. 防务研究局的分析指出，照片中的孔洞与防务研究局进行弹道测试时步枪射弹撞击造成的洞不同。特别是没有花瓣状或叶状变形，而在被高速射弹撞击的金属板后(出口)侧理应出现这种变形。防务研究局推测，第三张照片可能展示的是负责协助 1961 年罗德西亚调查局的北罗德西亚警察局弹道学专家 R. H. Els 所调查的那片金属板。据 Els 说，这三个孔洞是由弹出的铆钉造成的。

147. 第四张照片印有“北罗得西亚警察，西部分部，C.I.D.总部，1961 年 10 月 20 日”，并有“pw 334/61”和“右翼”的标记。根据照片上的注释，它显示了 Albertina 号右翼的一部分上的几个孔洞。

148. 在这些孔洞中，有几个较小的孔洞，防务研究局分析表明这些孔洞明显来自铆钉。照片中还拍到一个更大的孔洞，直径估计为 15-23 毫米。这种大小的洞不可能是由小口径射弹造成的，而且无论如何，该孔洞缺乏在防务研究局进行的弹道测试中观察到的花瓣状变形。因此，虽然材料受力形成所观察到的形状必然是由于遭到了撞击，但撞击不太可能由机器发出的射弹造成，而更有可能是与地面等物体撞击造成的。

149. 防务研究局分析的材料似乎表明，来自 Cary 档案的照片是在早期调查期间为调查目的进行的测试和分析。例如，照片似乎并未显示存在于 Albertina 号上但在早期的调查中一直没有加以分析的弹孔或其他射弹孔。在这方面，尽管对照片的分析是“新信息”，但它并不支持证明或推翻任何特定假设，因为照片所拍到的是对并非来自 Albertina 号的材料进行的测试。尽管如此，发现和分析 Cary 档案材料仍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因为这以实例证明并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可能仍有很多由会员国和个人在 1961/62 年创建的同期材料尚未审查。下文第五.B 节对这一问题作了进一步讨论。

3. 雇佣兵飞行员或其他特工介入的可能性

150. 2020 年至 2022 年期间收到的新信息扩展了 2019 年报告中分析的有关某些人被指明可能参与了对 SE-BDY 的潜在袭击的信息，如下文各小节所述。

151. 关于这一主题，我特别感谢特里尔大学国际关系和外交硕士课程的一批研究生的自愿贡献。在 Manuel Fröhlich 教授的指导下，他们向我提供了一份全面的工作文件，其中有条理地汇编了关于这一问题的现有资料，从早期的调查到较近期的报告。其中载有 1961 年 9 月 17 日和 18 日前后在加丹加和恩多拉出席和(或)参加活动的人员名单。虽然这是一份“实时”文件，有待进一步了解情况后予以更新，但将提供给联合国作为参考。

(a) 相关人员：总体

152. 正如之前所指出的那样，根据加丹加空军少校 Delin 提供的证词，早期调查错误地得出结论认为，加丹加空军中只有一名飞行员能够驾驶飞机攻击 SE-BDY。然而，2017 年和 2019 年报告中讨论的信息证实，包括飞行员在内的相关人员比早期调查所知的要多得多。根据 2019 年分析的联合国文件，加丹加空军在 1961 年 1 月至少有 32 名人员(14 名飞行员加上无线电操作员和技术员)，而 1962 年 4 月仅在科卢韦齐机场就至少有 11 名雇佣军飞行员。2019 年审议的文件以及坠机时瑞典驻刚果代表即瑞典外交官 Bengt Rösiö 对 Van Risseghem 进行的采访都指明，1961 年底至 1962 年初期间，在加丹加存在具有不同程度飞行能力的雇佣军和其他飞行员提供服务；Rösiö 在 1992 年至 1994 年期间为瑞典政府编写了题为“恩多拉灾难”的调查报告和随后的进一步说明。根据这一信息，这些雇佣军和其他飞行员包括 Bertaux、Boutet、Bracco、Browne、Cassart、Catchpole、Dagonnier、Delcors、Delin、Dubois、Fouquet、Gelen、Gheysels、Glaspole、Gurkitz、Hedges、Heuckets、Hislier、Hirsch、Magain、Mans、Melot、Osby、Pence、Pier、Puren、de Radiques、Van Risseghem、Schäfer、de Stoute、Verloo、Volant 和 Wicksteed。² 已查明的未发现会驾驶飞机的其他雇佣军或其他人员包括 Badaire、Beuckels、de la Bourdonnaye、Bousquet、Charlot、Coitre、Cremer、Crevecouer、Denard、Deshamps、Denard、Egé、Emeyriat、Faulques、Gillet、Hambursen、Hetzlen、Hoare、Huyghe、Lamouline、Lasimone、Lebbebre、Lucien、Nguza、Paucheun、Pradier、Ropagnol、de Saint Paul、Saquet、Schnell、de Troyer、Trinquier、Van Rooy、Van DeWalle、Van der Wegen、Vidal de Clary、Weber 和 Wrenacre 等人。

153. 除了那些被确认为飞行员的人之外，在有关期间，还有许多其他相关人员在加丹加或恩多拉或周边地区。法国独立任用人员在 2019 年根据对法国档案的审查确定，这些人中的法国国民包括 Roger Trinquier 上校(一名曾参与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战争的伞兵，冲伯赋予他的任务是组织加丹加军队并招募约 20 名军官)、Roger Faulques 指挥官、Léon Egé 上尉和 Yves de La Bourdonnaye 上尉。此

² 在不同文件中对这些人的名字采用了多种拼写变体。

外，1961年6月被任命为法国驻伊丽莎白维尔领事的 Joseph Lambroschini 可能是法国外国情报与反间谍局的“荣誉通讯员”。

154. 2020年，我从 Hendrickx 那里得到了关于这些法国雇佣军中某些人的新信息；Hendrickx 是一名志愿研究人员，他对比利时特尔菲伦非洲博物馆的莫伊塞·冲伯档案中的信息进行了审查。Hendrickx 提供了一系列相关文件，其中涉及：(a) 1961年加丹加事件的政治和军事背景；(b) 关于1961年3月至6月期间购买和运往加丹加的武器、雇佣军人员动向和加丹加军事情报报告的资料；(c) 加丹加驻法国代表 Dominique Diur 与在法国和刚果的法国政府官员之间的互动。关于 Diur，我注意到，法国独立任用人员曾在2019年表示，他在为加丹加招募雇佣军方面发挥了作用，招募工作是在巴黎 Georges Mandel 大道30号进行的。

155. 总体而言，对 Hendrickx 提供的新信息的审查表明，法国担任官方政府职务的人员，包括法国外交和情报部门人员，似乎在一些情况下曾向加丹加省政府提供过非官方支持。这与法国独立任用人员在2019年向我转交的某些调查结果一致。关于 Hendrickx 提供的具体的相关通信或其他记录资料，我注意到下述事项。

156. 1961年9月20日 Egé 给 Letellier 先生的信(可能与下文讨论的“Le Tellier”是同一人；这一点未确认)说，Egé 在索尔兹伯里，正在前往恩多拉的途中，在那里可以在 Rhodes 旅馆找到他，他前一天与 Badert (原文如此)(根据上下文理解为 Badaire 的谐音，即雇佣兵 Michel Badaire)一起从约翰内斯堡乘飞机而来。Egé 说，“[l]a Bourdonnaye 破产了，待在比勒陀利亚”。这封信提到了当时关于加丹加各种事件的最新信息，并明显提到了哈马舍尔德之死，称“H 已死。愿他的灵魂安息，走好”，但没有谈到任何飞机坠毁的细节。

157. 1961年9月21日，Michel Badaire 给一位身份不明的收信人的另一封信证实了与 Egé 的前一封信类似的叙述。信中说，Badaire 和其他法国雇佣兵 Egé 和 de La Bourdonnaye 曾在比勒陀利亚，之后 Badaire 和 Egé 到了恩多拉，到写信的日期即1961年9月21日已到达。来自 Badaire 的信是用 Savoy 旅馆(恩多拉)的信纸写的；不清楚他是否住在那里，也不清楚他为什么住在与 Egé 不同的旅馆，Egé 说他会住在 Rhodes 旅馆。他们将从恩多拉乘汽车前往基普西，然后前往伊丽莎白维尔。该信指出，Badaire 正在等待 Faulques 和总统(即冲伯)的命令。

158. 从冲伯档案中的新信息来看，在 Egé 和 Badaire 返回恩多拉前往加丹加之前，Egé、Badaire 和 de la Bourdonnaye 很可能在1961年9月19日和20日一起待在约翰内斯堡。这并不能确定这些人在1961年9月17日至18日晚上的确切位置，也不能排除他们当时可能在恩多拉或附近。

159. 与此相关的是，一份题为“军事开支”、日期仅为“1961年”的法文打印文件，以及同一份文件的早期手写草稿，似乎显示了加丹加临时政府向各种雇佣军支付的开支清单，包括工资和开支。这份文件表明，1961年9月向以下人员支付了款项：Guy Deshamps、Maruis Bousquet、Robert Denard、Jacques Schnell、Michel Badaire、Roger Emeyriat、Jean Yves Coitre、Jean-Marie Nguza、Sandor Gynekits (可

能是 Sandor Gurkitz)、Jam Can(或 Van)Rissechem(可能是 Jan van Risseghem)和 Carlos Hugghe (可能是 Carlos Huyghe)。

160. 在这些付款中，值得注意的是，9月16日向 Van Risseghem、Gurkitz 和 Nguza、9月17日向 Huyghe 支付了预支工资，1961年9月16日至20日期间为以下人员支付了机票费用：Nguza(9月16日，法国联合海空运输公司，巴黎至约翰内斯堡)、Huyghe、Adam、Badaire 和 Gurkitz (9月17日，法国联合海空运输公司，始发地和目的地不详)以及 Denard、Cloitre、Emeyriat 和 Bousquet (9月19日，法国联合海空运输公司，始发地和目的地不详；9月20日，布拉柴维尔至恩多拉)。费用清单本身并不能证实这些乘客乘坐了这些航班(或乘坐的日期)。为此，我在2020年至2022年期间请包括刚果共和国、南非和赞比亚在内的会员国提供有关人员和飞机的移民和机场记录。截至编写本报告时，尚未收到对我所提请求的实质性答复。

161. 从“军事开支”文件中还可以看出，Denard、Cloitre、Emeyriat 和 Bousquet 似乎于1961年9月19日从某个未知的地方前往刚果共和国的布拉柴维尔，然后于1961年9月20日从那里飞往刚果。如以前的报告所述，坠机事件发生后，一些相关人员立即汇集在布拉柴维尔，这提出了一些尚待回答的问题(例如，见2019年报告，第五.A.1节)。

162. 另一份来自 Hendrickx 的新资料是1961年11月12日 Badaire 写给加丹加驻法国代表 Diur 的信，信中描述了冲伯对一名记者在1961年9月下旬拍摄了一名加丹加空军 Fouga 飞机飞行员的照片感到愤怒，Faulques 上校命令 Badaire 抓住这名记者，并确保照片不发布。

163. 尽管这只是传闻，缺乏细节，但 Badaire 的叙述如果是真的，则表明冲伯和 Faulques 对这名或这些飞行员的身份显得很敏感。一方面，这种敏感性可能是因为加丹加空军 Fouga 飞机实际上与坠机事件有牵连，而他们试图掩盖这一点。冲伯对 Fouga 飞行员的身份表现出的敏感可能与加丹加方面、包括 Delin 少校努力隐藏这些飞行员的真实身份有关。在这方面，据再次回顾，罗得西亚调查局认为“没有理由怀疑”Delin。然而，最近的报告称，在1961/62年调查中出庭的加丹加空军的唯一证人 Delin 少校的说法缺乏可信度，他的说法包括他是 Fouga 飞机的唯一机长，当时只有两名 Fouga 飞机飞行员，另一名飞行员在没有他的情况下没有驾驶过该飞机，Fouga 飞机没有在夜间驾驶过，以及加丹加空军没有其他武装飞机(例如，见2019年报告，第三节 A.4)。与此同时，还注意到，在1961年9月下旬发生所述的一名记者试图为 Fouga 飞机飞行员拍照的事件时，已经有传闻说加丹加空军 Fouga 飞机攻击了 SE-BDY。这些传闻可能引起对加丹加令人不适的关注，因此冲伯和 Faulques 据称表现敏感并不足为奇，无论这些传闻是否属实。

164. 在本小节所述的另一个问题上，我从 Rosato 获得了2020年至2022年期间的新资料，包括对1961年部署在联刚行动的爱尔兰部队所作记录的研究。这部分资料包括1961年9月14日驻扎在雅多维尔的第35步兵营 A 连的报告。报告提到最近在加丹加抓获的雇佣军 Van der Wegen 和 Paucheun 的陈述，他们当天与冲伯有联系，并说一天前加丹加空军派了一辆汽车到罗得西亚，试图招募更多的

喷气式飞机驾驶员。此外，同一天即 1961 年 9 月 14 日晚些时候，第 35 步兵营的一份无线电传输记录提到“来自科卢韦齐的信息，一些飞行员昨天从北罗得西亚抵达”。然而，这并不一定能证明，在 1961 年 9 月 17 日午夜至 18 日凌晨飞机坠毁之前，有更多的加丹加空军飞行员从北罗得西亚被招募到加丹加。事实上，正如 Rosato 指出的那样，如果加丹加空军只在 1961 年 9 月 13 日才试图招募和启用更多的飞行员，就不会有太多的时间这样做。

165. Rosato 另外提供了关于 1965 年出版的《只有鬣狗在笑》一书节选的新资料，作者 Peter Lessing 在书中讲述了他 1960 年代初与加丹加空军的 Delin 少校的一次谈话。据说，Delin 在谈话中除其他外声称，他在 Albertina 号最后一次飞行前在伊丽莎白维尔机场对其进行了扫射(这就是为什么发现机身上有弹孔的原因)，Fouga 飞机最长飞行时间为 1 小时 15 分钟，而且不能在夜间飞行。据说 Delin 还告诉 Lessing，他“本人本来准备攻击[SE-BDY]，但没有办法做到”。

166. 据回顾，Delin 提供的证词被早期的调查广泛接受，其证词表明只有 Fouga Magister 喷气式飞机有可能攻击 SE-BDY。然而，他误导了早期的调查，即可以排除 Fouga 飞机，依据是他是唯一驾驶该飞机的飞行员，而他当晚(或任何夜晚)并未驾驶过该飞机。我之前评估过 Delin 的证词缺乏可信度，原因包括已另行确定加丹加空军有多名在役飞行员(例如，见 2019 年报告，第三.A.4 和五.A.1 节)。从这个角度来看，Lessing 书中的说法似乎是错误的信息或虚假的陈述；此外关于 Fouga 飞机不在夜间飞行的说法已被证明很可能是错误的。Delin 还说，他在 1961 年 9 月 17 日从空中对伊丽莎白维尔机场的 Albertina 号进行了扫射。这与早期调查所确定的说法不一致，早期调查确认，Albertina 号在当天早些时候被地面火力损坏，当时是在进行另一次飞行，而不是 SE-BDY 的最后一次致命飞行。如果 Delin 确实向 Lessing 提供了不真实的陈述，这将进一步严重降低他在早期调查中证词的可信度。

167. 与此相关的是，Rosato 还提醒我注意 1961 年 9 月 24 日《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新闻文章，题为“法国人驾驶加丹加喷气式飞机，同时比利时人投下炸弹”，作者是 David Halberstam。该文章指出，飞行员受到“严密保护”，并指出：“冲伯总统不准外人与飞行员交谈。直到今天才知道，Deulin 中尉[原文如此]在冲突期间实际上并没有亲自驾驶飞机，而是由法国代驾 Magain 先生在 Deulin 中尉的指挥下操作控制器，同时后者在释放炸弹。在卡米纳基地的攻击接近尾声时，Deulin 中尉已经变得为人熟知。每当他在伊丽莎白维尔执行轰炸任务时，联合国管制塔就会用无线电对他说：‘啊，早上好，Deulin 先生。你今天好吗？Deulin 中尉会回答：‘我今天很好。你呢？’然后投下炸弹”。

168. 这一资料支持上文关于掩盖加丹加空军真正飞行员身份的分析。事实上，另一篇也由 Rosato 提供的由 Wilfried De Brouwer 撰写的文章《1960-1961 年刚果、卢旺达-布隆迪火力支援飞行员日记》指出，根据联合国和美国档案的记录，Magain 是在与卡米纳空中交通管制塔进行无线电联系时用机枪扫射管制塔的飞行员(例如，见 2017 年报告，第四.A.2 和四.A.4 节)。Rosato 指出，Magain 可能是副官 Jose Marie Ghislain Magain，一名出生于 1936 年的前比利时空军飞行员。

Magain 有丰富的飞行经验，据称是 1961 年攻击联刚行动时提到的“独行侠”，如前所述，Delin 在向罗得西亚调查局作证时掩盖了 Magain 的身份。

169. Rosato 提供给我的其他新资料参考了 Christian Castello 的《滑翔机和飞机》一书。该书指出，Dubois 是另一个名为 Littolf 的教练的后继者，Dubois 可能训练了其他飞行员驾驶 Fouga Magister 飞机，包括 Magain 和 Dagonnier。离开刚果后，Dubois 似乎作为法航的飞行员飞行；他的飞行日志(若有)可能包含能够识别他在 1961 年训练的其他加丹加空军飞行员的重要信息。

170. 根据 Gülstorff 提供的资料，至少有一名西德人 Horst Lönne 在 1961 年至 1962 年期间在法国负责人 Faulques 的带领下为加丹加作战。关于这个人的进一步细节，包括他在 1961 年 9 月 17 日和 18 日的所在地，都不得而知。

171. 所分析的上述新资料进一步证实了以下结论：1961 年 9 月，包括飞行员在内的外国雇佣军是加丹加及其周围地区的一支重要力量，早期调查不了解或不理解他们以何种方式发挥作用。虽然目前还没有一份确切的清单，说明 1961 年 9 月 17 日至 18 日晚上在加丹加和恩多拉及周边地区可能有哪些雇佣军人员，以及他们的确切活动，但我们在每一个关键时刻对可能的怀疑对象的了解都有所增加。尚不需要提供一个或多个被指名的人员在相关时间出现在恩多拉或附近的证明或反证来形成具体的假设；但毫无疑问，积极参与反对联合国战斗的相关人员人数比早期调查所考虑的要多。我评估认为，关于 1961 年 9 月 17 日午夜至 18 日凌晨加丹加武装部队中有不止一名飞行员能够驾驶可开展进攻行动的飞机的新资料的证明价值依然为“中”。如果进一步形成任何具体的假设，那么这一资料还需进一步的核证。

(b) Heinrich Schäfer

172. 2020 年 9 月，在我没有提出任何相关请求的情况下，德国独立任用人员写信给我提供新的信息。因此，我特别感谢他在 2019 年报告发表后进行的额外独立研究。所提供的资料与 2019 年报告中讨论的飞行员 Heinrich Schäfer 有关，其中包括两份来自 Dornier 飞机私密档案的飞行日志，现在由空中客车公司持有，Schäfer 曾为空中客车驾驶飞机。据回顾，Schäfer 是一名飞行员，他驾驶了一架 Dornier DO-28(标记为 KA-3016)飞机，最终于 1961 年 8 月交付给加丹加。新的资料包括 Schäfer 的个人飞行日志和一个单独的“9 号飞行日志”，涉及一架不在加丹加或附近的 DO-27 飞机(标记为 D-EHAV)。

173. Schäfer 的个人飞行日志显示，他于 1961 年 8 月 21 日驾驶 DO-28 KA-3016 从德国慕尼黑里姆机场起飞，在途中多次停留后于 1961 年 8 月 28 日降落在“Brassaville”(被认为是刚果共和国布拉柴维尔)。这与之前分析的表明 Schäfer 当时在该地区、目的是交付 DO-28 的信息相一致。

174. Schäfer 的个人飞行日志直到 1961 年 11 月 16 日才记录他的另一次飞行，日志列示当时他在慕尼黑驾驶一架 DO-27 飞机。然而，第二份飞行日志“第 9 号飞行日志”记录了 1961 年 9 月 2 日 Schäfer 在德国的两次飞行，从 Dornier 工厂

所在地奥伯法芬霍芬到 Berneck，以及从 Berneck 到伯布林根。这表明 Schäfer 在 DO-28 飞机交付后返回了德国。

175. 后来，Schäfer 的个人飞行日志记录了他在 1961 年 9 月 21 日至 27 日期间驾驶 DO-28 飞机在据德国独立任用人员认为是格陵兰岛的一个地点飞行。鉴于格陵兰岛距离恩多拉约 10 000 公里，如果确定 Schäfer 在 1961 年 9 月 21 日在格陵兰岛，考虑到那个时代的飞行条件，他在 1961 年 9 月 17 日至 18 日晚上在恩多拉或附近似乎是不可能的。

176. 关于 Schäfer 飞行日志的完整性仍然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例如，不清楚为什么飞行日志从 1960 年 6 月到 1961 年 8 月跳过了大约一年，然后，类似地从 1961 年 9 月跳到 1962 年 10 月，Schäfer 在这两个时间段内进行的飞行没有列出。此外，个人飞行日志中的飞行似乎没有按顺序排列，这表明它们可能是在实际飞行后的某个时间创建的：日志的第一页列有(按顺序)1960 年 6 月、1961 年 8 月和 1961 年 11 月的飞行，而下一页列有日志第一页上的飞行之前和之后的飞行，包括(按顺序)1961 年 7 月、1961 年 9 月和 1962 年 10 月的飞行。也不清楚例如为什么 1961 年 9 月 2 日的飞行(在“第 9 号飞行日志”中)没有反映在 Schäfer 的个人日志中。无论如何，飞行日志是已知信息的重要补充，并提供了进一步的调查线索。如果最终能够确定 Schäfer 在 1961 年 9 月 21 日确实在格陵兰，那么就可以排除他参与 SE-BDY 坠毁事件的任何可能性。这可以通过例如移民或其他同期记录来确定。

177. 2022 年，我请求德国独立任用人员就有关 Schäfer 飞行日志的其余问题作出进一步澄清。这些请求包括：是否可从相同的档案来源获得其他材料；为什么飞行日志从 1960 年 6 月到 1961 年 8 月跳过了大约一年，然后，类似地从 1961 年 9 月跳到 1962 年 10 月，Schäfer 先生显然在这两个时间段内进行了飞行。为什么 1961 年 9 月 2 日的飞行(在“第 9 号飞行日志”中)不在 Schäfer 的个人日志中。我未能提供大量时间以供答复，在编写本报告时尚未收到答复。我把此事标记为今后或可后续跟进的事宜。

(c) Beukels

178. 1960 年代末，自称曾是雇佣军的人向哈马舍尔德的前私人助理克洛德·德凯穆拉里亚讲述了一个关于 SE-BDY 据称遭到袭击的故事，后者后来成为一位杰出的法国外交官和商人。前雇佣军自称为“De Troye”和“Beukels”(两个拼写都是德凯穆拉里亚的音译)。“Beukels”声称参与了对 SE-BDY 的空袭，并说他驾驶一架 Fouga 飞机拦截了 SE-BDY，并用无线电告诉其转往卡米纳。当 SE-BDY 没有遵守指令时，Beukels 就用 Fouga 飞机的机关枪从 SE-BDY 后部开火，结果意外击中了这架 DC-6 的水平尾翼。随后，飞行员失去控制，飞机坠毁，燃起了大火(哈马舍尔德委员会和独立小组的报告更全面描述了 Beukels 的说法)。德凯穆拉里亚似乎在 1960 年代本着诚意向法国和瑞典当局转达了这一信息。

179. 根据之前的分析和 2019 年收到的新资料，包括来自德凯穆拉里亚的女儿和《哈马舍尔德悬案》电影团队的资料，我注意到最初向德凯穆拉里亚陈述的故事

似乎不太可能是真实的，并评估认为与之相关的新资料的证明价值为“弱”（见 2019 年报告，第三节 A.4）。

180. 2019 年，比利时联合独立任用人员指出，据称与 Beukels 一道与德凯莫拉里亚会面、被称为“De Troye”的人可能是 Jacques de Troyer，他是一名比利时军官，曾在 1961 年担任加丹加宪兵队的顾问。2020 年 1 月，在我没有提出任何相关请求的情况下，比利时独立任用人员代表比利时常设情报机构审查委员会写信给我，提供有关 Beukels 假说的新信息。我特别感谢在 2019 年报告发表后开展的额外独立工作。

181. 比利时独立任用人员在 2020 年的信件中称，根据比利时军事情报部门提供的新信息，2019 年报告(和之前的报告)中提到的“Beukels”可能是 Roger Beuckels，1942 年 10 月 24 日出生于比利时布鲁日，1991 年 6 月 1 日去世。据指出，Beuckels 在 1960 年 9 月 1 日以医疗残疾为由退役之前，作为 Arlon 步兵学校的士官，在比利时军队中的经验有限。比利时的记录表明，Beuckels 可能在 1960 年 9 月至 1962 年 1 月期间作为雇佣军在加丹加活动，但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比利时任何已知的 1961 年活跃在加丹加的雇佣军名单上，也没有已知的文件将他与 Jacques de Troyer 联系起来。此外，Beuckels 接受的训练有限，没有迹象表明他接受过飞行训练。在此基础上，比利时独立任用人员得出结论，Beuckels 不太可能在加丹加冲突中发挥重要作用。

182. 在 2019 年的报告中，我注意到对 Beukels 假设可信度的关切，包括在相关时间似乎只有一架富加战斗机(Beukels 称有两架富加战斗机参与了攻击)，以及不清楚 Beukels 为何要将秘书长的飞机转向至卡米纳，当时卡米纳被联刚行动部队控制。2020 年比利时独立任用人员提供的信息指出，Beukels/Beuckels 的军事经验有限，所认定的军事经验中不包括飞行训练。这一新信息越来越使 Beukels 所作的陈述不那么可信，因为他所作的叙述表明，他有足够的经验，可在夜间战斗条件下驾驶喷气式飞机。

183. 如前所述，如果可以找到 de Kemoularia 的原始笔记和任何与 Beukels 交谈的原始录音带，则需要对它们进行分析。Beukels 的叙述有可能有些部分是真的，而另一些部分是假的。例如，他可能将他人的行为归于自己，以获得经济或其他利益。这一假设仍然不能被完全推翻，但可能性微乎其微。针对据称 SE-BDY 以 Beukels 声称的方式发动攻击的信息，我仍然认为站不住脚。

(d) 秘密军组织

184. Picard 提供了他在法国国家档案馆进行研究时获得的一份文件的副本。这份文件被放在一个名为“外国情报与反间谍局——总理”的文件夹中，并被标为绝密，是法国负责非洲和马达加斯加事务的秘书长 Jacques Foccart 私人收藏的一部分，存放在法国皮埃尔菲特的国家档案馆。这份文件是一封两页纸信件的打印传真，其中包括一份据称是 1961 年 7 月由秘密军组织发给秘书长哈马舍尔德的“死刑令”，此后哈马舍尔德的飞机于 1961 年 9 月在恩多拉附近坠毁。信封上有秘书长在纽约的地址，并贴有法国邮票，邮戳似乎表明信是在 1961 年 7 月寄出

的(确切日期不详)。Picard 指出, 邮戳加上信中提到联合国介入突尼斯-法国比塞大危机, 表明信是在 1961 年 7 月底寄出的。

185. 信中就联合国在比塞大危机中的所作所为批评了哈马舍尔德, 并指控哈马舍尔德决定支持刚果境内的俄罗斯人。信的最后说, “秘密军组织委员会已对你进行审判, 并判处你死刑。判决附后。无论如何, 判决都会得到执行。” 随信附上的是另一页——“死刑令”。该信抬头是秘密军组织的标头和座右铭“诚实、正义、自由”。该文件指出, 执行委员会当天在巴黎听取了关于哈马舍尔德声称支持布尔吉巴(突尼斯总统)的介绍后, 决定“今天向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先生发出死刑令”。文件说, “为了公正和公平, 这一判决将尽快执行”, 并标有“1961 年 7 月[日期空白], 巴黎, 总主席(姓名难以辨认)”。

186. Picard 在对这封信和“死刑令”的评论中指出, 巴黎秘密军组织是在阿尔及尔政变失败后于 1961 年 5 月成立的, 并认为这份死刑令可能由其创始人之一 Pierre Sergent 执笔, 他就此咨询了法国历史学家雷米·考弗和奥利维尔·达尔。Picard 指出, 虽然秘密军组织在 1961-62 年间杀害了大约 1 700 至 2 200 人, 其中包括公务员、安全和国防官员以及政治人物, 但根据已知的信息, 暗示对象并不包括任何外国领导人。

187. Picard 还说, 秘密军组织在加丹加有联系人, 包括在当地的 Faulques。Faulques 曾与 Sergent 同在一个外国军团(第一外国伞兵团), 但军衔更高。他还说, 加丹加的座右铭是“加丹加必胜”, 这与秘密军组织的座右铭“秘密军组织必胜”相似。尚不清楚这是否是巧合。

188. 在收到 Picard 提供的信息后, 我写信给法国, 请求获得有关这一问题的进一步信息, 包括: 能否找到原始文件; 注意加盖邮戳的邮票, 该信是否被寄往并(或)送达其在纽约的预定目的地; 是否能够确定文件的出处; 任何其他档案中是否有提及该文件; 法国档案中是否有 1961 年在加丹加有秘密军组织派驻成员的任何记录; 联合国是否获悉秘密军组织对哈马舍尔德的任何威胁; 以及是否有秘密军组织针对外国目标发布和(或)实施任何其他执行令或采取其他行动的记录。我注意到, 鉴于自 2019 年以来收到的其他信息, 该文件可能更为重要。此外, 还有一些问题不清楚, 包括是否有文件原件(除传真件外)或任何可能增进我们对事件的共同了解的相关文件。

189. 在我写信之后, 我很高兴从 2018/19 年度法国独立任用人员 Maurice Vaïsse 那里收到了关于秘密军组织“死刑令”的更多信息。Vaïsse 先生找到了这份文件, 并在 2019 年的报告中提及。他确认在 2018 年查阅 Foccart 的私人档案时审查了这份传真文件, 但表示这是一份“孤儿文件”, 即该副本的出处、路径和轨迹都不清楚, 而且在 Foccart 档案或查阅的其他档案中都没有提到它。关于秘密军组织的活动, Vaïsse 先生在报告中指出了其行为发生的相关背景, 并注意到该组织发出了许多威胁, 但一般没有付诸实施。虽然秘密军组织曾试图将对法国高级政府官员(包括戴高乐将军、Foccart 等人)的一些威胁付诸实施, 但根据 Vaïsse 的了解, 秘密军组织不曾对外国目标采取行动, 尽管这种行动不能排除。

190. 可以回顾，联合国档案中的资料以及 George Ivan Smith 汇编的资料都提到可能企图暗杀刚果境内的联合国官员，已经“叛逃”并与联刚行动官员交谈过的加丹加境内的雇佣军或有关人员(包括 Cremer 和 Erfield)在报告中大量提到这一点。具体而言，根据 1961 年 9 月向联刚行动提供的资料，Faulques 领导的雇佣军散发了一份联刚行动官员的“清算”名单，其中包括 Conor Cruise O'Brien、Michel Tombelaine、Bjørn Egge 和其他人。Picard 回忆说，联合国档案中提及一封 O'Brien 给联刚行动官员 Sture Linner 的信。信中说，1961 年 8 月 28 日，加丹加的秘密军组织向 Tombelaine 发出了 48 小时内离开加丹加的最后通牒。虽然 O'Brien 说没有把威胁当回事，但还是决定让受到威胁的联刚行动官员撤离加丹加。

191. 在 Picard 提供的更多信息中，关于这个问题，我注意到 1961 年在加丹加效力于联刚行动的瑞典军官 Stig von Bayer 的传记。这本题为《促进和平的国际问题解决者》的传记于 1965 年出版。传记提到了在比利时、法国、南非、罗德西亚联邦和其他地方招募的雇佣军团体。Von Bayer 形容，在加丹加为冲伯效力的雇佣军团体中，由 Faulques 和 Tranquier (原文如此)领导的法国人是“经验丰富的游击队战士”，其中包括在朝鲜、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作战的经验丰富的法国军官。Von Bayer 说，这些法国军官中有一些是“狂热的”秘密军组织的成员。

192. 关于这一问题，还应回顾，正如 2019 年所分析的那样，中央情报局驻刚果站站站长 Devlin 说，加丹加一些能力较强的雇佣军军官来自法国，“巴黎爱丽舍宫法国驻非洲情报部门负责人 Jacques Foccart 提出，如果一些[雇佣军]愿意在加丹加作为冲伯作战，他们将最终获得赦免”。

193. 关于同一问题，可以回顾，Rösiö 在其 1994 年的报告中指出，几名法国雇佣军由于在阿尔及利亚参加了秘密军组织而无法返回法国；但他没有具体说明这些人员的身份。

194. 关于秘密军组织“死刑令”的诸多事项没有得到核实，包括我在给法国的信函中所述的事项，例如该死刑令是否是秘密军组织在所述时间签发的，及其是否已送达预定目的地。根据目前的信息，这份文件似乎是真实的。然而，鉴于 Vaïsse 先生在 2019 年所做的分析，即“死刑令”是一份与其他信息无关的“孤儿”文件，即使真发出了威胁，也无法提出或确立该威胁与有关坠机原因的任何现有假设之间存在联系。在孤立的情况下，我的评估是，“死刑令”在证明或反驳任何现有假设方面的证明价值很弱。然而，似乎已确定 1961 年加丹加境内存在与秘密军组织有联系的雇佣军，如果“死刑令”是真的，这可能表明对哈马舍尔德有某种敌意。这仍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调查的领域，特别是如果能够找到相关文件的话。

195. 所称的秘密军组织的威胁并不是 1961 年对哈马舍尔德发出这种威胁或警告的唯一实例。根据 Rosato 提供的联邦调查局解密记录资料，一名发件人(其身份经过编辑)给“Belmont”的一份美国内部备忘录描述了在美国发生亲卢蒙巴示威之后，如何处理 1961 年 2 月针对哈马舍尔德的威胁。威胁来自一个匿名者，他说哈马舍尔德“在一个秘密组织的秘密会议上被判处死刑”。这一威胁似乎得到了认真对待，因为它是由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姓名经过编辑)报告的，信息立即在联邦调查局、纽约市警察局和联合国之间分享。据称的威胁发生在坠机事件

前 7 个月，并不包含目前表明它具有证明价值的具体细节。然而，我将其作为新资料列入，与秘密军组织的威胁形成对照，以便强调一些国家政府注意到了对哈马舍尔德的威胁。在这方面，仍然必须确保对国内外情报机构的记录进行全面搜索，以寻找相关信息。

4. 可能的飞机类型和起降机场

196. 早期调查注意到，1961 年 9 月加丹加空军有一架富加教师喷气式飞机可用，并在敌对行动中给联刚行动部队造成了重大损失。这架富加飞机被认为是参与攻击 SE-BDY 的候选机。然而，早期的调查未能完全确定这种飞机的数量(如果不止一架的话)、能够驾驶这些飞机的个人的身份或这些飞机从哪里起飞。早期调查也没有考虑到其他有关事项，例如富加飞机是如何出现在加丹加的，或加丹加空军可能拥有的任何其他飞机或有关作战能力。

197. 由于现有信息有限等原因，对于如何对 SE-BDY 实施攻击，早期调查只考虑了有限的可能性。例如，在加丹加空军的飞行员中，早期调查只寻求 Delin 提供证据，当他说自己没有参与任何事件时，调查人员相信了他。然而，后来的信息表明，加丹加空军有许多飞行员可供使用。又如，早期调查在评估可能进行过攻击的加丹加空军飞机时只考虑了富加教师喷气式飞机，而且认为它可能只在科卢韦齐起飞和降落。后来的信息表明，加丹加空军拥有若干能够进行进攻行动的不同飞机，除科卢韦齐外，这些飞机也经常使用加丹加和北罗德西亚的机场。2017 年报告附件中提供的地图上显示了一些新增机场，其中许多机场距离恩多拉比科卢韦齐更近。

198. 2019 年的报告介绍了关于可能的飞机和机场等若干事项的新信息，特别包括关于富加教师、多尼尔 DO-28、Dove 和其他已被武器化的飞机，以及加丹加空军在加丹加和北罗德西亚使用的机场。2020 年至 2022 年间，我从多个来源获得了以下关于可能的飞机类型和机场的进一步信息。

(a) 飞机

富加教师

199. Hendrickx 提供了一份 1961 年 9 月 18 日似乎是未透露姓名的加丹加在纽约和布鲁塞尔的代表之间的通信，讨论的是哈马舍尔德的飞机被一架加丹加空军飞机袭击的谣言。信件指出，“人人都知道富加教师没有夜间飞行的装备”，并进一步声称，据加丹加一名前机场指挥官说，事故可能是由于联合国飞行员的问题，包括他们可能不具备必要的资质、经验或语言技能。这些声称不符合既定事实。事实是 SE-BDY 的飞行员经验丰富，很有声望，且富加教师和加丹加空军的其他飞机可能在夜间使用(例如，见 2019 年报告，第三.A.5 节)。鉴于加丹加在纽约和布鲁塞尔的代表可能知道加丹加空军飞机的实际能力，这封信中的说法可能是为自己服务，或者是为了避免可能将坠机事件归咎于加丹加空军。

200. 2021 年，Rosato 还向我提供了新的信息，包括对富加教师飞机能力的全面分析，包括燃料性能数据、操作规范、飞行条件对飞行时间的影响以及富加教师

在夜间使用的能力。据称，这项分析是在以下人员协助下进行的：富加飞机飞行员，曾任爱尔兰空军司令部将官的退役准将 Paul Fry；《富加教师飞机：爱尔兰观点》一书的作者 Joe Maxwell；以及 1961 年在联刚行动服役的前瑞典维和人员 Lennart Frank。

201. 关于 1961 年运送到加丹加的富加飞机的数量，Rosato 对出版物和记录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1961 年初有 3 架富加教师飞机被运送到加丹加。加丹加空军对这三架飞机的注册号分别为 KAT-91、KAT-92 和 KAT-93。主要的关注点仍然在下文所讨论的 KAT-93，至少早在 1961 年 4 月 8 日就在加丹加使用过。当时，Jean-Marie Ngosa 和“Dubois”（可能是 Jean-Baptiste Dubois）在伊丽莎白维尔的一次展示中驾驶该飞机，冲伯是乘客。

202. 此前，加丹加空军在 1961 年 9 月 17 日可掌控并已投入使用的富加教师飞机的数量并不清楚。虽然早期的调查认为只有一架，但 2017 年分析的某些信息，包括联合国和美国的记录，表明当时可能仍有两架富加教师飞机在运作。包括 Hellström 的一份出版物（被 Hammarberg 引用）等其他信息得出结论认为，在 1961 年初另外两架富加飞机分别坠毁和被联刚行动部队缴获之后，只有一架富加飞机。

203. Rosato 在 2020 年提供的进一步信息表明，KAT-93 是加丹加空军 1961 年 9 月仍在使用的富加教师飞机，包括在对联刚行动的多次攻击中使用。提供的照片据称是 Phillipe Le Tellier 于 1961 年 9 月 24 日拍摄的。照片似乎显示 KAT-93 和在科卢韦齐的几架“模拟”飞机，有时用防水布伪装，有时防水布被移除。有可能其中一张照片上的人是 Jan Van Risseghem。Trinquier 在《我们在加丹加的战争》的叙述中曾提及 Jan Van Risseghem 出现在科卢韦齐，称自己和 Le Tellier 在 1961 年 9 月 24 日造访了科卢韦齐，当冲伯看到 Trinquier 和 Le Tellier 在那里并得知已拍下富加飞机的照片时，突然勃然大怒。虽然 Trinquier 称冲伯突然发怒“很神秘”，但这似乎与冲伯想对富加飞机及其飞行员的事情保密有关。我注意到，不清楚 Le Tellier 是否就是上文讨论的 1961 年 11 月 12 日 Badaire 给 Diur 的信中所讨论的那个 Letellier 和(或)那个记者。

204. 关于富加飞机的飞行时间，Rosato 分析的目的是确定加丹加空军的一架富加教师飞机是否可能从科卢韦齐出发，在恩多拉附近发动袭击，然后返回科卢韦齐或其他机场降落。在 Fry 准将和 Maxwell 的协助下进行的分析是全面的，其中包括审查燃料性能数据和操作手册中的资料。该手册参照高度、速度和发动机功率等因素标出了相对燃料性能。总而言之，分析得出结论，一架富加飞机有可能从科卢韦齐起飞，在恩多拉上空徘徊数分钟，再返回科卢韦齐。

205. Rosato 的分析和结论与我在 2017 年分别从专家 Da Costa 和 Hammarberg 那里得到的结论一致，他们一致认为富加飞机有可能从科卢韦齐飞往恩多拉执行战斗任务并返回。在加丹加南部及其周边也有许多以前未查明的机场，富加飞机或加丹加空军的另一架飞机可以在这些机场起飞和(或)降落，这样就缩短了与恩多拉的距离，相应地增加了执行任何战斗任务的时间。我以前的评估是，在证明富加飞机有可能威胁或攻击 SE-BDY 方面，其证明价值为“中”。根据新的信息，我维

持这一评估，同时再次指出，可能使用了富加教师飞机并不支持富加飞机被实际用于对 SE-BDY 进行攻击的具体说法，这一说法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证明或反驳。

206. 关于可能在夜间使用富加飞机的问题，联刚行动前维和人员 Frank 于 2015 年向瑞典大主教 Hammar 作了说明，他于 2021 年向 Rosato 证实了这一点。Frank 说，在 1961 年 9 月 16 日凌晨 1 或 2 时左右联合国飞机试图飞往卡米纳之后，飞行员告诉他，他们在进入加丹加领空后不久遭到一架富加飞机的攻击。他们认为，加丹加的部队监听了无线电通信，并以此确定了联合国飞机的位置。因此，他们接下来执行试图前往他和联刚行动其他士兵将被部署的卡米纳空军基地的任务时，飞机没有照明，无线电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Frank 回忆说，这是在 1961 年 9 月 18 日。但 Rosato 指出，考虑到其他记录，包括第一爱尔兰步兵团的记录，这实际上可能是在 1961 年 9 月 17 日。降落后，Frank 的飞机遭到地面部队的攻击，在空中时还看到了曳光弹。之后，运送他们的飞机在卡米纳地面上遭到富加飞机的袭击和轰炸。Frank 拍了一张飞机残骸的照片，Rosato 提供了一份复印件。

207. Frank 的叙述进一步支持了在夜间使用富加飞机的观点。Van Risseghem 在飞行日志中对此有记录，美国驻刚果大使也提到过(例如，见 2017 年报告，第四.A.4 节；2019 年报告，第三.A.5 节)。还值得注意的是，据说富加飞机是通过无线电通讯确定联合国飞机位置的，如果属实，SE-BDY 可能也是这种情况。

208. 正如 2019 年报告中所观察到的，权衡各种证据后似乎支持以下观点，即到 1961 年 9 月，加丹加空军只有一架富加教师飞机仍在使用。鉴于上述新的信息，这一结论得到了加强。KAT-93 很可能是 1961 年 9 月 17 日加丹加空军掌握并使用的唯一一架富加飞机，尽管如下文所述，为战斗而设计或改装了其他各种飞机，并在该地区投入使用。现有证据还表明，富加飞机能够在夜间使用，并用于空对空攻击。下文将进一步考虑哪些机场可能曾被用于起飞或着陆。

209. 如前所述，富加飞机很难执行夜间任务或进行空对空骚扰或攻击。因此，虽然前面的分析表明，富加飞机有可能威胁或攻击 SE-BDY，但这并不能证明富加飞机被实际用于对 SE-BDY 进行攻击。与之前一样，我评估认为，关于 1961 年 9 月富加飞机在加丹加存在和活动的信息的证明价值为“中”。

多尼尔

210. 2015 年，独立小组从 Gülstorff 处收到信息，称加丹加有多尼尔 DO-27 和 DO-28 飞机，其中一架或多架可能参与了对 SE-BDY 的攻击。根据此后分析的信息，包括 Gülstorff、比利时、德国和 Picard 提供的信息，似乎可以确定，1961 年西德出于盈利目的向加丹加提供了多尼尔 DO-28 飞机。此外，看来可以确定，至少有一架飞机在 1961 年 9 月 17 日夜间至 18 日凌晨之前就存在，加丹加空军在加丹加和北罗德西亚及其周边广大地区使用这架飞机，这架飞机可能经过改装，用于空袭(包括拦截)和轰炸，包括夜间空袭和轰炸(见 2019 年报告，第三.A.5 节)。

211. 于 1961 年 8 月抵达加丹加的 DO-28 飞机由前多尼尔飞机试飞员 Schäfer 驾驶，他由 Cassart 陪同。其他 DO-28 飞机于 1961 年抵达加丹加，但这似乎是在 SE-BDY 坠毁之后。在作战能力方面，2019 年分析的信息显示，DO-28 飞机具有

出色的机动性,是一架短距起降飞机,能够在长度不到 300 米的简易机场上起降。这增加了它可能起飞或降落的潜在机场或甚至是原始的简易机场的数量。根据 2019 年 Picard 提供的信息,一名罗德西亚士兵观察到多尼尔飞机所在的地点包括北罗德西亚基普希的一个简易机场,据称相关行动涉及运输加丹加武器和人员。观察到这一情况的罗德西亚士兵“被告知不要干涉”,这表明北罗德西亚当局默许了这一情况的发生。1961 年 10 月 21 日,西德驻华盛顿大使馆与美国国务院的一次会议的记录也提到了一架以基普希为基地的 DO-28 飞机。

212. 在本报告中,关于多尼尔飞机的信息在其他相关分专题下进行分析。我再次指出,分析的信息仅表明,根据当时具备的设备和人员,多尼尔飞机有可能威胁或攻击了 SE-BDY,而并不表明多尼尔飞机曾被实际用于对 SE-BDY 进行攻击。我之前评估认为,关于 1961 年 9 月富加飞机在加丹加存在和活动的信息的证明价值为“中”。我维持这一评估。

其他飞机

213. 根据 Hendrickx 提供的信息,1961 年 9 月 19 日 Diur 给南非约翰内斯堡的“Airservice Germiston”的电报证实,“授权飞行员 Nguza 和 Gurkitz 取回 KAT 15 和 22”。这被理解为可能是指授权 Ngosa(在其他地方拼写为 Nguza)和 Sandor “Sputnik” Gurkitz 从约翰内斯堡取回两架在那里进行维修的加丹加空军的德哈维兰 Dove 飞机。约翰内斯堡和恩多拉之间的飞行距离约为 1 500 公里。如果加丹加空军的德哈维兰 Dove KAT 15 和 KAT 22 于 1961 年 9 月 19 日在约翰内斯堡进行维修,并不一定能排除它们 1961 年 9 月 17 日夜间至 18 日凌晨在恩多拉附近的可能性。然而,飞机完成这一航程的时间所剩无几。1961 年 9 月 23 日在恩多拉看到的 Dove 可能就是 Diur 在 1961 年 9 月 19 日的电报中提到的 Dove,但这一点尚未确定。

(b) 机场

214. 如前所述,已确定加丹加境内和周边可使用的机场比早期调查所了解的要多,加丹加部队可以自由越过罗德西亚边界,并可以使用那里的机场。该地区潜在相关机场的非详尽地图已列入 2017 年报告附件。

215. 根据 2017 年收到的专家意见,他们认为富加教师飞机(作为喷气式飞机)如果不在封闭的地面跑道(沥青或混凝土)上起飞和降落,将有发动机损坏的风险。当时加丹加的非喷气式飞机,如 Dove 和 DO-28,没有类似的限制。尽管有损坏的风险,Delin 在给罗德西亚侦查委员会的证词中说,至少有一次他“驾驶[富加飞机]从科卢韦齐起飞,降落在一条土路上,要起飞,你要洒上水,让跑道湿滑”。2019 年,Rosez 提到已知富加飞机曾在 KM30 简易机场起飞和降落,该简易机场由长约 1.5 公里的红土铺成。除了使用未正式设立的简易机场外,根据早期的调查,加丹加空军还使用了其他临时解决方案,如点燃煤油和发射沙子照明弹,以实现夜间飞行。

216. 1962 年 1 月 17 日为筹备 1961 年联合国委员会而对联刚行动 Rikhye 准将进行了访谈。访谈的打字稿中包括这样一句话:“虽然富加飞机似乎不可能到达

恩多拉，但加丹加人可能使用了其他机场。他们在使用基普希，而 Sakanai(原文如此，可能是 Sakania 的错误拼写)在他们手中。任何配备了机枪的小型飞机，如多尼尔或 Dove，都可以使用。Rikhye 将军认为，如果飞机飞得很低，很容易将其击落。加丹加拥有瑞典的武器，其中一些被联合国缴获(Harrison 少校也认为在飞机着陆周期击落飞机很容易)。

217. 关于 2020 年至 2022 年间提供的新信息，我在上文提到了 2020 年 Rosato 提供的爱尔兰联邦行动部队记录中的信息。第 35 营的报告还提到，1961 年 10 月 7 日，两名爱尔兰便衣军官前往恩多拉，调查恩多拉机场是否被加丹加空军的飞机和雇佣军使用。这份报告提到了 Purfield 上尉的另一份报告，Rosato 无法找到该报告。虽然这些信息只是简略提及，但如果能够找到 Purfield 的报告，它可能包含更多的相关信息。无论如何，即使是简略提及也倾向于支持先前的调查结果，即加丹加部队在加丹加和北罗德西亚可以使用的机场可能比先前确定的更多(例如，见 2017 年报告，第四.A.4 节)。与 2019 年报告中的评估一致，我评估认为，关于加丹加部队可能使用了比以前确定的更多的加丹加、北罗德西亚和其他地点机场的新信息的证明价值为“中”。针对新信息，我维持这一评估。

5. 地面攻击

218. 2019 年年中，我从一位要求匿名提交信息的研究人员那里获得了信息，内容涉及地面部队可能直接袭击了 SE-BDY 或在其坠毁后立即设法接近残骸(和任何幸存者)的假设(见 2019 年报告，第四.B.2 节)。2020 年至 2022 年，这位信息提供者根据详细研究提供了更多信息。

219. 这位研究人员提供的信息是一种假设，基于记录的事件和证词，包括对早期调查的分析。该研究人员认为，相关时间在恩多拉或恩多拉附近由雇佣军组成的地面和空中攻击小组有可能(在研究人员看来，这是对事件的可能解释)开展了一次威胁 SE-BDY 的协同攻击，导致 SE-BDY 试图进行规避操作，结果坠毁。

220. 这个人向我提供了新的信息，包括从 Walter Flett Faulds 上尉的文件中收集到的信息。Faulds 上尉于 1961 年在皇家罗德西亚军团服役，也曾 在罗德西亚联邦军队从事情报工作。

221. 我很感激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提供帮助，使我在短时间内就得到了一本 Faulds 的回忆录。回忆录的标题是“联邦军队一名兼职间谍的观察：1959-1964 年皇家罗德西亚军团上尉 W.F.Faulds 供职记述”。在叙述中，Faulds 详细介绍了他所描述的自 1959 年起在北罗德西亚担任军事情报官员的工作，此前他被 David Bales 上尉招募到皇家罗德西亚军团(领土)第 3 营。Faulds 说，他在担任军事情报官员期间与北罗德西亚警察特别情报部门密切合作，他通常每天都造访该部门，并从该部门得到大量情报。Faulds 还表示，像所有军事情报官员一样，他的甄选必须得到英国军队的批准，他必须遵守《英国保密法》。在这方面，他表示“与英国政府的军队和情报部门有着惊人的密切联系”，且“军情五处提供了大力支持和投入”。Faulds 还谈到与中央情报局部署在卢萨卡的特工 Dick Slater 定期接触，后者以隶属于北罗德西亚政府省务事务部的建筑师的身份工作。

222. Faulds 说，飞机失事当晚，他在卢萨卡陆军总部值班，并“与恩多拉机场控制塔的一名官员一直保持联系，这样我就可以随时向陆军总部通报[哈马舍尔德的]动向”。在这方面，Faulds 注意到 SE-BDY 的“最后一条无线电信息是，它在恩多拉的上方，可以看到灯光，我记得我们在卢萨卡通过电话听到这个信息”。除非电话线路一直是开放的(这似乎不太可能)，否则这就意味着录制了无线电信息的录音，这与后来 Martin 和 Barber 对早期调查所作的陈述相反(见上文第二.A.1 节)；这是一个有待核实的问题。Faulds 回忆说，当地官员得出结论，SE-BDY 一定是改变了计划，决定去恩多拉以外的某个地方，但第二天被发现坠毁。

223. 值得注意的是，Faulds 提到一名“林务员”。他也是罗德西亚的军事情报官员，他是“相关人员”，后来就当晚的事件提供了证词。然而，在早期调查时，这件事似乎没有作为证据提出。

224. 关于 Faulds 对另一名出现在坠机现场的军事情报官员的描述，这名研究人员推测，这个人可能是 Malcolm Burnes，在森林训练中心的 Mwekera 的一名北罗德西亚高级林业官员。Burnes 没有为早期的调查提供证词。但是，如果他确实是在坠机被发现的官方时间之前到过坠机现场，他可能已经知道或记录了尚未披露的信息。这名研究人员注意到，恩多拉西部森林保护区从恩多拉西部边缘的主要公路之间延伸至 Kitwe 和 Mufulira，由北罗德西亚土地部林业科管理。防火瞭望塔位于森林保护区内的不同位置，并始终保持一个或多个防火瞭望员值班，以调查森林中任何火灾的迹象，包括在夜间也是如此。尽管 4 名防火瞭望员(位于 Chichele 森林保护区的 2 号塔和位于 Ndola-Wanysha 公路以南的 3 号塔各两名)向罗德西亚委员会作了陈述，但据称在森林和 Ndola 西部边缘的 Dola Hill 森林、Kitwe-Mufulira 公路之间也有防火瞭望员，他们对坠机地点和周围地区有良好的视野，但他们中没有人提供证词或接受了早期调查的审查。

225. 第一，重要的不是是否有大量证人或证人的数量，而是证词的质量。第二，需要对新信息的第三方来源进行检验。第三，如果最终确定，在这一重要地点的其他防火瞭望员当晚确实是在场值班，而且当时知道他们身份、可追踪并找到他们，但在早期的调查中没有安排约谈或调查，而当局又没有为未传唤他们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那么早期调查的全面性就会受到更多的怀疑。我敦促进一步跟进此事。

226. 此外，这名研究人员还提供了有关 Wren Mast-Ingle 说法的新信息。Wren Mast-Ingle 以前曾表示，他在官方发现坠机地点之前曾到过该地点，他观察到许多细节，包括飞机未燃烧的机身上有一排拳头大小的洞，然后有六到八个戴着遮耳帽、穿着迷彩服、坐在比黑色颜色浅的吉普车或路虎车里的白人男子命令他离开该地区(例如，见 2019 年报告，第三.A.7 节)。Mast-Ingle 在接受 Picard 采访时说，这些迷彩服“看起来更像是作战迷彩服，而不是普通的绿色卡其布衣服”，并且有“滑稽的遮耳帽”。另一个消息来源 Rosez 也提到，在恩多拉警察局看到了特别的迷彩服，类似于 1950 年代法国外籍军团在印度支那使用的迷彩服。Picard 根据对早先部署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陆军和伞兵团所穿制服的分析，推测这种迷彩遮耳帽可能是一项“Bigard”，与“猎豹”迷彩服搭配穿戴。他说，在恩多拉留下

迷彩服的人可能是在加丹加的法国雇佣军，他们以前曾在阿尔及利亚服役，在 Faulques 手下活动。

227. 在 2021 年收到的关于 Mast-Ingle 的新信息中，对他的叙述进行了进一步澄清，包括着火的是飞机周围的灌木丛或小树而不是飞机本身，至少有一辆抵达现场的吉普车或路虎车的灯亮着并正对着残骸，当现场的男子从灌木丛或小树中出来与他说话时，他们貌似的指挥官用南非(南非荷兰语)口音说话，并让他立即离开。Mast-Ingle 骑着他的小摩托车离开时，他听到了叫喊声。最终，这名研究人员提出了这样一种理论，即 Mast-Ingle 可能接触了所谓的对 SE-BDY 进行协调空中和地面攻击的地面攻击部分。

228. 在 2019 年的报告中，我回顾说，独立小组面谈的“新”证人中共有 6 人报告说在 1961 年 9 月 18 日凌晨去了坠机现场(Chimema、Custon Chipoya、Lumiya Chipoya、Mast-Ingle、Mwebe 和 Mwansa)，并表示他们注意到现场有警察或士兵，或两者皆有。此前接受访谈的目击证人 Mpinganjira 和 Chisanga 也都报告说，在飞机坠毁几个小时后，看到两辆路虎以极快的速度驶向坠毁地点。

229. 2020 年至 2022 年间从这位自愿研究人员那里收到的信息(其研究仍在进行中)有助于继续寻找真相，且往往为提及在坠机地点被正式发现之前到过该地点的各种身份不明的人的其他信息提供相互支持。目前没有必要对上述具体事项的证明价值进行单独评估。然而，关于 Faulds 和 Burnes 等个人的重要事项仍有待核实，他们没有为早期调查提供证词。第一，如果他们或其他人在正式发现坠机地点之前曾到过现场，却没有提供到过现场的证词，则必须搜查他们可能作出的其他记录，特别是考虑到 1961 年 9 月 18 日在坠机地点附近的许多证人提供的信息，他们说他们在附近看到在早期调查中没有被提及的其他人。第二，Faulds 的上述说法暗示，在恩多拉空中交通管制塔进行了录音，但录音从未被披露。哈马舍尔德委员会指出，某些证词表明，恩多拉空中交通管制部门记录了无线电通信情况，但删除了这些记录(见哈马舍尔德委员会报告，第 13 节)。鉴于恩多拉空中交通管制部门的书面记录不完整，这是一个有待核实的重要事项。罗德西亚迁移的记录，包括罗德西亚特别情报部门和罗德西亚陆军总部(Faulds 向其报告)的记录，是一个重要的潜在信息来源，敦促联合王国找出并披露这些记录。

6. 罗德西亚军事力量

230. 2022 年 Rosato 和 Rocksén 提到的信息包括下文讨论的来自 Hunt 的“加丹加热线”，介绍了 1961 年 9 月 16 日上午“Amichi”致电冲伯的内容。Hunt 说，Amichi(或 Amici)可能是雅多维尔的市长，但他不确定这是否正确。该消息写道：“请立即写信给 Roy Welensky 爵士：冲伯总统发信号说，基赞加共产党军队已到达尼温祖，正在向南前进。如果他们到达南方的某个点，我们请求罗德西亚干预。您能否马上借给我们两架战斗机，派到科卢韦齐机场。再借 6 门无后坐力炮，每门 100 发。我们可以去科卢韦齐接收。雅多维尔机场只有 3 300 英尺长。雅多维尔和科卢韦齐都在控制下。请通过同一渠道回复冲伯，雅多维尔 Amici [.]签名。Amichi 致冲伯。”

231. 虽然 Hunt 的回忆录中有这条信息的内容，但在 2022 年，Rocksén 提供了一份似乎是 Hunt 记录中信息的原始手稿。这一请求意义重大，原因有几个。其中之一是如前所述，一些目击者描述在 SE-BDY 坠毁前看到不止一架飞机在空中飞行，美国和联合国的一些消息来源认为 1961 年 9 月 17 日深夜至 18 日凌晨加丹加有不止一架富加喷气式飞机(尽管现在看来已证实加丹加空军只剩下一架富加飞机)。此外，在上文第三.A.3 节所述的 Rosato 提供的信息中，第 35 步兵营 A 连 1961 年 9 月 14 日的一份报告介绍了被俘雇佣兵 Van der Wegen 和 Paucheun 讲述的情况，其中首先谈到试图从罗德西亚招募更多喷气式飞机驾驶员，后来又谈到从北罗德西亚到科卢韦齐的飞行员。还必须指出，本报告所分析的信息，包括关于加丹加雇佣军 Lasimone 向北罗德西亚提出的请求以及设备在北罗德西亚/加丹加边界可相对自由流动的信息，表明加丹加当局和北罗德西亚当局在军事事项上至少有一定程度的默契合作。就目前情况而言，没有证据表明在 SE-BDY 坠毁之前，有任何罗德西亚战斗机被派往支持加丹加。然而，这是一个值得调查的重大问题，包括在罗德西亚军事记录中进行调查。

B. 人为破坏：Celeste 行动/南非海洋研究所

232. 2021/22 年度收到了关于 Celeste 行动的新信息，从而扩展了 2019 年报告和独立小组分析的信息。作为回顾，研究人员 Terreblanche 注意到一些文件的重要性，最初由 Williams 对其进行调查。这些文件提到了 1961 年一个据称通过破坏 SE-BDY 飞机“干掉”哈马舍尔德的行动。这些文件的信头上写着一个名为“南非海洋研究所”(海研所)的组织，介绍了其特工策划和实施名为“Celeste 行动”的阴谋。除了这一据称的行动外，1961 年在加丹加的某些雇佣军后来似乎与海研所有联系。

233. 这些文件最初引起公众注意是在 1990 年代后期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工作期间。自 2015 年以来，一直要求南非政府提供查阅“Celeste 行动”文件的原件和(或)副本，并要求其对其他各种提供信息的请求作出答复。在独立小组的报告中，无法最终评估海研所文件的证明价值，因为南非在查阅文件或其他搜寻方面没有提供协助。尽管在 2016 年收到的指示表明，在 2019 年 9 月再次提出请求后，(在 2019 年报告定稿后)已在南非档案中找到了相应文件，我收到南非独立任用人员姆多利西·恩科西的答复，大意是南非政府已重新搜索所有相关档案，以便获得关于所称的 Celeste 行动文件的资料，尽管进行了彻底和认真的搜查，但仍无法找到原始文件。因此，我无法在南非境内查阅这些文件的原件或副本。我还请联合王国和美国搜寻有关资料，但没有结果。

234. 在 2018/19 年度，我很感激从《哈马舍尔德悬案》电影团队那里收到了关于海研所的新信息，他们对海研所的存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新的信息包括一名自称是海研所特工人员的个人的证词，以及据称是海研所负责人 Keith Maxwell-Annandale(在前一份报告和本报告中被称为“Maxwell”)的回忆录的一份似乎很全面的手写版本。

235. 2021 年，Rosato 向我提供了从对“Celeste 行动”文件的分析中显而易见的、关于研究海研所详细情况这一主题的新信息，以及关于据称是海研所人员 Wagner

和 Maxwell 的身份的信息。Celeste 行动的某些文件据称写于 1960 年和 1961 年，有海研所的信头，地址和电话号码是：“南非联盟约翰内斯堡 De Villiers 街临床中心 5 楼，电话：23-5611”。根据 Rosato 进行的一项分析，1960 年 7 月约翰内斯堡的电话名录显示，电话号码 23-5611 属于 Bradlows 大厦 38a 的 V.T. Addinall 女士。此后，在 1973 年《约翰内斯堡商业名录》中，该号码归属于“Wanderers 街 5 号，南非自然疗法学院”。与此相关的是，Rosato 注意到，Williams 之前在《谁杀了哈马舍尔德：联合国、冷战和非洲的白人至上主义》一书中指出：1966 年，电话号码 23-9074 属于位于约翰内斯堡 Wanderers 街 5 号的“临床中心(照护)”，该中心与 De Villiers 街有一个拐角处。从 Rosato 提供的信息来看，看起来该地址至少从 1960 年起就使用 23-9074 这个电话号码。

236. 根据对 Rosato 提供的信息和 Williams 以前分析的信息的综合，海研所信头上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似乎不相符：约翰内斯堡的 De Villiers 街(至少在 Wanderers 街的拐角处)确实有一个临床中心，但在 1960/61 年，它的电话号码与海研所信头的电话号码不同。然而，在后来的一段时间，大概是在 1966 年至 1973 年之间，这个号码似乎属于一个不同的准医疗企业“南非自然疗法学院”，地址同样在 Wanderers 街 5 号。

237. 假设有关电话簿名录的来源信息是正确的，那么海研所信头上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似乎不匹配的事实可能是另一个标志，表明这些文件不是真的。

238. Rosato 提供和分析的更多信息涉及 Celeste 行动一封信中所列的另一个号码。这封信提到“军情五处、特别行动行政部门和海研所间”的一次会议，会议讨论了联合国正在制造麻烦，“认为应该让哈马舍尔德下台”，以及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同意并承诺充分合作”的声明。在信的结尾处写道，“如果出现严重复杂情况，请告诉代理人使用电话[难以辨认]约翰内斯堡 25-3513”。Rosato 指出，25-3513 这个号码在 1960 年的约翰内斯堡电话簿上被列了两次：一次不清晰(可能是错误)；第二次似乎属 Derby Rd Kens 91 号 Ian F. Kerr 先生”。这个名字似乎与据称是 1961 年海研所的一些文件中的收件人名字(“Kerr 上校”或“Ian 上校”和“Wagner 准将”)相匹配。

239. 最后，Rosato 提供了 Peta Thornycroft 撰写的一篇未发表文章中的信息，指出 Maxwell 对海研所活动的描述中存在一些不一致之处。首先，Thornycroft 注意到，Maxwell 在 1990 年声称，海研所是塞舌尔政变企图的幕后黑手，但到 1998 年，他的说法发生了变化。此外，Thornycroft 说，Maxwell 在 1990 年告诉记者在他 43 岁；如果当时的这个年龄是正确的，那么二十九年前的 1961 年他只有 14 岁。此外，似乎 1961 年 9 月 17 日至 18 日确实在恩多拉的加丹加空军飞行员 Jerry Puren 告诉 Thornycroft，他在刚果时并不认识 Maxwell，也从未听说过海研所。(如在下文四 A.1 中讨论，不排除 Puren 后来认识 Maxwell，鉴于他们与 Hoare、Sims 和 Dalglish 据称都参与了塞舌尔政变。)鉴于 1961 年在刚果境内和周边地区雇佣军活动相对封闭，如果 Puren 说的是实话，那么海研所不可能在 Puren 不知情的情况下开展过任何重大活动，更不用说像 Celeste 行动这样的行动。

240. 如 2019 年报告所述，现有信息表明，海研所这一组织存在于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其他说法，包括 Maxwell 自己的回忆录中的说法，即海研所存在于 1960 年代，并与 SE-BDY 坠毁事件有关，似乎不太可信。Rosato 提供的新信息，包括显示海研所信头细节与 Thornycroft 文章中所载内容不一致的信息，进一步降低了 Celeste 行动真实存在的可能性，除非有其他信息出现。收到的新信息再次突出强调仍然有必要核实或排除与“Celeste 行动”有关的假设。

241. 作家兼学者 Greg Poulgrain 向我提供了新信息，即他在 2020 年出版的《肯尼迪与艾伦·杜勒斯：印尼战场》一书的摘录，这可能与海研所假说有关。Poulgrain 提供的信息基于他的研究工作和他对 Conor Cruise O'Brien 和 George Ivan Smith 的访谈。这两人都曾是联合国的高级官员，其中 1961 年时在刚果。Poulgrain 说，O'Brien 和 Smith 向他表达的观点是，他们认为哈马舍尔德是被故意杀害的。

242. Poulgrain 指出，当时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两人之间发生重大政策冲突后，具备了罢免哈马舍尔德的动机。简而言之，据说这场冲突的发生是因为哈马舍尔德计划在 1961 年 9 月从刚果返回后宣布，联合国打算干预西新几内亚的主权争端，以支持巴布亚人民独立，肯尼迪总统支持这种干预，但杜勒斯强烈反对。

243. Poulgrain 说，他在与 Smith 的访谈中得知，在 1961 年动身前往刚果之前，哈马舍尔德一直关注西新几内亚的主权问题。在 1961 年大会全体会议之前，联合国关于这一问题的政策已经明确，秘书长就此与肯尼迪总统举行了会谈。据称肯尼迪支持联合国在主权争端中发挥作用，因为这将不需要美国干预以支持联合国支持的巴布亚独立，站在包括中国、印度尼西亚、荷兰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内的会员国的对立面。根据 Poulgrain 的说法，杜勒斯强烈反对以哈马舍尔德提议的方式干预主权争端，因为这威胁到他自己(以及中央情报局)对印度尼西亚的政策，而这是他全球政策的关键。

244. Poulgrain 指出，教会委员会(下文将进一步介绍)撰写了 14 份关于美国情报活动的报告，这些报告在杜勒斯死后揭示了他的行为和政策的范围，包括对外交事务的干预。作者认为，上述讨论的 Celeste 行动文件表明杜勒斯参与了这样的干预。据回顾，这些文件提到了一项通过让哈马舍尔德的飞机坠毁来杀死他的计划，并提到了杜勒斯的名字，指出“联合国组织正在制造麻烦，认为应该让哈马舍尔德下台。艾伦·杜勒斯表示同意，并承诺他的人将全力配合”。Poulgrain 声称，相似之处是发现教会委员会介绍称杜勒斯卷入同年早些时候杀害卢蒙巴的计划；据说杜勒斯曾表示“希望对这个计划给予一切可能的支持”。

245. Poulgrain 进一步假定，官方调查没有核实在利奥波德维尔的 Albertina 号离开前无人看管时在其上工作的技术人员的身和行为，这仍然是考虑蓄意破坏假设的必要步骤。他指出，Albertina 的测高仪在美国由 J.埃德加·胡佛监督检查，发现没有故障，这一事实也是怀疑的理由。

246. Poulgrain 提供的信息主要集中在他声称存在杀害哈马舍尔德的潜在动机上,而不是实施杀害的手段上。由于没有可靠的信息证明手段与指称的动机之间的联系,在现阶段没有必要评估 Poulgrain 提供的新信息的证明价值。与此同时,这些信息提出了进一步调查的问题,并强调了证明或反驳 Celeste 行动假说和杜勒斯据称参与其中的真实性很重要(Poulgrain 的分析依据这些信息)。

247. 如前几次报告所述,需要南非提供合作,以取得与据称的 Celeste 行动有关的任何现有文件,无论是原件还是复印件,以便进行法证分析。在这方面,我感谢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长潘多尔女士在 2022 年 6 月介入此事并作出承诺,保证南非政府将提供全面支持,且南非将继续努力查找并提供所要求的信息。

248. 即使只有海研所文件的复印件,也可以对它们进行分析——包括对照 Maxwell 的手写回忆录——以了解字体、笔迹和其他事项。此外,南非以及可能还包括联合王国和(或)美国的情报信息可能有助于确定 1961 年是否存在海研所以及是否开展了任何行动。再次指出,必须对这些问题进行适当的分析,以便就蓄意破坏的假设得出任何结论。

C. 人为(飞行员)失误

249. 如早期调查中所讨论以及最近各份报告中所指出的,因飞行员失误导致的飞机事故时有发生,即使是由经验丰富的机组人员执飞的飞机也是如此(例如,见 2019 年报告,第五.A.3 节)。这种事故虽然通常在恶劣的天气状况下更可能发生,但不限于这种情况。对 SE-BDY 号飞机而言,既没有确定也没有排除飞行员在没有任何形式干扰的情况下发生失误造成坠机的可能性。事实上,考虑到机械、结构或材料故障似乎被排除在外,如果飞行没有受到干扰,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坠机是人为失误造成的,例如飞行员误读仪表进场和看不到地面。

250. 2021 年至 2022 年间,我收到了美国阿拉斯加州飞机机械师兼飞行员 Joseph Majerle 的一份报告,以及随后对报告的更新和修正。Majerle 的报告说,他在航空和飞机操作方面有丰富的经验。虽然他并不声称自己是 DC-6 这种机型飞机的专家,但他与该飞机及其飞行员打过广泛的交道。Majerle 与他人就 2019 年报告中提到的主题事项写了一篇文章(第四.B.2 节)。

251. 在 Majerle 提供的报告中,他指出,早期调查进行的技术审查中有几个结论有缺陷。Majerle 的分析是基于对材料的审查,包括罗德西亚委员会和哈马舍尔德委员会的报告、Bo Virving 的文件和联合国委员会的听证会录音誊本,包括证人空军中校 Evans 的录音誊本。Majerle 主要试图传达一种观点,即 SE-BDY 可能是通过故意接地的方式接地的,而不是像早期调查所假设的那样是无意接地的。

252. 除此之外,根据一项全面的技术分析,Majerle 提出了几个问题,他说,这表明 SE-BDY 的飞行员有意在坠机地点进行了着陆尝试。Majerle 认为,支持这一观点的事实包括:(a) 该飞机在距离机场较远位置时就已经处于着陆配置;(b) 飞机在与树梢接触时的飞行速度低于罗德西亚委员会所认为的速度(可能低于 140 节,也许低至 80 节);(c) 根据他对螺旋桨叶片和相关问题的分析(早期调查中的分析做得很差),SE-BDY 在空中时有明显的反推力;(d) 树木上被切割出

的条带的长度和残骸的分布显示出位移很小，突出表明撞击速度低。Majerle 还认为，没有迹象表明测高仪的功能或通信存在问题，因此最有可能的坠机场景是某种突发事件(如飞行中的爆炸和/或火灾)导致飞行员试图故意自愿迫降。Majerle 的分析得出结论，SE-BDY 的机组人员在他们所面临的情况下，每件事都做得恰当而熟练。

253. 为了评估 Majerle 提供的新信息，我请 Sven Hammarberg 提供协助和专家意见。他是事故调查员和前战斗机飞行员，以前曾向哈马舍尔德委员会、独立小组和知名人士提供过协助。鉴于我在 2022 年 6 月中旬收到 Majerle 提交的修订版，为了在报告截止日期前完成报告，我必须在很紧的时间内征求 Hammarberg 的意见。我非常感谢他满足了我的要求，并同以前多次提供意见时一样，展现出专业精神和合作精神。

254. Hammarberg 咨询了 Lars Gibson 上尉，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泛航公司飞行员，曾于 1960 年代在刚果服役。关于 SE-BDY 在距离恩多拉机场大约 9 英里处处于着陆配置的事实，Gibson 上尉表示，在程序转向中展开起落架是泛航公司的标准作业程序，这样飞机将在机头朝向机场之前做好着陆准备，然后再最后下降。因此，Hallonquist 机长在坠机地点部署着陆配置是正常的，也符合泛航公司的政策，尽管那里离机场有一段距离。

255. 关于降落前螺旋桨可能的反推力问题，Hammarberg 指出，1951/59 年版 DC-6 手册称 DC-6 在空中时有可能发生反推力(尽管飞机有防止这种意外发生的功能，这种情况曾导致之前的空难)。根据飞机下降的角度和坠机前树木的明显损伤，Hammarberg 考虑了反推力的可能性。Hammarberg 认为，在 SE-BDY 接触地面之前，树木被切割成的条带提供了“可控飞行撞地”的强有力证据(其定义不包括外部敌对行动，见哈马舍尔德委员会报告[7.15]及以下内容)。Hammarberg 指出，在缺乏具体数据(包括现场树木的数量和密度)的情况下，很难准确计算与树木接触的制动效应是如何减缓飞机速度的。然而，Hammarberg 并不认为切入树木的角度显示出“反向螺距事故”的迹象，因为这个角度并不像存在反推力时那样陡峭和短暂。存在反推力时，操纵杆输入的任何错误都有可能失控飞行，飞行的倾斜度增加，随后机头明显下降。他还指出，存在反推力会给着陆带来困难，包括左右侧制动力的可能差异导致的偏航力。

256. 在分析残骸区域时，Hammarberg 同意这可能表明飞机在穿过树林坠毁时向前运动的能量很低。他认为飞机残骸的平面图显示了在蚁丘附近发生的一次猛烈撞击，撞击产生了剧烈的旋转运动，使飞机部件散落在与初始位置明显不同的地方(例如，在“驾驶舱区域”发现了部分尾翼)。

257. 作为整体意见，Hammarberg 指出，主要根据飞机部件或螺旋桨位置的外观和地点的照片进行分析，难以得出确切结论且论证过程很复杂。他还指出，对实际发动机和螺旋桨进行现代检查可能会获得比早期调查结果更多的信息。与此同时，Hammarberg 指出，不能轻易根据事后进行的照片分析而提出推翻最初调查员的结论，并指出他认为证据并不支持某个具体理论，无论是故意试图在野外降落，还是故意坠毁。

258. 我已详细审查了 Majerle 和 Hammarberg 提供的新信息。每项分析都强调，正如早期调查所发现的，SE-BDY 的程序转向和坠毁前下降的部分阶段似乎是以一种总体受控方式进行的，这有实物证据支撑，包括树上的刮痕和残骸的分布。正如 Hammarberg 和早期调查所指出的，SE-BDY 飞机被发现时起落架锁定，襟翼展开，处于着陆配置，这表明在这种情况下，其飞行员的行为是称职的，并符合仪表程序进近的既定政策。关于 SE-BDY 在撞击点的飞行速度，早期的调查和作为罗德西亚委员会调查的一部分进行的模拟飞行似乎确实考虑到了各种不同速度。至于 SE-BDY 的飞行速度是否可能低于早期调查所考虑的速度(包括但不限于，由于着陆前存在反推力)，我没有足够的信息可以得出肯定的结论。在这方面，我注意到 Majerle 和 Hammarberg 各自观点所承认的注意事项和局限性。

259. SE-BDY 的最后时刻在早先调查时的技术报告和其他信息中进行了分析，哈马舍尔德委员会和独立小组也审议了这些材料和其他材料。我已经从整体上审查了新的信息，包括作者所提出的注意事项和局限性，并根据现有材料进行了考虑。总之，在没有其他令人信服的技术材料的情况下，实物证据似乎无法确定地表明，SE-BDY 击中树梢然后撞向地面是由于飞行员有意为之还是其无意行为。如果就这一专题提供更多的信息，就有必要继续进行审查和评估。

四. 其他新资料

260. 本节采用 2019 年报告中使用的结构，合并了关于地方和外国当局行为的资料，包括官员和情报机构的行为。因此，本节包含对与坠机背景相关的新资料的分析，但不直接涉及坠机原因。与 2019 年的情况一样，这次也收到了重要的新资料，证实外国情报人员在相关时期活跃于该区域，还收到了与 1961 年背景和周边事件有关的其他资料。同样，这仍然是一个有待跟踪的重要领域，因为它确定在哪里可以找到更多关键资料，并再次支持关于会员国尚未充分披露重要记录的结论。

A. 地方和外国当局的行为

1. 外国情报机构

261. 虽然早期调查没有提到外国情报人员和机构的存在，也没有考虑到可以通过外国情报人员和机构的记录获得资料，但此后曝光的资料表明，1961 年，他们大量存在于加丹加及周边地区。除了雇佣兵和准军事人员，还活跃着大量情报行动，其目的正是为了收集资料。事实上，没有将他们作为潜在信息库进行探索，已导致关键来源得不到利用。作为知名人士，我曾试图获取这些机构和人员创造或持有的资料。

262. 如以往所述，历史背景表明，比利时、法国、南非、俄罗斯联邦、联合国和美国政府最有可能创造或持有通过实地情报行动获得的资料。2018/19 年，比利时和法国向其独立任用人员提供了查阅这些档案的机制，但并非所有会员国都这样做。如上文第二.B 节所述，虽然我在 2021/22 年得到进一步确认，有更多会员国审查了本国的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但这些搜索还不能说是全面的。

263. 下文讨论了在 2020 年至 2022 年期间分析的关于这一主题的资料。

(a) 联合王国

264. 如以往所述，联合王国 1961 年在刚果及周边地区派驻了大量情报人员。2011 年，Williams 分析了奥尔波特勋爵在埃塞克斯大学的论文，发现了名为“Secret Report by Neil Ritchie, Appendix A to Alport to Sandys, Dispatch No.8, 25 November 1961”的一份文件(Neil Ritchie 报告)。Neil Ritchie 已被证实是军情六处的特工，在联合王国驻索尔兹伯里高级专员公署担任一等秘书。Ritchie 在导致飞机失事的事件中起了核心作用。1961 年 9 月，Ritchie 安排在恩多拉与冲伯会面，SE-BDY 坠毁时哈马舍尔德一行正是在赶往恩多拉的途中，会面者有联合王国驻加丹加领事登齐尔·邓尼特和联合王国驻索尔兹伯里高级专员奥尔波特勋爵。早期调查不清楚联合王国外交和情报官员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安排了哈马舍尔德和冲伯的会面。

265. Ritchie 所起的核心作用不仅包括安排会议，还包括促成会议。前一日，Ritchie 从加丹加的基普西接了冲伯、邓尼特和 Fortemps(UMHK 助理总监)，越过北罗得西亚边界将他们带到恩多拉。由于联合王国没有正式披露相关记录，因此不清楚这是联合王国的官方政策，还是仅仅是该国一名官员的行为，但 Ritchie 通过这一政策，在协调加丹加国家元首、联合国秘书长和资助加丹加分裂并向与联合国激烈冲突的雇佣兵发放工资的 UMHK 公司之间的安排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66. 以往分析过的官方信件提到了 Ritchie 和军情五处驻中部非洲安全联络官 David Driver 的存在，包括 Simensen 提醒我注意的 1961 年 10 月 16 日联合王国国务大臣桑迪斯给奥尔波特勋爵的一封电文，其中“特别感谢 Ritchie 先生在艰难的停火谈判中表现出的主动性和良好的判断力”。后来发表在官员回忆录中的参考资料也提到了 Ritchie，包括登齐尔·邓尼特的《前往加丹加等地》和 Gordon Hunt 的《加丹加热线》。Hunt 说，他“在联合王国情报部门接受过战争与和平方面的训练”，在会面之前的活动中充当了关键的对话者，这将在下文进一步讨论。

267. 2020 年，《Ils ont tué Monsieur H》(他们杀害了 H 先生)的作者 Picard 向我提供了关于对 Manfred“Freddy”Loeb 的档案进行研究的各种新资料，工程师 Loeb 曾为 Traction et Électricité 和 UMHK 工作，联合王国和美国情报机构都知道有他。2019 年，Picard 曾采访现已去世的 Loeb，并审阅了 Loeb 的回忆录。Loeb 的记录证实了 Ritchie 的存在和关键作用以及 UMHK 促成往来电文的性质。这些资料讲述了 Loeb 如何促成和传递包括冲伯和哈马舍尔德在内的各官员之间的往来电文，使他得以实时了解军事事务、政治谈判和哈马舍尔德的计划，2019 年的报告对这些资料进行了分析(见第四.A.1 节)。除其他外，Loeb 表示，他知道坠机“事故”不是偶然的。

268. 回顾一下，Loeb 是一名比利时工程师，于 1961 年 9 月抵达北罗得西亚，任务是帮助恢复被切断的布鲁塞尔-加丹加通讯。在基特韦，Loeb 与前来接他的 Neil Ritchie(军情六处)和 Gordon Hunt(英美资源集团南非公司(英美公司)和罗得西亚刚果边境电力公司(罗电公司))一起工作。任职期间，Loeb 在确保各方之间的

信息传递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分离的加丹加政府(包括冲伯)、罗得西亚联邦政府(包括总理韦伦斯基和省专员汤普森)、联合王国政府以及 UMHK 驻加丹加和布鲁塞尔办事处。Loeb 还说，在 SE-BDY 坠机后不久，他与 Ritchie 一道前往加丹加，将哈马舍尔德一些无法识别的文件带给邓尼特。

269. 2022 年，我从电影《哈马舍尔德悬案》的研究负责人 Rocksén 那里获得了关于他和他的团队所做的档案研究的新资料。除其他文件外，我还收到了英美公司、UMHK 和罗电公司之间 1961 年 9 月的往来电文副本。发件人和收件人包括英美公司的 Taylor、罗电公司的 Hunt(后来自称是联合王国情报人员)、UMHK 公司的 Aimé Marthoz 以及 G. de Rosenbaum、Arnot、Bentley 等人。下文将介绍特别受关注的往来电文。

270. 第一封电文没有标明日期，但从上下文看，似乎是在 1961 年 9 月 11 日或 12 日发出。该电文由 De Rosenbaum 从雅多维尔送达，但却是代表“UMHK 的一般管理人员”发给基特韦的 Arnot。电文中说，UMHK 在伊丽莎白维尔有一台发射机(还有电话和电传(电报))，并试图在基特韦也安装一台，以便能够通过无线电传输进行通信。De Rosenbaum 提议向基特韦派遣一名技术人员，配备一台单边带无线电发射机，在“3535、6122 和 7070 KCS”频率上发射。Arnot 回答说，他将与 Hunt 讨论此事。Hunt 于 1961 年 9 月 12 日给 UMHK 总监的答复是“欢迎你在基特韦安装无线电发射机的建议”，并指出已收到北罗得西亚当局的临时批准。

271. Hunt 于 1961 年 9 月 13 日从基特韦发电文给索尔兹伯里的 Taylor，证实“[Hunt]最后一份军情报告中的一切”，并讲述了加丹加与联刚行动部队之间在加丹加的军事行动情况。注意，Hunt 的电文是代表罗电公司发出的；虽然他以前说过他为罗得西亚精选信托基金工作，但这并不排除他也为罗电公司工作。电文中看来含有发送当日军事行动的最新资料，包括联刚行动部队人数，而且好像是由加丹加的军方、政府和 UMHK 提供。电文中还向 Taylor 证实，已经寻求并得到北罗得西亚当局的批准，将安装一台 UMHK 发射机，直接连接到伊丽莎白维尔。电文末尾指出，“有传言说哈马舍尔德先生已经在伊丽莎白维尔，但没有得到证实”。

272. Hunt 于 1961 年 9 月 14 日从基特韦向索尔兹伯里的 Buch 发出一封标有“绝密”字样的电文(向其他收件人重述)，提供了加丹加部队与联刚行动部队之间在加丹加的最新军事行动情况。同日，Hunt 给 UMHK 的 Barthoz 发出了另一封电文，讲述了 Hunt 在加丹加与冲伯会面后，当天上午从伊丽莎白维尔返回基特韦的行程，并称 Hunt “相信[冲突的]高潮将在未来 48 小时内出现”。

273. Hunt 和 Taylor 在 1961 年 9 月 15 日多次通信，证实 Traction et Électricité 的比利时工程师 Manfred Loeb 和“他要安装的设备”已于 1961 年 9 月 14 日抵达基特韦。根据当天 Marthoz 发给 UMHK 伊丽莎白维尔 Assoingnon 的另一封电文，Loeb 是从加丹加的雅多维尔出发，使用了一条穿过索卢韦齐的丛林道路，前一天他也曾试图这样做，但没有成功。Hunt 通知 Taylor，从北罗得西亚到加丹加的无线电/电话通信已于 1961 年 9 月 15 日建立，扩大了现有的电话和电传(电报)线路。Hunt 还讲述了加丹加部队和联刚行动部队之间的军事行动，特别是在雅多维尔对爱尔兰特遣队的行动和“加丹加空军喷气式飞机昨晚的火箭袭击”。

274. 1961年9月15日来自“De Jiong”的一封未指明收件人的电文说，“请通知目前在基特韦的下列UMHK人员”，名单包括“Loeb Dhondt Esquelin Van Lund”，并指出，单边带发射机安装完毕后，Loeb和Dhondt仍应留在基特韦，以确保永久联系，一旦建立无线电通信，Esquelin和Van Lund将返回加丹加。

275. 1961年9月15日Hunt给Marthoz的一封信证实，Loeb在基特韦，而且希望能在当天中午前“调试昨晚安全抵达的设备”。UMHK布鲁塞尔在1961年9月15日给Hunt的回复中称，UMHK“很高兴从英美公司索尔兹伯里的Taylor那里得知Loeb在基特韦”，并要求Loeb给UMHK布鲁塞尔打电话。

276. Hunt在1961年9月15日发给Marthoz的另一封信中称，罗电公司与希图鲁(雅多维尔的一个矿址)保持着电话和电传联系，并一直“通过紧急电报转发从我们朋友那里收到的一切信息”。对此的回复则要求Hunt确认基特韦(在北罗得西亚)是否收到了来自希图鲁(在加丹加)的“我们朋友”的无线电(HF)消息。

277. 1961年9月15日还有一封未列明发件人和收件人的电文，其中提到“M. Lobe”(可能是Manfred Loeb)和“de Rosenbaum”之间的一次谈话，de Rosenbaum在谈话中向Loeb通报了加丹加的最新军事情况。

278. 从Rocksén收到的上述新资料持续时间很短，仅跨越1961年9月的四天。但这些资料强化了一些重要的事实，特别是考虑到这与Picard在Loeb的档案中所做的研究有关。从分析的往来电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罗电公司、UMHK和英美公司的机构和人员之间进行了大量的合作。很明显，公司人员与加丹加和北罗得西亚政府有高层联系，并与他们分享信息，包括军事活动的信息，而且Hunt事先就知道了哈马舍尔德拟议的出行。他们的关系够铁，以至于尽管战争正在进行，UMHK和罗电公司仍能够跨国搬运敏感的通信设备。此外，继Loeb在基特韦安装该设备之后，这些实体以及他们传递信息所针对的、所牵涉的和所代表的个人，都可以在加丹加和北罗得西亚之间进行公开而且(对当时来讲)复杂的通信，包括无线电、电话和电报。该通信设备包括一个单边带无线电发射机，能够在3535、6122和7070 KCS(千赫)频率上进行发射；据Rocksén咨询的一名无线电专家称，6122 KCS是一个军用频率，该设备可能曾被用来拦截和干扰无线电通信。在撰写本报告时，我无法核实这一事项。

279. 此外，这些信息及其交流方式使Ritchie、Hunt和Loeb不仅成为对哈马舍尔德和冲伯之间的具体会面进行联系和组织的核心，而且成为加丹加、北罗得西亚和联合王国政府与商业实体之间更广泛关系的核心。这强化了Hunt所著《加丹加热线》中相关描述的可信度(见2019年报告，第四.A.1节)。通过Hunt和Ritchie传递电文的收件人包括奥尔波特勋爵、联合王国领事邓尼特、莫德林大臣、穆农戈部长、冲伯总统、韦伦斯基总理和哈马舍尔德。Hunt是一个关键的对话者，正如Loeb档案中的材料所示，他与Ritchie在工作上密切协作，Ritchie、Loeb和Hunt在坠机当晚一起呆在基特韦。此外，Ritchie是军情六处的人，而根据他的说法，Hunt也是英国情报机构的人，这证实了与联合王国政府的直接联系。

280. 另外, Rocksén 还向我提供了更多新的资料, 这些资料构成一系列文件, 放在 Gordon Hunt 记录的一个名为“加丹加 1961 年 8 月/9 月”的文件夹中。第一组有两份文件, 即一封信和信中所附的一份报告, 以及这些文件的各种副本。信和报告的日期都是 1961 年 9 月 9 日, 并标明来自北罗得西亚的基特韦。

281. 信中没有发件人名字。有一种说法是, 收件人名字看起来有四个字母, 但被划掉了, 无法辨认。从形式和内容看(注意 Hunt 所著《加丹加热线》也提到同一个人, 将 Ritchie 称为“我们在加丹加的人”), 这封信像是 Gordon Hunt 写给 Neil Ritchie 的(见 2019 年报告, 第四.A.1 节)。信中写道, 写信人(Hunt)同日由住在加丹加的一位比利时承包商朋友介绍, 与加丹加军队的两名法国军官见了面。Hunt 写道, 法国高级军官 Lasimone 上尉是加丹加两位部长金巴和穆农戈以及冲伯先生的使者。与“在沙漠中的[法国]第 8 军”服役的 Lasimone 同行的是下级军官 Bourdeaux 中尉, “一个 25 岁的年轻人, 加入加丹加军队之前曾在阿尔及利亚服役四年”。Hunt 提出了一些问题, 包括邓尼特应当为 Lasimone 安排一个北罗得西亚签证, 以便获得更多信息, Ritchie 应当在下一周会见 Lasimone, 还应当通知韦伦斯基, 因为在 Hunt 看来, 所采取的做法是呼吁韦伦斯基寻求加丹加雇佣兵的帮助。Hunt 还写道, 这些信息将传给罗卡那(Rhokana)公司总经理 O.B. Bennett, 省专员尤恩·汤普森也必须获得通报, 但除此之外“将强调严格限制信息传播”。

282. 报告本身的日期也是 1961 年 9 月 9 日, 标题为“关于加丹加军队目前隐匿的两名法国军官的报告”, 并注明“报告的等级被认为高度可靠”。报告写道, 有 100 至 150 名加丹加雇佣兵躲过了联合国的驱逐, “我们此行的真正目的, 除了从我们的罗得西亚朋友那里获得援助之外, 是要让联邦政府了解加丹加政府打算在其边界建立一系列突击队训练单位, 联合国不知道这些单位将在(加丹加/北罗得西亚边界)触手部分进行训练。第一批单位由 4 至 6 名欧洲军官和大约 60 名选定的非洲人组成, 将驻扎在卡松巴莱萨附近的丛林中”。报告描述了加丹加的军事力量, 指出创办者们根本不在意联合国军队, 并表示如果联合国试图取代 UMHK 的管理, UMHK 将实行“焦土政策”。报告结尾写道, “我们希望你能给我们一些鼓励的信息。我们打算留下来战斗”, 署名是“X 上尉(前第 8 军), X 中尉(前阿尔及利亚)”。

283. 这封信和这份报告并不是第一批经过分析的关于 Hunt 在 1961 年会见两名来自加丹加的法国雇佣兵的资料: Hunt 还在《加丹加热线》中提到此事, 描述会见了两名“有相当文化和背景的法国人。他们不仅是强硬的雇佣兵, 还是训练有素的军官, 献身于他们所志愿服务的事业”。然而,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法国雇佣兵名叫 Lasimone 和 Bourdeaux。此外, 这一信息所披露的行动范围以及与北罗得西亚当局的潜在合作程度值得关注。虽然不清楚加丹加雇佣兵领导的突击队训练单位是否最终建立或以北罗得西亚为基地, 也不清楚他们是否获得了韦伦斯基的支持来这样做, 但此前已经确定, 加丹加和北罗得西亚军方有一定程度的合作并共同使用边境地区(见 2019 年报告第三.A.6 节和 2017 年报告第四.A.4 节)。新的资料支持这一说法, 即包括雇佣兵在内的人员可能在 1961 年 9 月越过边界到达(或

离开)恩多拉周围地区,而北罗得西亚和加丹加当局没有阻止(或可能默许)他们这样做。

284. 来自 Hunt 会面的信息可能与联刚行动士兵 Stig Von Bayer 的传记中提到的事情相关联(见上文第三.A.3 节)。与 Lasimone 所述截至 1961 年 9 月由“100 至 150 名躲过驱逐的加丹加雇佣兵”组成的人数一样, Von Bayer 也提到冲伯的雇佣兵团体是“一个约 200 人的国际队伍”。人数上的差异可能来自 1961 年 8 月在朗姆酒(Rumpunch)行动中被联合国驱逐的雇佣兵人数,该行动的相对成功无疑促使雇佣兵在联合国没有管辖权的北罗得西亚建立了一个基地。Von Bayer 表示,该团体由一定数量的“圈外人士”组成,但也有一个“由服役多年的法国军官中经验丰富的游击战士组成的核心部分”,由“指挥官 Faulques 和上校 Tranquier”[原文如此]领导。正如 Picard 所述, Von Bayer 的传记提到法国团体的长期意图是“为秘密军队建立一个避难所”,这一意图可能与 Hunt 信中提到的 Lasimone 表达的愿望有关,即在加丹加/北罗得西亚边境地区建立一系列突击队训练单位。

285. 在 Hunt 名为“加丹加 1961 年 8 月/9 月”的文件夹中,还有一份文件载有 1961 年 9 月 19 日“Phillimore”给罗电公司基特韦 Hunt 的一封“私人机密”电文,该电文于当日 13 时 58 分收到。Phillimore 说,“鉴于最近从基特韦回来的一名官员告诉我的高度机密和令人不安的故事,我很高兴能保证你的人身安全和健康”。与文件夹中的其他类似电文一样,该电文看来是从英美公司发出,被标记为“ANMERCOSA”至“RHOPOWER KITWE”。Phillimore 可能是英美公司的 J. Roger B. Phillimore,但这一点未获证实,也不清楚 Phillimore 所说的“高度机密和令人不安的故事”指的是什么。然而,电文是在发现坠机后一天发出的,提到靠近坠机现场的一个地点,这一事实值得进一步调查和分析,特别是如果能找到更多 Phillimore 的记录。

286. 2020/21 年从 Picard 那里收到的其他新资料包括 Loeb 特意保留在一个名为“17-19/9/61”的文件夹中的许多档案信件的副本,其中包括通过 Hunt 在基特韦“女王之家”的住所交换的转录电报信息的手稿。有些文件是电报打印的原始手写版本,有些则是打印的输入版本。这些电文的发件人和收件人包括 Ritchie、奥尔波特勋爵、邓尼特、穆农戈、冲伯和哈马舍尔德。Picard 还收到了 Loeb 和 Ritchie 在随后几年的通信副本。下文将介绍在 1961 年 9 月前后传送的特别相关的电文。

287. 一封未注明日期但在 1961 年 9 月 17 日至 21 日期间发给 Hunt 的电文指示将该电文紧急转交给 Loeb,以便在“Rene”当晚抵达时再转交给他,其中提供了如何与联合国打交道的指令。Picard 认为,根据相关通信中的其他参考资料,“Rene”一定是指 Rene Clemens,1960 年加丹加宪法的比利时执笔者,他寻求加丹加的独立。除其他外,电文称“要求你确保加丹加军队对所有机场的控制”,“要求 O'Brien 和 Tombelaine 离开”,“联合国必须允许加丹加有选择其技术人员的充分自由”,该电文像是发出命令,目的是确保加丹加与刚果中央政府之间的谈判在没有联合国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电文落款为“Patron”,然后写道,“终结包机伦敦 EC2”,最后的 EC2 可能是中央伦敦邮政编码。

288. 关于这条电文有许多事情不明，包括发件人是谁。但必须指出的是，该电文是在飞机失事时或飞机失事后立即从伦敦发出，其目的是阻挠和削弱联合国在与加丹加达成任何政治解决方案方面的作用，这一作用已经因秘书长逝世而大受影响。

289. 1961年9月17日下午1时，哈马舍尔德给冲伯发去一封电文，说明了联合国的立场，并建议冲伯前往恩多拉会晤哈马舍尔德。该电文是通过基特韦的 Hunt 发出的，副本被送到了 Ritchie 手里。如前文所述，这显示了联合王国和加丹加官员的参与程度，而且在飞机坠毁大约半天前，哈马舍尔德明显提议在恩多拉会面。哈马舍尔德于当天下午5时通过 O'Brien 和雅多维尔无线电中继站以同样方式向冲伯发出的另一封电文证实了这一点，这封电文在恩多拉也将被送到邓尼特和奥尔波特勋爵手里。

290. 1961年9月17日“Odilon”给冲伯的一封信(传送时间不明)似乎向加丹加将军 Muke 传达了一个指示，要他对联合国采取“必要处置措施”。

291. Ritchie 在 1961年9月19日上午7时45分发给冲伯的一封信中说，“昨天下午我们告别时，你答应停止使用富加飞机，现在我得知联合国带来了埃塞俄比亚飞机，我已请求我国政府要求联合国不要派飞机”。这封电文值得关注有两个原因。首先，它显然证实 Ritchie 在 1961年9月18日与冲伯会面，而这一天 SE-BDY 的坠毁被发现。其次，Ritchie 称他曾寻求联合王国的干预，以阻止派遣埃塞俄比亚飞机支持联刚行动对抗加丹加部队，包括富加飞机。

292. 可以回顾一下，2017年分析了来自 Simensen、美国和联合国的资料，资料中称联合王国扣留英属东非领土的飞越许可，延误了埃塞俄比亚飞机抵达刚果，导致 SE-BDY 在无护送的情况下飞往恩多拉，并面临可能的袭击(见 2017年报告，第四.A.4节)。2017年，我评估认为，就其与袭击 SE-BDY 的关联度而言，该资料的证明价值很低。新资料似乎确定，Ritchie 寻求联合王国的干预，以阻止派遣埃塞俄比亚飞机支持联刚行动，他向冲伯通报了这一情况。新资料强调了 Ritchie 代表联合王国政府作为事件发展的关键参与者和联络人的最高级别地位。然而，鉴于 Ritchie 的电文是在 1961年9月19日发出，而此时 SE-BDY 已经坠毁，即使他成功地影响了埃塞俄比亚飞机的抵达(这一点没有明确确定)，要影响 SE-BDY 及其乘客的困境也为时已晚。

293. 1961年9月19日奥尔波特勋爵发给在恩多拉的 Ritchie 的另一封信(部分内容为速记，但此处为全文)写道，“请邓尼特将高级专员的以下内容转给 O'Brien。哈马舍尔德的飞机在离恩多拉7英里的茂密森林中被发现。飞机已经解体，尸体散落[原文如此]在乡间。已经找到13具尸体。有一名幸存者，处境非常危险。他叫朱利安，是一名保安。尸体中只有 H 先生的身份得到了确认。当地仪式应在明日17点前完成，预计联合国将希望按照死者生前意愿进行埋葬。奥尔波特”。不清楚为什么奥尔波特勋爵要等到坠机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才通知联合国。

294. 在 1961年9月19日的同一手稿上有奥尔波特勋爵的另一封信，其中写道，“请邓尼特将以下内容转给 O'Brien。法律要求地方民航当局进行所有调查。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欢迎 Egge 上校，一架美国飞机明天将前往伊丽莎白维尔接他。恩多拉控制塔和伊丽莎白维尔控制塔之间将安排时间。奥尔波特”。

295. 在 1961 年 9 月 19 日的其他电文中，冲伯分别向奥尔波特勋爵和 Ritchie 表示，他“遵守了诺言”，自 1961 年 9 月 18 日晚以来，尤其是在哈马舍尔德的飞机坠毁之后，不再让富加飞机起飞。

296. 1961 年 9 月 19 日，Ritchie 向冲伯通报了联合国官员的预计抵达时间，Ritchie 将接上冲伯去见他们。同一天的其他电文还讨论了 Ritchie、邓尼特、兰斯唐勋爵、冲伯和韦伦斯基的行动安排。

297. 1961 年 9 月 20 日起草了加丹加与联合国之间拟议停火的手稿。不清楚该手稿是否发出，但当天的其他通信，包括穆农戈和冲伯之间的通信，都提到针对联合国的谈判策略和行动，包括使用飞机在内的一切手段与联合国对抗。

298. 1961 年 9 月 20 日中午的另一封电文像是由“总统”向“总统府”发出，而且用德文书写。不清楚为什么用德文。电文中提到联合国在停火期间通过恩德培运送增援部队，并要求富加飞机进行干预。

299. 最后，冲伯在 1961 年 9 月 21 日写给肯尼迪总统的一封亲笔信中寻求美国支持加丹加独立。他确认当时已与联合国达成停火，并认为根据对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的分析，联合国从未得到任务授权，在未经刚果中央政府准许的情况下对加丹加使用武力。

300. 除上述 1961 年 9 月 17 日至 21 日期间收发的文件之外，Picard 还分析了 1961 年以来 Loeb 记录中的其他文件。这些文件显示，加丹加(包括冲伯)、罗得西亚联邦、联合王国和 UMHK 的官员继续就加丹加事务和支持加丹加反对联合国的努力进行互动。Loeb 手写的一份未注明日期的文件称，在 Ritchie 的第一次会面后，外交行动仍有可能，Ritchie 将向莫德林提交一份情况报告。虽然该电文有什么具体内容尚不清楚，但据了解是指 Ritchie 向雷金纳德·莫德林提供了一份报告，后者是 1961 年联合王国殖民地事务大臣。虽然官方档案中没有提到莫德林的记录，但这可能是进一步信息的潜在来源，我已于 2022 年 6 月告知联合王国。

301. 来自 Hunt、英美公司和 Loeb 档案中的新资料比 2019 年分析的资料更进了一步，显示了为联合王国、罗得西亚和加丹加政府以及 UMHK、英美公司和罗电公司等其他商业利益集团做事或代表他们行事的一些关键人物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并全面了解飞机失事前几天的事件。

(b) 美国

302. 如以往所述，各种资料证实，1961 年，美国情报、安全和国防机构及人员积极活跃于刚果和周边地区。这包括上文所述 Southall、Abram、Devlin、Doyle 等人提供的资料，以及美国的公开报告，包括美国参议院研究政府情报活动特别委员会(丘奇委员会)1975 年题为“暗杀外国领导人阴谋案”的临时报告，以及该委员会编写和收到的其他相关报告。

303. 2019 年对新资料进行的分析显示,1961 年在刚果及周边地区存在大量中情局人员和行动。这些资料包括根据《约翰·肯尼迪总统暗杀记录收集法》(《JFK 记录法》)发布的记录,其中载有在刚果的中情局特工(WIROGUE、CARAVEL 和 QJWIN)及其行动的信息,包括与飞行员和飞机有关的 WICLAM 和 ZRRIFLE 等加密项目,后者是中情局对暗杀等行动使用的化名。正如 2019 年所述,这些发布的记录仍然经过了大量的校订,有时数百页中只有几页被发布。我在 2020 年至 2022 年索要资料时向美国指出了这一点,但我没有收到进一步的资料。

304. Williams 在 2022 年提供了关于这个主题的新资料,包括最近解密的一份文件,其中载有涉及 James Alistair Wicks(也拼写为 Wickes)的中情局相关材料,该文件也于 2018 年 4 月 26 日根据《JFK 记录法》公布。虽然不是专门述及已知的雇佣兵 Mike Hoare,但该文件含有大量关于 Hoare 与中情局接触的资料,包括 1960 年代在刚果的接触。记得 1961 年 Hoare 是加丹加的一名外国雇佣兵,中情局刚果站站长 Devlin 说,他在那里与 Hoare 一起工作。Hoare 的儿子出版了一本关于 Hoare 的书,这本书在 2019 年作了分析,其中写道,1961 年 9 月 17 日 Hoare 在恩多拉,正在前往加丹加的途中,他认为坠机的真正原因已经被掩盖(见 2019 年报告,第三.4.4 节和第四.A.1 节)。

305. Williams 提供的新资料提到了 Hoare 的名字以及中情局用来指代他的化名 SECAROB 或 SECAROB/1, SECAROB/2 则指他的妻子 Phyllis Hoare,而 WISTATIC 是指该文件的主要对象 Alistair Wicks,他是 Hoare 的下属。

306. 1964 年 8 月 11 日一份标有“秘密”字样、题为“情报信息电报”的文件讲述了 Hoare 向中情局提供的关于他在加丹加受雇为雇佣兵指挥官的情况。除其他外,该文件提到冲伯在同一天会见了 Hoare 和 Jerry Puren,他们在会见中享受到了“红地毯待遇”,同一天稍晚他们在与刚果军队总司令蒙博托的会面中也受到了同样的待遇。在与蒙博托会面时,他们讲述了将另外 200 名雇佣兵带到卡米纳的安排,其中包括 15 名飞行员,至少有 3 名飞行员正在利奥波德维尔等候(Hedges、Kingman 和 Mackintosh)。Puren 据说提供了“1961 年与他一起在加丹加,现在正在伦敦和布鲁塞尔等候”的 7 名飞行员的名单,以及“T-6”飞机的可用性,这可能是指似乎从 1961 年起就在加丹加出现和使用的比奇公司 Texan T-6 飞机(见 2019 年报告,第三.A.5 节)。据 Hoare 称,他当时被授予少校军衔,通过少将博博索和总司令蒙博托对冲伯发号施令。同一文件提到 Hoare 对 1961 年使用的合同并不完全满意,认为在某些方面需要修改;一份类似文件似乎再次提到 Hoare,他在 1964 年 8 月的晚些时候讨论了“1961 年加丹加合同”的条款。

307. 档案中的另一份文件也标有“秘密”字样,落款日期像是 1964 年 10 月 19 日,其中提到中情局从 Hoare 那里得到了关于刚果雇佣兵突击队地点的信息,包括 Hoare 驻扎的地点。据说正在作出安排,由 Hoare 直接招募 100 多名男子,而且据说这些雇佣兵普遍情绪良好。据 Hoare 称,“叛军”可能在大约六周内被制服,比利时人并不急于让战争过早结束,因为他们正在刚果建立另一个势力范围。

308. 档案中另一份标有“秘密”字样的文件提到 Hoare 受雇于 KUBARK(当时中情局的化名),并指出,根据一份始于 1965 年 1 月 1 日的合同,工资条件是 1965

年1月10日商定的。该文件本身没有落款日期，但从它在文件中的位置看，似乎是1966年的。同一份文件称，中情局认为 Hoare “几乎会做我们要求他做的任何事情”，包括今后可能为游击队活动进行训练。当时好像 Hoare 正在写一本书，并与中情局达成一致，他的书在出版前将由中情局审查。关于蒙博托和中情局的关系，该文件指出，Hoare 认为蒙博托“毫无疑问”不喜欢中情局，这“可能是对[中情局]为刚果提供的巨大服务的反作用”，反映了蒙博托性格的一个特点。同一份文件指出，Hoare “高度赞扬了他的办案干事，认为办案干事很有帮助。他还对没有向利奥波德维尔的站长告别感到遗憾”。中情局在利奥波德维尔的站长是 Larry Devlin，他是相关时期在刚果的重要人物，以往报告曾分析他的文章(例如，见2019年报告，第四.A.1节)。在这方面，Williams 还指出，根据1975年丘奇委员会对 Devlin 的采访摘要，Devlin 描述了他与 Hoare 及其下属的“重要接触”。

309. 不清楚 Hoare 最初受雇于中情局的时间。提到始于1965年1月的中情局合同并不排除在此之前已经签有合同；事实上，值得注意的是，同一份档案中来自1964年的文件提到 Hoare 时用了他的化名，表明他当时已经受雇于中情局。此外，Wicks 档案中没有1964年之前的文件，因此不可能仅凭该档案去核实 Hoare 何时开始与中情局接触。然而，从档案中可以清楚地看出，Hoare 作为雇佣兵在加丹加和刚果广大地区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他准备与中情局分享重要和敏感的信息，包括他在加丹加政府和刚果的雇主的详细情况，他们显然对此并不知情，这表明他将与中情局的关系放在优先位置。

310. 从档案中还可以清楚地看出，Hoare 和妻子 Phyllis 与 Jerry Puren 和妻子 Julia 关系密切，是好朋友。可以回顾的是，Puren 还说，1961年9月17日他和另两名雇佣兵(Gurkitz 和 Glaspole)在恩多拉机场，至少还有两名雇佣兵(Huyghe 和 Browne)在恩多拉镇。正如 Williams 在这一点上所述，在1981年未遂的“铁砧行动”政变期间，Hoare 和 Puren 都在塞舌尔，Phyllis Hoare 的兄弟 Robert Sims 和南非海研所成员 Ken Dalgleish 也在塞舌尔。

311. 新资料证实，美国通过中情局与 Hoare 有着密切的相互关系，包括在1960年代的不同时间在刚果雇用他。美国以往从未提供过关于与 Hoare 关系的信息，也没有提供过可能通过他或因为他而产生的信息。特别是，鉴于 Hoare 曾表示坠机不是事故，美国在审查与他有关的记录和档案后，仍然必须全面搜索和披露任何可以得到的相关信息。

312. Williams 在2022年提供了更多新资料，这些资料来自在2021年出版的《白色恶意：美国中央情报局与非洲的新殖民主义》一书中的研究。

313. 除其他外，Williams 指出，1961年2月17日，在一架美国波音 C-97 同温层货机因引擎故障迫降在当时为联合王国殖民地的马耳他之后，联合王国出版物《每日电讯报》首次断言美国参与了将富加教练机从法国运往加丹加。该货机上载有三架喷气式富加教练机，于1961年2月中旬飞抵加丹加。这篇文章发表后，包括联合王国和加纳在内的各国政府立即与美国进行了外交交涉。

314. 运送这些飞机的美国七海航空公司由 Earl J. Drew 和 Urban L. “Ben” Drew 兄弟于 1957 年成立。七海公司在曼哈顿有一个基地，在卢森堡有一支舰队。Williams 指出，根据 2014 年南非《公民报》在采访他的遗孀后发表的文章，Ben Drew 是前美国空军战斗机飞行员，1961 年在加丹加为冲伯工作。文章称 Ben Drew 被怀疑击落了 SE-BDY，但没有提供这一指控的来源或进一步的信息。此外，根据他儿子的说法，Ben Drew 还“被美国政府要求在比属刚果和越南的秘密基地工作”。

315. 在同一问题上，Williams 引用了 1980 年 Jan Knippers Black 在《华盛顿月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其中 Black 写道，1961 年她在卢森堡的海豚酒店认识了美国洲际航空公司和七海航空公司的一些经理和机组人员。Black 说，几年后她“偶然遇到了那个人的儿子，他向我自称是七海公司的经理，并证实了我已经怀疑的事情：他的父亲，现已退休，一辈子都是中情局官员。他说，洲际和七海都属于中情局”。Black 提到的那个人可能就是 Ben Drew 的儿子，正如 Williams 所述，他对自己的父亲发表了类似的评论。据 Williams 称，与 Drew 兄弟有关的记录仍然受到限制；2022 年 4 月，《信息自由法》要求中情局提供从 1961 年开始有关 Earl J. Drew 的记录，结果只产生了五页经过大幅校订的内容，其中两页校订得太多，以至于几乎空白。

316. 与七海公司运送富加飞机有关的信息以往已作过分析，包括在独立专家小组的报告(见第八节)和 2017 年的报告(见第四.A.4 节)中。中情局伊丽莎白维尔站站长 David Doyle 在他的回忆录《真汉子和叛徒》中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他后来接受了哈马舍尔德委员会的面谈，委员会指出，除其他外，Doyle 说富加飞机是法国人提供给中情局的，目的是帮助对抗联合国在加丹加的行动。哈马舍尔德委员会评估认为，Doyle 对细节的记忆有时“并不完整”。

317. 2017 年报告认为关键问题是截至 1961 年 9 月向加丹加交付了多少架可用的富加喷气式飞机，并评估认为确定已交付 3 架飞机的信息具有很强的证明价值。关于富加飞机如何交付的确切细节尚未查明，但 2017 年报告指出，除了 Doyle 的声明之外，当时分析的信息完全没有将中情局的参与跟交付喷气式飞机相联系。Williams 提供的新资料为富加飞机的交付情况提供了更多背景。其中还援引多个消息来源称，Ben 和 Earl Drew 可能与中情局有联系，Ben 曾于 1961 年在加丹加服役，担任飞行员。这些新资料尚未对照原始文件进行查验，因此不能作为补充或改变以往评估的依据。然而，与本报告中分析的许多其他新资料一样，本报告倾向于支持会员国档案中可能存在更多未披露信息的说法。在这方面，我在 2022 年请求美国提供与 Urban L. “Ben” Drew 有关的任何报告。到本报告撰写之时，我尚未收到对这一请求的答复。

(c) 德国

318. 正如 2019 年报告所述，根据 Gülstorff 提供的资料，包括中情局和西德的报告，似可确定 1961 年 9 月在刚果及周边地区有德国情报人员(见 2019 年报告，第四.A.1 节)。

319. 在 2020 年至 2022 年期间，Gülstorff 提供了新资料，扩展了 2019 年分析过的某些问题。新资料包括，大约从 1960 年起，西德情报局参与了在刚果的多个项目，这反映了西德在战后时期对刚果的重大投资。据 Gülstorff 称，西德情报局通过开展活动，1961 年在刚果及周边地区拥有了人员和资产，包括位于利奥波德维尔的一处官方住宅，以及在利奥波德维尔大学的 Robert Whissel van Deventer、别名 Bocholt 的情报顾问 Kurt Büttner 和 Hans Germani 等人。我注意到 2019 年报告中讨论了有关 Germani 的资料，包括他被中情局确定为西德情报局特工。

320. 根据 Gülstorff 提供的新资料，西德情报局和中情局都参与的一个项目据说涉及建立刚果空军飞行学校。据说有德国飞机和训练人员参与其中，包括又名 Stahl 上校的“Meister 先生”，根据中情局的档案，此人名叫 Wolf Meister，1933 年 5 月 12 日生于波恩。这份档案表明，他至少从 1955 年起就为西德情报局工作，是飞行学校的领导人之一，并担任秘密军事顾问。据说“Stein 上校”和西德情报局局长 Gehlen 也参与了这次行动。

321. Gülstorff 查到西德曾在 1960 年代参与另一个项目，涉及为民政和军事管理部门建立覆盖全刚果的电话和电信基础设施，包括为刚果情报机构(国家安全局)建立无线电监测服务。从 Gülstorff 提供的资料看，不清楚西德情报局是否直接参与了 1961 年在刚果的无线电监测或信号情报，这个问题有待确定。如果此类活动涉及西德情报局，其档案中就可能 有 1961 年 9 月 17 日和 18 日的无线电通信记录。

322. Gülstorff 还提到他在 2015 年向独立小组提供的资料非常重要，其中包括 Elsie Kühn-Leitz 的一份报告。Kühn-Leitz 自称是西德和刚果政府之间的对话者，与当时的国家安全局局长维克多·南达卡交往并成为朋友，后者曾与卢蒙巴一起住在 Kühn-Leitz 位于西德的家中。Kühn-Leitz 在与南达卡讨论后于 1961 年 10 月 7 日为西德外交部撰写了一份报告，其中她写道，南达卡曾表示冲伯的“激进分子”(文中可能指法国人)对坠机负有责任，他们用地面火力击落了飞机。

323. 如上文所述，2022 年 5 月，我与德国独立任用人员分享了上述资料的细节。我还提到，西德驻索尔兹伯里大使馆给西德外交部的信函大意是，1961 年 9 月坠机事件发生时，Germani 是在加丹加的一个电影团队的成员。

324. 我请求在德国档案中搜索相关资料，以确定能否找到任何进一步的相关信息。虽然在撰写本报告时尚未收到答复，但我提出请求的时间没有给完成这些搜索留出大量机会。我认为这是一个仍然有待跟进的问题。

325. Gülstorff 提供的新资料反映了以往报告中讨论过的信息，特别是相关时期外国情报人员在加丹加及周边地区的系统性存在，包括(本文中的)美国和西德。这些新资料也为提出有待披露的更多相关信息提供了依据，下文将对此作进一步讨论，

326. Fröhlich 在 2022 年向我提供了关于德国电视记者 Klaus Manfred Eckstein(又名 Kiu Eckstein)回忆录中所作说明的新资料。

327. 据 Eckstein 称, 1961 年 9 月, 他和一个包括摄影师 Kurt Werner Drews 和记者 Hans Germani 在内的团队在刚果(包括加丹加)。他们的工作是受 Peter von Zahn 的委托, 为自由电视公司(Freie Fernseh GmbH)制作一些电影和摄影系列。与此相关的是, Eckstein 从他 1961 年保存的一份日历中找出了一些作品, 其中记录了 1961 年 9 月 17 日他向《星期日电讯报》发送的伊丽莎白维尔机场被炸的照片。之后, 他显然去了索尔兹伯里, 并在那里看到了哈马舍尔德灵柩的转运。

328. 据 Eckstein 称, 多年以后摄影师 Drews 告诉他, 在康斯坦茨湖的一次医疗停留期间遇到了一名飞行员(Drews 的妻子告诉 Fröhlich, 这次停留可能在 1975/76 年, 但不记得诊所的细节)。Eckstein 提到, Drews 不仅是一名技术高超的摄影师, 而且对航空有着特殊的兴趣, 经常在工作飞行时坐在驾驶舱里与飞行员和机组人员交谈。Drews 在康斯坦茨湖遇到的飞行员说, 他曾将几袋钱从加丹加空运到比利时。他还告诉 Drews, 他的一名飞行员同事说, 曾用一架富加教练机在伊丽莎白维尔机场投下炸弹, 而且还击落了哈马舍尔德的飞机。Eckstein 说, Drews 讲述了这架飞机的具体细节, 包括它用于训练目的, 但被转化为军事用途。

329. 从联合国档案中得知, 加丹加空军的富加教练机于 1961 年 8 月和 9 月袭击了伊丽莎白维尔机场。上文第二.A.3 节已经对一些查明的可能涉事的飞行员进行了讨论。袭击机场的同一名飞行员可能也袭击了哈马舍尔德的飞机, 这并非不可能。然而, 对 Drews 听到的说法还需要核实更多细节, 才能赋予它一定程度的潜在效用。正如 Fröhlich 所述, 这些细节包括前雇佣兵飞行员的识别细节、对话日期和相关事项。

330. 除了摄影师 Drews, Eckstein 的团队里还包括记者 Germani。Eckstein 讲述了 Germani 对殖民主义、语言技能和医疗训练的强烈看法, 并回忆了那趟旅行中的一次经历, 他说, “在铜矿丰富的加丹加, 莫伊兹·冲伯的准民兵和联合国保护部队之间爆发了一场没有明确前线的战争。我们在拍摄时被夹在了前线之间。身着便装的武装黑人扣留了我们。但是记者 Hans Germani, 一位来自的里雅斯特的机敏的黎凡特人, 巧妙地将我们带离了这个棘手的处境”。可以回顾的是, 2019 年对多个来源的信息作了分析, 包括中情局的文件, 其中都提到 Hans Germani 是西德情报局特工, 以记者为幌子开展工作(见 2019 年报告, 第四.A.1 节)。此外, 位于索尔兹伯里的西德大使馆在 1961 年 9 月 20 日给西德外交部的一份报告中称, “刚从伊丽莎白维尔回来的 Germani 电影团队遇到了德国人 Bachmann(修车厂老板)和 Lönne(来自杜塞尔多夫?)以及两名德国记者”。

331. 2019 年我评估认为, 1961 年 9 月, 西德情报局在加丹加至少有一名特工。Fröhlich 提供的新资料看来证实了 Germani 是以记者为幌子在那里工作。2022 年 5 月, 我请求在德国档案馆搜索与 Germani 和其他事项有关的信息。在撰写本报告时, 我尚未收到任何答复。

332. 关于外国情报机构的话题是一个仍有重大未公开信息的领域。正如 2018/19 年度审查过的新资料所示, 这是某些会员国不愿意披露记录的一个领域。我将在结论中再次谈及这个问题。

2. 对早期调查的影响

333. 在 2017 年和 2019 年的报告中，我分析了大意如下的资料，即联合王国和北罗得西亚的代表试图让联合国委员会认定飞行员失误是坠机原因(见 2017 年报告第五.A 节和 2019 年报告第四.B.2 节)。

334. Simensen 在 2022 年提供的补充资料中提到邓迪勋爵给 Stuart Bevan 的信，该信似乎是在 1962 年 5 月 10 日发出。其中写道，“现在，对哈马舍尔德先生坠机事件的一系列调查已经结束，我谨代表外交大臣感谢你充满智慧的陈述，感谢你在联邦委员会和联合国委员会面前代表女王陛下[即联合王国]的利益。虽然联合国委员会认为无法得出任何确凿的结论，但我相信你在日内瓦的结论陈词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某些误解，不然这些误解就可能会对我们产生破坏性影响”。

335. 可以回顾一下，Bevan 是联合王国一名出庭律师，受代表联合王国政府的财政部律师指示，在联合国委员会代表联合王国政府。Bevan 在 1962 年 2 月 27 日结论陈词中的首要重点是让联合国委员会相信，外部干涉不是坠机的原因。罗得西亚联邦律师 F. G. Cooke 同一天的结论陈词也有类似的重点。在这方面，Bevan 表示，“我将采用[罗得西亚]联邦委员会报告中的推理作为我的论据，支持该委员会的结论，即完全排除蓄意破坏、击落这架飞机或任何故意损坏的可能性”。他指出，“如果有任何内部或外部的蓄意破坏，如果这架飞机被击落，联合王国政府都可能因疏忽或类似原因而以某种方式卷入其中。但是，我认为，非常清楚的是，内部和外部蓄意破坏的可能性已经完全排除”。他随后表示，“关于这起事故的直接原因，技术调查排除了任何形式的外部或内部干扰。原因要么是仪器故障，要么是飞行员失误”。

336. 正如 Simensen 所述，Bevan 在他的陈词中提到了对罗得西亚无线电日志文字稿的描述，但没有提到 SE-BDY 预计将“位于恩多拉正横 21.47 度”(坠机前大约半小时)。Bevan 还试图为联合王国官员开脱责任，包括兰斯唐勋爵、奥尔波特勋爵、Williams 等人，声称他们对与事故本身或 SE-BDY 未能按预期着陆后采取的搜救行动有关的任何延误都没有责任。他还敦促联合国委员会彻底驳回 Virving 关于飞机被击落的假设，并完全驳回另外四名“非洲”证人所提供的声称他们看到 SE-BDY 遭到空袭的证据。

337. Simensen 在 2022 年提供的进一步相关资料讨论了 1961 年北罗得西亚当局为说服瑞典观察员坠机不是由外部干涉造成所作的尝试。根据 Simensen 提供的资料，瑞典的布拉特部长于 1961 年 9 月 19 日抵达恩多拉。他的职责是在必要时协助瑞典专家，包括瑞典皇家航空委员会的专家，并协助鉴定和运送坠机事件中瑞典遇难者的遗体。根据 Simensen 翻译的布拉特先生的笔记，布拉特先生写道，早在 1961 年 9 月 19 日，当时不可能知道坠机原因，罗得西亚官员就试图让他相信坠机不可能是由攻击或蓄意破坏造成。特别是据说罗得西亚行政部门秘书长 Parry 告诉布拉特先生，蓄意破坏或攻击的可能性只有百万分之一。

338. Parry 似乎还向布拉特表示，罗得西亚人没有向加丹加政府提供任何军事或外交援助。这与上文分析的资料不符，包括加丹加飞行员获准使用北罗得西亚简

易机场，敏感的通信设备能够在激烈冲突期间带到基特韦，在加丹加服役的法国雇佣兵讨论了与北罗得西亚当局的合作。

339. 津巴布韦的独立任用人员根据对埃塞克斯大学奥尔波特勋爵解密文件的研究，着重提到了联合王国政府和北罗得西亚政府和相关时期的密切联系。正如在 1961 年 9 月 25 日奥尔波特勋爵给桑迪斯的信中所表明的那样，奥尔波特勋爵和罗伊·韦伦斯基爵士有着密切的工作关系，而且都有兴趣尽量减少冲突和坠机的潜在影响。奥尔波特勋爵提到他与韦伦斯基密切合作，并对冲伯实施相当程度的控制，以至于他说，韦伦斯基能够“对[冲伯]施加比加丹加本身以外任何其他个人都要大的影响”。虽然 1961 年 9 月 25 日的通信先于早期调查工作，但共同利益和密切关系的性质反映了后来为影响早期调查结果所作的平行努力。

340. 2022 年新审查的关于这一主题的资料与之前在 2017 年和 2019 年报告中分析的资料相关。这些报告指出，同一时期的文件显示，罗得西亚当局在最高级别讨论了避免联合国委员会召开单独会议的可取性，并且在明确要召开会议时，试图“培植”委员们将结果引向飞行员失误。其他资料显示，联合王国官员同样寻求在联合国委员会的报告草案公布前对其进行修改，目的差不多都是排除将蓄意破坏或外部攻击作为坠机的原因(见 2017 年报告第五.A 节和 2019 年报告第四.B.2 节)。

341. 在上述新分析的资料中，显而易见的是，罗得西亚当局希望让布拉特相信，SE-BDY 没有受到攻击，这与上文讨论的调查结果相吻合，即官员们试图确保各种官方调查都会得出这一结果。还值得注意的是，邓迪勋爵感谢 Bevan 在避免可能对联合王国产生“破坏性影响”的“某些误解”方面发挥的作用。根据 Bevan 向联合国委员会提出的立场，并考虑到 2017 年和 2019 年分析的资料，似乎可以确定，联合王国和北罗得西亚所关心的是确保在 1961/62 年得出飞行员失误是坠机原因的结论，而不仅仅是允许进行公正的分析。这一点以及在下文第五.B.1 节讨论的与 Harold Julien 所作言论有关的资料，都支持先前的调查结果，即联合王国和北罗得西亚试图影响早期调查，以排除将外部攻击或其他干扰作为坠机的原因。然而，这样做的原因仍不清楚。

B. 其他事项

1. 哈罗德·朱利安

342. 据回忆，SE-BDY 号飞机的乘客中，只有一人在飞机被正式发现时被发现还活着。1961 年 9 月 18 日下午，当官员们到达坠机地点时，联刚行动代理首席安保干事哈罗德·朱利安警司被烧伤，但神志清醒，口齿清晰。他被送往恩多拉的医院，但 6 天后因伤势过重死亡。1961 年 9 月 18 日，朱利安第一次入院时，他说了一些话，包括“爆炸了”、“速度很快、很快”、“然后发生了坠机”、“周围有很多小爆炸”、“我拉开紧急栓就跑了出去”以及“[其他人]被困在里面”。高级督察兼恩多拉中央警察局负责人 Alfred Vincent Allen 向罗得西亚调查局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他曾前往坠机现场，然后陪同朱利安前往医院。Allen 的陈述记录如下：

大约 17 点 20 分，我被一位医生叫去，因为朱利安[原文如此]开始说话了。我先前曾要求这样做。他像以前一样躺着，闭着眼睛，一直没有睁开。他问，“我在哪里？”，我回答说他在北罗得西亚，我是一名英国警官。我问他是否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他似乎意识到有人在跟他说话。我告诉他，我们最后一次听到你的消息是在恩多拉机场的跑道上，我们再也没有听到任何消息，“发生了什么事？”他说“爆炸了”。我说，“是在跑道上爆炸吗？”他说，“是的”。我说，“后来怎么样了？”他回答说，“速度很快、很快”。我问，“后来怎么样了？”他回答说，“然后发生了坠机”。这一切都是非常含糊和非常语无伦次。我说，“后来怎么样了？”他回答说，“周围有很多小爆炸”。我接着问，“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我拉开紧急栓就跑了出去”。我说，“其他人呢？”。他回答说，“他们被困在里面”。有时我不得不重复提问。我无法马上得到回答。然后他就失去了知觉。

343. 根据他过去处理类似事故受害者的经验，Allen 谨慎对待朱利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但很明显，他能够提出一系列开放式问题，并得到连贯的回答。护士 McGrath 修女是另一位证人，朱利安入院时她在恩多拉医院值班并照顾他。她听到他当着一名警官和医生的面说，“我们在跑道上，发生了爆炸”，“我们在跑道上，当时 Hammarskjöld 先生说‘回去’，然后发生了爆炸”，“我是唯一逃出来的人，其他人都被困在里面了”。

344. 1961 年 9 月 18 日同一天晚上，Lowenthal 医生在恩多拉医院值班，并与朱利安交谈。正如 Lowenthal 医生向联合国调查员 Blandori 澄清的那样，这段谈话发生在朱利安在医院服用止痛药(哌替啶)镇静之前。Lowenthal 医生称朱利安的讲话方式是清晰、清楚和连贯的。Lowenthal 医生说，他们问他们为什么没有在预期的时间着陆，朱利安回答说，Hammarskjöld 改变了主意，或者说“调头返回”。朱利安说发生了爆炸，然后坠机，过了一会儿又说发生了坠机，然后发生了爆炸，朱利安从飞机上跳了下来。Lowenthal 医生说，朱利安在后来的讨论中被注射了镇静剂，但似乎说话条理清晰。

345. 正如 2017 年的报告所指出的，早期的调查因朱利安的身体状况而驳回了他的证据，尽管他是事件的唯一第一手证人。罗得西亚调查委员会对朱利安的一项陈述一概不予理会，明确表示“不必注意”朱利安的陈述，因为“这些陈述要么与坠机后的火灾有关，要么与他当时的症状有关”。1961 年联合国委员会并不认为朱利安关于他们如何为坠机潜在原因分析提供信息的陈述具有证明意义，这可能是由于该委员会依赖罗得西亚调查委员会的工作。最后，在能够为朱利安作证的 27 名证人中，罗得西亚调查委员会只听取了 8 名证人的证词，联合国委员会只听取了(8 名证人中)5 名证人的证词。其结果是失去了充分考虑 SE-BDY 号飞机上唯一一名可以谈论坠机事件的乘客提供的证据的重要机会，导致在考虑潜在相关证据方面出现重大失误。

346. 2020 年至 2022 年间，关于这一议题的新信息引起了我的注意。津巴布韦的独立任用人员提供了美国驻索尔兹伯里大使馆 1961 年 9 月 19 日致白宫的信函，其中称“朱利安警司在神志清醒的时候说，他是联合国驻利奥波德维尔的首

席安保干事。他要求将他生还的情况告知他的妻子”。对这一信息的坦率内容和朱利安有时清醒的描述，似乎证实了包括 Allen、McGrath 和 Lowenthal 医生在内的证人对早期调查的描述。这与罗得西亚的调查所描述的朱利安的状态是漫不经心或神志不清的特点形成了某种对比。

347. Simensen 2022 年提请我注意的其他信息是，1961 年 9 月 19 日晚，索尔兹伯里有身份不明的北罗得西亚官员发来一封电报，通知联合国联邦关系事务部和联合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显然是为了答复联邦关系事务部的询问，其中称唯一幸存的乘客“[哈罗德]朱利安[原文如此]今天稍微好一点，但仍然病危”。上文第四节 A.1 提到朱利安处于“非常危险的状况”，这与 Alport 勋爵在同一天对 Ritchie 的描述类似。

348. 然而，尽管知道朱利安的健康状况严重，北罗得西亚政府给联合国的评估明显不同。1961 年 9 月 20 日，联合国驻索尔兹伯里的代表 Scott 在大约 12 小时后发给卢萨卡省长的电报中说：“[联合国代表]Spinelli 和 Knut Hammarskjöld 已经到达恩多拉。我还能够向他保证，幸存者朱利安[原文如此]正得到尽可能好的医疗照顾，最新的报告显示他还能坚持下去。不清楚为什么北罗得西亚政府在得知朱利安病情“危险”的情况下仍向联合国代表保证他“能坚持下去”。

349. 第二天即 1961 年 9 月 21 日上午，朱利安在没有见到联合国代表 Spinelli 的情况下去世了。Spinelli 的任务并不是代表联合国展开任何调查，但如果他知道朱利安“病危”，而不是被误导说他“能坚持下去”，他可能就有理由尝试亲自去见朱利安。然而，Spinelli 没有去医院看望朱利安，也没有要求他谈谈坠机事故。在被告知朱利安“能坚持下去”之后，Spinelli 似乎并没有感到有任何紧迫感。

350. 这一新信息可能表明北罗得西亚当局淡化朱利安的陈述与总体上试图限制与朱利安接触之间的关系。正如 2019 年报告中所讨论的，罗德西亚官员 Archer 上校也曾试图确保朱利安关于 SE-BDY 号飞机上爆炸和空中火花的陈述不被公开，包括让主治医师“确保其工作人员都不谈论”此事。除了总体上限制与朱利安接触外，这也可能导致从朱利安处获得关于 SE-BDY 号飞机最后时刻的信息较少。

351. 关于朱利安的陈述，Ian Ross 于 2015 年向独立小组提供了一封提及该议题的信函。Ross 告诉独立小组，他是 1961 年 9 月在恩多拉附近的 Bwana Mkubwa 指挥北罗得西亚警察机动部队的督察。Ross 提供了一份 1961 年的剪报，其中提到他在飞机失事现场担任警卫，并提供了一份 1999 年他写给一位英国教授的一封信，信中提到一本关于赞比亚首任总统卡翁达的书可能会出版。在 1999 年的信件中，Ross 提到了 SE-BDY 号飞机坠毁事件，并随信附上了加丹加雇佣军的一些笔记和照片(独立小组没有拿到这些笔记和照片)。关于朱利安，与此相关的是，Ross 说，在恩多拉医院，他“在生死之间徘徊，靠政府外科医生 Donald Macnab 的努力维持生命……当然，我们有一台录音机，警察每天 24 小时守在他的床边，监测他所说的一切。”

352. Ross 关于朱利安床边有一台录音机的陈述反映了向罗得西亚委员会提供的证词，包括护理过朱利安的护士 Kavanagh 提供的证词，她就朱利安关于坠机的说法提供了证词。但是，Kavanagh 护士表示，房间里的录音机没有被使用。我不知道另一名护理过朱利安的证人说录音机被使用过，也没有证据表明朱利安的陈述被录音过。然而，如果 Ross 的陈述是真实的，并且有这样的记录，那么这些记录可能具有重要意义，有必要让包括医学专家在内的专家对这些记录进行检查。我认为这是一个将来可能要审查的问题。

2. 其他需要进一步询问的信息

353. 2020 年至 2022 年期间收到的某些信息使得未来有可能进行调查，这要么是由于信息开辟了进一步的调查途径，要么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对 2022 年 7 月本报告定稿前收到的信息作进一步的跟进。我已在报告正文中指出了这些问题。

五. 分析结果和建议

354. 根据大会第 74/248 号决议，我的部分任务是，如有可能，从已经进行的调查中得出结论。尽管作出了最大努力，但目前还无法就坠机原因得出明确结论。在本节中，我总结了我们对情况的进一步了解是如何影响有关这一悲惨事件的可行假设的。我还要说明为什么(在我看来)目前还不能以任何合理的确定程度得出结论。

A. 坠机的原因

355. 根据目前了解的情况，SE-BDY 号飞机坠毁可能是因为在着陆前受到某种故意干扰，也可能是由于人为失误。没有证据表明存在其他意外原因，如机械、结构或重大故障。其他先前评论的假设，包括设备或通信故障、测高仪错误(无论是机械的还是空中交通管制传达了错误的设置(修正海平面气压))，或使用了错误的着陆图，在 2013 年至 2017 年期间都没有获得接受。

356. 由于飞机在很大程度上被大火烧毁，因此无法绝对排除重大故障的可能性，但从早期调查以来获得的资料表明，考虑到飞机的下降角度、速度和起落架延伸等估计问题，以及发现在撞击地面时所有四个发动机都在运转，飞机是正常降落于恩多拉的。

357. 另外，我注意到，独立小组和 2017 年报告的结论之一是，几乎可以肯定，哈马舍尔德及其随行人员在着陆后没有遭到暗杀，但这与坠机本身的原因无关。这些报告认定，乘客在空难中当场死亡(朱利安除外，他 6 天后死亡)。这一结论是在对最初的医学和尸检 x 光片进行重新考虑后得出的。在被征求医学意见的专家中，邓迪大学法医和法律医学中心主任 Stewart Fleming 证实，病理学家在验尸时正确记录了所有伤口，哈马舍尔德的前额没有枪伤。

358. 如果存在某种形式的对 SE-BDY 号飞机的故意干扰，这最有可能被归类为“外部干扰”(来自飞机外部的攻击或威胁，无论是空中还是地面)，或“内

部干扰”(对飞机的破坏)。如果是人为错误,这很可能是由于飞行员的作为或不作为造成的。与每一个假设相关的信息将在下面相应的结论意见中介绍。

1. 外部攻击或威胁仍是坠机的可能原因

359. 在分析了历史记录、新信息和专家意见后,2017年和2019年的报告认定,飞机外部的敌对行动是飞机坠毁的可能原因。此种行动可能包括直接攻击导致飞机坠毁,或飞行员因感知到威胁而暂时分心,导致他们过早地飞向地面。我在2020年至2022年的工作中一直无法排除外部攻击或威胁是导致坠机的原因。我确认这仍然是看似合理的假设。

360. 自早期调查、包括在本任务规定下进行的调查以来获得的新资料仍显示有更多的可能性表明SE-BDY号飞机可能遭到攻击。如上所述,早期的调查只是一带而过地提到这一事实,即该事件是在持续的暴力武装冲突背景下发生的。反对联合国的行为体有攻击联合国部队的动机,而且在发生这一悲惨事件之前就有攻击的记录。调查的每一个持续阶段,包括目前的阶段,都发现了比以前所知的更多有关这种能力的证据。此外,与早期调查所了解的情况相反,人们普遍事先知道哈马舍尔德当晚将前往恩多拉。

361. 可能有外部攻击的说法并不是一个新的假设。正如2019年报告中所讨论的,美国政府最高层立即考虑了这种可能性。美国驻刚果大使埃德蒙·格利恩1961年9月18日发出的多份报告称飞机“可能被击落”,并称在飞机坠毁之前,“空中有一道闪光”。在早期调查之后,尽管一些国家政府可能试图影响1961年联合国委员会作出相反的结论,但该委员会认为,除其他外,外部干扰仍然是一个可能的原因。

362. 如以下各分节所述,现有信息和新信息均支持可能存在针对SE-BDY号飞机的外部干扰的假设。这包括目击者的证词,以及那些未得到答复的说法,即声称听到或看到有关对飞机进行空中或地面攻击的通讯记录。此外,2022年经分析的新信息强化了存在这种外部干扰能力的说法。

(a) 目击者提供的信息

363. 已确认的目击者是SE-BDY号飞机最后时刻的重要证据来源。7名目击者告诉罗得西亚调查局,他们看到第二架或第三架飞机;6名目击者向罗得西亚调查局提供了有关这件事的证据。1961年联合国委员会还听取了至少6名目击者的证词,他们说注意到不止一架飞机,以及至少12名目击者说天空中有一道闪光(或类似的光)。其中一些目击者(虽然不是全部)的证词被打折扣或不被相信,因为他们是“非洲人”。坠机事件中唯一的短暂幸存者哈罗德·朱利安的一些说法也暗示飞机接近恩多拉时存在威胁或袭击,可能涉及突然爆炸。

364. 自早期调查以来,至少又约谈了12名目击者。2015年,独立小组听取了5名新证人的证词,他们观察到不止一架飞机,有7名目击者声称看到一架大型飞机在坠毁前着火。

365. 有大量的目击者证据提到以下一个或多个事项：当 SE-BDY 号飞机接近恩多拉时，在空中看到不止一架飞机；出现的另一架飞机是喷气式飞机；SE-BDY 号飞机在撞击地面之前已经着火；和/或 SE-BDY 号飞机可能已被另一架飞机开火或主动交战。

366. 任何目击者都有可能弄错他们所说的看到或听到的东西，特别是由于事件发生在夜间，而且考虑到在可能不利的条件下目击者识别方面的缺陷。此外，由于目击者的位置不同，并非所有目击者都能以同样的方式观察到这一事件。对于近年来第一次接受访谈的目击者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的记忆出现失误等风险越来越大。然而，作为一个整体，许多独立观察者所说的所见所闻的证词是不容易解释明白的。

(b) 声称无意中听到有关攻击的通信

367. 独立小组认为，Charles Southall 和 Paul Abram 声称在 1961 年 9 月 17 日至 18 日晚上分别听到或看到一份无线电传输截取的文字记录，其证明价值适中。上述两人均独立地认为他们听到或看到的与 SE-BDY 号飞机受到攻击有关。2017 年以来，每年都收到更多的信息，这些信息为 Southall 和 Abram 的说法提供了证据。2019 年，我评估他们的说法具有很强的证明价值，即美国当时正在监测无线电通信，相关的文字记录极有可能已创建。我在本报告中保留了这一评估。

368. 关于 Abram，美国最初表示没有他的服役记录。2017 年，美国证实 Abram 曾于 1961 年在克里特岛担任信息截获专家，但表示他当年 9 月不在那里。Abram 后来提供了相反的资料，美国随后也没有予以反驳。2019 年，我获悉 Abram 已去世。

369. 如前所述，相关事项包括 Abram 在一段时间内提出的各种说法以及他在 2017 年 7 月最后一次重申他在所述日期人在克里特岛。他的专业和职责是作为一个语音截获规程专家得到了美国空军安保审查的确认。这一信息在他活着时没有受到进一步质疑，并因本报告中讨论的问题而得到补充，包括关于他接受的训练和所在地点以及他的同事的身份。所有这些问题都已转达给美国，迄今没有遭到反驳。

370. 关于 Southall 的说法，这些说法在这件事上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美国已确认 Southall 在美国海军的职位，他是作为海军预备役司令官退休的。无可争议的是，他曾是一名“处理和报告”军官，于 1961 年被派往尼科西亚附近的一个海军通信设施。与 Abram 的情况一样，美国也被要求澄清 Southall 去世前多年的各种说法：就 Southall 的情况而言，他在 1967 年至 2013 年期间一直试图向官员传达信息。2019 年至 2022 年期间收到的新信息支持 Southall 先前的陈述，并提供了更多关于他接受的训练、所在地点和同事的详细信息。所有这些问题都已转达给美国，迄今没有遭到反驳。

371. 由于我们对 SE-BDY 号飞机最后时刻的无线电通信了解不全，目前仍不清楚恩多拉空中交通管制员 Martin 为什么在 SE-BDY 号飞机坠毁前销毁了他的事件记录。2022 年经分析的信息对 Martin 叙述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提出了进一步的

质疑，包括他当时独自一人在管制塔内，也没有录音。此外，他向 1961 年联合国委员会所作的陈述中说，他无法阅读空中交通管制塔电传打印机上转录的无线电信息“可能是因为部分传输受到干扰”，这可能意味着 SE-BDY 号飞机的无线电通信受到干扰。

372. 由于恩多拉空中交通管制记录不足的情况令人怀疑，因此任何未公开的无线电交通记录的可能存在显得更加重要。包括在恩多拉的英国官员和北罗得西亚官员在内的多名证人指出，配备先进设备的美国飞机很可能在监测来自恩多拉的无线电通信，并在此期间与其他空中飞机进行通信。如上所述，Alport 勋爵还了解到，在管制塔与 SE-BDY 号飞机之间进行最后一次有记录的通信之后，SE-BDY 号飞机曾与恩多拉空中交通管制塔以外的其他人进行过通信。这些美国飞机是否参与或注意到有关通信，包括 Southall 和 Abram 提到的通信，仍有待核实。

373. 本报告所分析的信息清楚表明，某些会员国 1961 年 9 月有监测、截获和接收截获的联合国敏感通信，以及加丹加和恩多拉及其周围地区更广泛的通信。尽管已提请会员国注意这一点，并提出了具体的信息要求，但有关会员国还没有提供任何文件或其他资料来答复我关于这一问题的询问。正如 2019 年报告所指出的，在这一特定领域，会员国的不合作行为可能被视为接近于故意阻挠了解情况和事件的全部真相。

(c) 进行外部攻击的能力

374. SE-BDY 号飞机飞越一个军事化地区的冲突区，将哈马舍尔德及其随行人员运送到恩多拉，目的是试图促成停火。在该地区内，有各种武器、飞机、车辆和人员能够对 SE-BDY 号飞机发动攻击。然而，如上所述，早期的调查基本上认为 Fouga Magister 型喷气式飞机是对 SE-BDY 号飞机发动攻击的唯一候选飞机，并根据加丹加空军 Delin 少校的证词和认知的操作局限，有效地排除了这种可能性。但我们最近对情况的进一步了解表明，还有更多的简易机场、飞行员和飞机被用来对付联合国部队，这一切本来就可以用来攻击 SE-BDY 号飞机。

375. 如上文所分析的，加丹加空军有多名可能的飞行员，他们仍是本次调查的有关人员。具体到 Van Risseghem, Coppens 2019 年称他承认击落了 SE-BDY 号飞机；这一点尚无法得到证实。也无法确切地确定 Van Risseghem 在 1961 年 9 月 17 至 18 日晚上在哪里。似乎有人知道他在 SE-BDY 号飞机坠毁后立即飞往布拉柴维尔，并与包括中央情报局特工在内的一些有关人员同时在那里。联合王国 2022 年证实，Van Risseghem 在 1942 年 11 月至 1946 年 9 月期间作为一名上士飞行员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但没有关于他的进一步细节。注意到他的祖先、家庭关系和在英国武装部队服役的记录，以及显示美国认为他可能袭击了 SE-BDY 号飞机的信息，仍有必要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调查。

376. 根据 2022 年分析的资料，Schäfer 于 1961 年 9 月 21 日在格陵兰驾驶 DO-28 型飞机。虽然对他的飞行日志仍有疑问，但如果查阅其他同期记录，如移民和机场记录，可合理地确定 Schäfer 在 1961 年 9 月 21 日确实在格陵兰岛，这样似乎可以排除他与 SE-BDY 号飞机坠毁的任何潜在关系。这一点尚待核实。

377. 关于 Beukels 假说，比利时 2022 年提供经过分析的新信息表明，Beukels (或 Beuckels)不是加丹加空军飞行员，也没有接受过飞行训练。这支持了 2019 年报告中的分析。

378. 关于可用于攻击的飞机类型，包括 Fouga Magister、De Havilland Dove 和 Dornier DO-27 或 DO-28 型飞机在内的多种飞机已被武器化，可在加丹加使用，并于 1961 年 9 月被加丹加空军用于攻击行动。这些飞机使用加丹加、刚果共和国、安哥拉和北罗得西亚的多个机场和简易机场，包括在夜间使用，并据记录对联合国和其他方面有过空对空和空对地攻击。

379. 鉴定意见认为，在当时条件下，从空中成功攻击 SE-BDY 号飞机是可能的，但很困难。然而，即使是骚扰(不用接触)也可能在 SE-BDY 号飞机坠毁中发挥作用。正如我以前所指出的，这两种情况在这样的分析中仍需要谨慎。空中和(或)地面攻击有可能发生这一事实，并不等同于掌握了关于这种攻击已经发生的具体信息。目前已知的情况是，不能简单地排除攻击或威胁，根据已经确定的情况，这仍然是一个合理的假设。

380. 除了加丹加空军飞机发动攻击的可能性外，我注意到，2019 年经分析的信息显示，在悲剧事件发生期间，北罗得西亚部队在加丹加边境两侧处于战备状态。皇家罗德西亚空军在该地区拥有至少 18 架堪培拉式喷气式战斗轰炸机、30 架吸血鬼式喷气式战斗轰炸机和 12 架 Provost 式轻型攻击机。Alport 勋爵在 1961 年 9 月 25 日给 Sandys 的信件中也提到了罗德西亚空军和陆军在加丹加边境集结的情况，并指出“皇家罗德西亚空军几乎所有的战斗力量连同一个欧洲步兵营和一个装甲车中队”在 1961 年 9 月 13 日左右“被命令立即前往北罗德西亚”。虽然没有任何具体资料或假设表明涉及任何这类飞机，但不能断然排除非加丹加空军的飞机可能是目击者在恩多拉周围看到或听到的飞机。

2. 内部干扰：目前还无法断定破坏活动是否是坠机的原因所在

381. 1961 年联合国委员会指出，1961 年 9 月 17 日，阿尔贝蒂娜号飞机在利奥波德维尔的停机坪上停留了数小时，但没有专门的看守。当天早些时候，该飞机被地面小武器发射的子弹击中后，在那里进行维修。不能排除未经授权接近该飞机进行破坏的可能性。虽然在飞机残骸中没有发现任何异物，但这不能绝对排除人为破坏的残余，因为机身 75-80%已被烧毁和(或)融化。

382. 大多数关于潜在破坏的说法都已被排除，包括之前所说的假设，即可能有一名额外的乘客劫持了飞机。然而，上文讨论的天蓝色行动文件中概述的破坏说法未能得到最终评估或消除。根据 2019 年的分析，SAIMR 似乎确实作为一个组织存在，尽管这项调查的重要细节，如它是否有能力在 1961 年发动攻击，尚未得到最终确定。

383. 现有资料、包括 2022 年新分析的资料表明，SAIMR 不太可能在 1961 年成功实施天蓝色行动。然而，为了作出适当和最终的评估，南非仍有必要提供任何形式的天蓝色行动文件，南非和其他会员国也有必要协助披露关于这一问题的任何现有资料。

3. 坠机仍有可能是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人为(飞行员)失误造成的事故

384. 鉴于机械、结构或重大故障似乎被排除在外，如果飞行没有受到干扰，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坠机是由人为错误造成的，例如飞行员误读仪表进图和看不到地面。即使机组人员可能有经验，并在正常飞行条件下驾驶，飞机发生事故也是可能的。

385. 在本报告中，我考虑了新的信息，其中认为飞机下降的受控性质和方式表明，SE-BDY 号飞机试图进行自愿迫降尝试。如前几节所述，我就此事征求并获得了专家意见。

386. 目前还没有记录在案的证据可以完全排除飞行员的失误。这种性质的相关证据可包括求救呼叫或飞行员在飞机坠毁前吸入烟雾等证据。关于可能发出的求救呼叫，我再次指出，会员国似乎没有披露所有有关信息；不能排除这种呼叫。至于吸入烟雾的问题，我已接纳医学专家的意见，即没有这种可能性。因此，既没有例子，也没有任何类似的东西是成立的。

387. 如果所有具有重要证明价值的信息都已被披露和审查，并且没有其他与证据合理一致的假设，那么作为坠机主要原因的飞行员失误必须被视为可能的解释。然而，在现阶段得出这一结论是不合理的，因为几乎可以肯定，所有具有重要证明价值的信息都没有披露，要客观地查明全部真相。如前所述，在知道没有看到所有潜在的重要证据的情况下得出任何结论性定论，既不明智，也不负责任。

388. 因此，在解决这一问题方面仍然存在一个突出的障碍：可以回答重要的未决问题的信息似乎存在，但会员国没有披露。这些问题包括：例如，是否有创建或仍然存在所谓的语音截获信息，以及是否有任何安全、情报或其他实体创建或持有有关存在空中或地面攻击的记录。

B. 其他事项

1. 会员国的合作

389. 大会第 74/248 号决议提出了争取充分公布相关记录的进程，并呼吁会员国支持这一进程。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敦促采取行动，支持集体追查这一悲惨事件的全部真相。

390. 我在 2018/19 年度与之互动的 14 个会员国中，大多数国家都遵守关于对本国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进行专门内部审查的要求的文字和精神。因此，我在 2020 至 2022 年期间向有限的几个会员国发出了后续询问。

391. 尽管一些会员国提供了补充信息和协助，但本任务规定下的大多数新信息都是个人工作产生的。在我上文所述的最有可能持有未披露重要信息的 3 个主要会员国中，即南非、联合王国和美国，自 2017 年以来没有披露任何重要信息。如下文所述，南非和联合王国在这一期间没有披露任何文件。美国在 2018/19 年度提供了一份文件，2021 年提供了另一份文件，这两份文件都是公开的。但尚未收到对我的具体搜索请求作出回应的文件。

392. 与此同时，我对这些会员国表示愿意进行通信以及分别邀请我继续提请它们注意新的信息和具体问题表示感谢。我认为，各会员国可以而且必须做更多的工作，确保披露所有可能相关的信息。我在下文提出了继续需要这 3 个会员国作出回应的事项类型。

393. 还向埃塞俄比亚、法国、德国、刚果共和国、赞比亚和津巴布韦提出对相关信息进行单独搜索以及随后发现的上述各专题标题下讨论的问题。对这些搜索请求作出回应的任何信息也将有助于我们增加对这一悲惨事件的了解，并提醒注意作为可能采取后续行动的事项。

(a) 南非

394. 自本调查开始以来，南非未发现或提供任何文件或其他记录。令人鼓舞的是，南非已表示今后将在高级别给予全力支持，这是值得赞扬的。

395. 除了查明和分析与天蓝色行动文件(无论是文件原件还是副本)有关的信息外，南非的当务之急仍然是查明 1961 年 9 月被点名的有关人员的移民、航班、警察和其他官方记录，包括上文第三节 A.3 提到的记录。我在 2022 年 5 月 23 日给南非的信函中提出了这些事项。

(b) 联合王国

396. 自 2017 年以来，尽管在书面信函中确定了几乎肯定会发现此类信息的领域，但联合王国没有发现或提供任何文件或其他记录。

397. 2022 年 6 月，除其他请求外，我曾要求联合王国具体查实，它是否“在任何时候创建、持有或以其他方式了解与(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961 年 9 月 17 日 20:00 至 1961 年 9 月 18 日 02:00 期间在北罗得西亚恩多拉或其附近发生的事件有关的任何无线电通信、信息传输或其他通信记录，内容涉及：秘书长的飞机(包括与该飞机的通信或有关该飞机的通信)；任何飞机在恩多拉降落或进场；以及(或)在该区域内对飞机的任何袭击或飞机坠毁”。

398. 我很高兴在本报告定稿之前即 2022 年 7 月 18 日收到答复，其中指出，联合王国“在 1961 年 9 月 17 至 18 日夜间对恩多拉或其附近的无线电通信档案记录进行了详细搜索。我遗憾地告知，我们没有持有任何记录”。虽然对本次调查的一个相关领域的答复是一个值得欢迎和有益的贡献，但我注意到，虽然答复中说联合王国目前没有这种档案，但它是否完全回应了我的询问，即联合王国是否“在任何时候创建、持有或以其他方式了解[此类]记录”，这一点仍不清楚。这仍是一个有待今后澄清的问题。

399. 联合王国 2022 年 7 月的答复要求转达的是，联合王国无法确认或否认我信函中所列的大多数事项，要么是因为没有提供消息来源，要么是因为它无法确认或否认被点名的个人的机构从属关系。关于消息来源，之前在 2017 和 2019 年的报告及通信中已有述及。因此，可以很容易地确认对这些消息来源的提及。一旦提出消息来源，联合王国应能核实有关问题。这是一个值得欢迎的事态发展，我感谢联合王国表示愿意建设性地参与核实工作，并直接答复明确的询问。

400. 关于查阅具体档案的问题，我曾要求联合王国允许查阅其档案中题为“(ID 1392)哈马舍尔德档案：研究分析家档案—‘刚果(利奥波德维尔)第7卷,1961年’，以及有关达格·哈马舍尔德的材料的搜索，16个档案”。我获悉，这是一个单一的文件，加上外交、联邦和发展事务部工作人员在线搜索的16份打印件，这些文件已获准查阅，并可供查阅。我还要求对1961年常务次长部门的记录进行搜索。我收到的答复称，联合王国在这些记录中，或在被认为不构成移交给联合王国国家档案馆的收藏品一部分的重要文件的销毁记录中，“没有任何与[该]调查有丝毫关系的東西”。

401. 我还要求联合王国查阅其他记录和档案，但没有得到是否这样做的确认。我在此列出这些记录和档案，以便将来确认：国防部，包括联合王国武装部队和国防情报部门的记录；安全局(军情5处)；秘密情报局(军情6处)；政府通信总部；“外交和联邦事务部纸质档案记录”(以前部分称为“特别收藏品”)，以及外交和联邦事务部与这些档案记录的维护和管理有关的文件；由联合王国政府部门(包括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和英国国家档案馆)持有的对外封闭或已保留的信息；所持有的尚未解密和(或)尚未到期解密的信息；单项文书、一揽子文书、大法官文书及(或)其他文书所涵盖的文件(包括信息自由豁免)；“绝密独立记录(1953至1963年，包括其目录)；确认曾存在但现已不复存在的记录和档案的销毁证明或其他资料。

402. 如前所述，尽管详细的请求反映了我们自2017年以来对事件越来越多的了解，但联合王国仍没有披露任何新的文件或其他记录。虽然会员国可能认为它们以前遵守了以前的搜索请求，但重要的是要全面披露，当对情况有进一步了解的时候，应再次进行搜索，而且搜索应由具有足够背景知识的人员进行。

403. 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的重要性，在2015年联合王国给独立小组的信函(作为独立小组报告的附录)中，联合王国表示，对于所要求的信息，包括与Neil Ritchie有关的信息，它“没有相关信息”。然而，后来获得的信息(包括从Loeb、Hunt和Tshombe的档案中获得的信息)表明，英国政府发挥了核心参与作用，Ritchie当时向伦敦汇报关键事件，并接受伦敦的指示。此外，联合王国的外交信函，包括1961年9月25日Alport勋爵给Sandys的信函，提到来自伦敦的授权，即利用里奇来协调事件，在飞机坠毁前跨越国际边界管理Tshombe与哈马舍尔德的会晤。同一封信函清楚表明，在飞机失事后，英国的参与是如此重要，以至于里奇成为联合国与加丹加之间某些停火谈判的唯一外国代表，而Alport勋爵则直接就这些谈判向Tshombe提出建议。尽管如此，与Ritchie报告有关的文件以及Ritchie提供的其他信息都没有被披露。

404. 联合王国早期答复的不完整性可以通过在了解必要的关键词和背景的情况下重新进行搜索来补救。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答复我在信函中提出的具体问题，并详细说明所采用的搜索方法和所查阅的档案，仍然是很重要的。

405. 以前也有人说过，联合王国可能持有其前被保护国和殖民地、包括罗得西亚联邦移交的相关记录和档案。在这方面，正如津巴布韦独立任用人员向我指出的那样，Alport勋爵的文件证实，重要文件已从罗得西亚联邦移走，并转交给外

交和联邦事务部的联邦图书馆安全保管，而且在津巴布韦独立之前，殖民当局“小心翼翼地移走了几乎每一份与达格·哈马舍尔德坠机事件有关的记录或档案”。其中某些记录、包括警察、情报、军方和移民的记录可能具有核心重要性。因此，尽管联合王国在 2022 年 7 月确认搜索包括罗得西亚联邦高级官员的往来信件，但被移走的与这一悲惨事件有关的罗得西亚记录的下落或不受限制的查阅仍有待详细说明。

406. 总之，虽然在 2017 年中至 2022 年期间，联合王国没有提供任何文件，但我对 2022 年 7 月收到的建设性协助表示感谢，其中包括进一步的搜索和对询问的一些答复。我们寻求联合王国今后的充分合作，这种合作仍然是必要的。

(c) 美国

407. 除了上述两份文件之外，自 2017 年年中以来，美国没有发现或收到任何文件或其他记录，尽管美国被确定几乎肯定持有相关信息，而且尽管在通信中已向美国传达可能发现信息的领域。

408. 如上文关于联合王国的段落所述，为了全面披露，必须在对情况有进一步了解之后，再次进行搜索，而且搜索应由具有充分背景知识的人员进行。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为什么这一点对美国来说很重要，美国在 2015 年给独立小组的信函(作为独立小组报告的附录)中说，中央情报局进行了搜索，没有发现有任何文件显示有 Fouga Magister 型飞机在所述时间前后出现在加丹加地区。尽管美国声称它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文件”，但来自私人消息来源的其他信息表明，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中央情报局自己的《中央情报公报》的文件(2010 年后在某些情况下是公开的)，包括 1961 年 2 月 3 日、1961 年 10 月 9 日和 1961 年 12 月 16 日的文件，都提到了 Fouga 型飞机，包括 1961 年由一家美国注册的航空公司将该飞机运往加丹加。2019 年的报告中提到了其他一些例子，美国表示没有回应信息，之后私人消息来源发现有相关的美国官方记录。

409. 如果在不了解适当的关键词和背景的情况下进行搜索，2015 年可能无法找到与(例如)Fouga 型飞机相关的记录。另一个问题可能是，仅提及“哈马舍尔德”和“飞机失事”等术语的广泛搜索可能无法找到与该事件没有直接关系的重要信息。同样，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答复我在信函中提出的具体问题，并详细说明所采用的搜索方法和所查阅的档案，仍然是很重要的。

410. 此外，正如津巴布韦的独立任用人员和 Williams 分别向我指出的那样，某些记录，如根据《肯尼迪记录法》公开发布的记录，要么已被大量编辑，要么已有文件被删除。随着对情况有进一步的了解，对保留了编辑内容的领域进行适当的重新考虑以获取潜在的信息仍然很重要。以本例为例，从肯尼迪档案中删除的某些文件似乎同利奥波德维尔与美国空军之间的通信有关。这些信息来源或其他消息来源可能提到 1961 年 9 月 17 至 18 日在恩多拉停机坪上的美国飞机进行信息往来传输或听到信息传输。

411. 2022 年 6 月，除其他请求外，我曾要求美国具体查实，它是否“在任何时候创建、持有或以其他方式了解与(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961 年 9 月 17 日 20:00 至

1961 年 9 月 18 日 02:00 期间在北罗得西亚恩多拉或其附近发生的事件有关的任何无线电通信、信息传输或其他通信记录，内容涉及：秘书长的飞机(包括与该飞机的通信或有关该飞机的通信)；任何飞机在恩多拉降落或进场；以及(或)在该区域内对飞机的任何袭击或飞机坠毁。”截至本报告定稿时，我尚未收到答复，但我要指出，继续关注此事并在进行彻底搜索后得到明确答复，这一点仍然非常重要。³

412. 总之，除了 2019 年一份文件和 2021 年两份文件(如前所述，这些文件是公开的，包含已知信息)外，美国在 2017 年中至 2022 年期间没有提供任何其他材料，我尚未得到答复的询问也没有得到答复。与此同时，我对美国愿意进行建设性的调查表示赞赏。我将继续请美国方面给予充分合作，这仍然是必要的。

2. 想必存在进一步的相关信息

413. 2017 年和 2019 年的报告得出结论认为，举证责任已转移到某些会员国，以表明它们已对其保管或拥有的记录和档案进行了全面审查。充分披露所有可能相关的信息，就是充分履行披露的责任。然而，鉴于自 2017 年中以来，有关主要会员国没有披露任何重要文件，我谨指出，这一责任尚未得到履行。

414. 尽管会员国查明和提供的信息数量有所减少，但如前几节所分析的那样，个人和非国家实体继续提供重要信息。这一信息突出表明，会员国的档案中很可能存在更多的信息。如 2019 年报告的结论部分所述，已具体和有限地确定此类信息可能存在的地方。

415. 以美国为例，中央情报局的文件(由个别研究人员提供)显示，美国与向加丹加提供武器、飞机和人员(包括 Fouga 和道尼尔式飞机)有联系和(或)知晓此事。例如，2019 年报告中分析的其他文件显示，中央情报局特工人员试图为刚果的“行刑队”保留特工，并在那里安排了一架中央情报局飞机和相关行动。从 2022 年的新信息来看，加丹加的主要雇佣军人员与中央情报局似乎已建立联系。虽然这些信息都不是由美国独立任用人员提供给我的，但以已确定的文件作为起点，美国的充分合作几乎肯定会揭示出更多的相关信息。我再次指出，丘奇委员会的报告提到大量中央情报局电报，内容涉及相关时期在刚果境内及周围的活动，但美国在这次调查中没有出示或提到中央情报局或国家安全局的此类通信。最重要的是，美国创建、持有或通过其他方式了解到的任何无线电通信、传输或其他通信记录的问题仍有待补充解释。

416. 同样，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联合王国方面已创建与 Neil Ritchie 报告(及相关事项)有关的信息。坠机事件发生在英国一个被保护国。包括 Ritchie 在内的以官方身份行事的官员在安排和促成哈马舍尔德与 Tshombe 之间的拟议会晤中发挥了作用。在飞机失事前，他们是事件的中心，以至于 Ritchie 陪同 Tshombe 跨越国界，往返于会议之间。英国官员在正式发现坠机事件之前就知道了情况，并在哈马舍尔德死后立即接管了他的敏感材料。

³ 见上文第 80 段脚注 1。

417. 2017 年和 2019 年报告的某些相关调查结果进一步推动了完全披露结果。这包括联合王国及其保护国北罗得西亚收到了截获的联合国通信；两国官员分别试图影响早期的调查，以得出“飞行员失误”的结论；罗得西亚当局试图扼杀朱利安的说法，其中暗示在飞机接近恩多拉时存在威胁或攻击，可能涉及突然爆炸。

418. 最后，包括 Daphne Park 和 Ritchie(作为两个例子)在内的英国实地情报人员的参与是一个记录在案的事实，这源于包括他们在世时自己发表的评论在内的事件。考虑到这一点，没有任何明确或明显的敏感性可以排除在事后 60 年被披露的他们的身份或涉及他们的记录。

419. 上述分析强调，为数有限的会员国的积极合作仍然是必要的，以确保充分查明和说明潜在的相关信息。一个合理的期望是，充分的透明度和披露源自充分的合作和最大限度的参与。以下建议是在考虑到这一点和其他调查结果的情况下提出的。

六. 建议和结论

A. 建议的依据

420. 大会在一系列决议中授权继续寻找悲惨事件的全部真相。同往年一样，已根据本任务规定审查了数千页记录，进行了法医检验，并咨询了专家。虽然对事件有亲身了解的人数逐年减少，但查阅保存相关信息的私人档案的机会却不断增加。

421. 正如 2019 年的报告所指出的，从一开始就有各种围绕这件事的混淆视听的理论和指控。正在进行的工作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摒弃各种未经证实的阴谋论和说法。2015 至 2022 年期间，这些指控的证明价值为无，甚至很弱，就证明了这一点。对于 SE-BDY 号飞机最后悲惨时刻发生的事情，只剩下有限的几种假设。如果可能的话，所有合理的进一步努力都应该继续下去，直到那些能够被排除的假设得到排除。

422. 虽然搜索工作促使某些事件变得清晰，并趋向于对事件更完整的了解，但全面的披露还有待实现。如果说有信息能向我们揭示更多关于坠机原因，那么最有可能的信息仍然存在于少数会员国的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中。这些会员国仍有必要准确确认是否存在任何相关材料。这就要求，如果说不存在相关材料，则应确认搜索的确切细节，并提供毫不含糊的答复，全面回应所提出的询问。如果每个主要会员国都能够作出明确和毫不含糊的声明，可以载入历史记录，表明它从未创建、持有或了解没有直接向本次调查披露的相关信息，那么这将使大会能够有信心地决定前进的道路。

423. 只有本组织所有会员国真诚合作并充分披露情况，才能适当地促进集体寻找真相，哈马舍尔德及其随行人员正是为本组织献出了生命。如果在充分了解这一悲惨事件方面取得意义深远的进展之后，由于某些会员国极有可能掌握未被披露的相关信息，那么本任务将被打乱或辜负，这对大会 2014 年重新审议这一事项的正当目的是否有帮助就成问题了。

424. 当所有真正的披露努力都已完成时，到那个阶段再以公正和冷静的方式对最可能的假设作出结论才是合理的，即使了解的情况仍然存在差距。然而，如果很明显，相关事项仍有一些重要的具体差距有待填补，重要信息仍未披露，则很难建议了结此事。

B. 建议

425. 我提出五项相互兼容的建议。

426. 首先，我建议联合国任命一名独立人士，继续根据知名人士目前的任务开展工作。如前所述，2020 至 2022 年期间，大多数新信息是由个人而不是会员国确定和提供的。尽管动态发生了这种变化，但本报告中分析的新信息仍然有助于我们对事件的全面了解。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还存在更多的相关信息，需要继续努力与主要会员国接触，鼓励全面披露信息。为此，我建议任命一名独立人士继续开展这项工作，包括就本报告所述具体项目采取后续行动。

427. 第二，我建议再次敦促关键会员国任命或重新任命独立的高级官员(独立任用人员)，以确定其安全、情报和国防档案中是否存在相关信息。尤其是(但不限于)鼓励南非、联合王国和美国视情况任命或重新任命真正可以说是独立高级别人员，按要求进行搜寻。根据最近的进程并在此基础上，独立任用人员应获得一切必要的独立性、许可和资源，其部分职责应是全面了解当前的信息，包括审查独立小组自 2015 年开展工作以来向大会提交的报告(如上文第一.C 节所列)。

428. 根据本报告，可以确定 1961 年该区域有大量外国情报机构和人员。从这些机构和人员的记录中几乎没有得到任何信息。他们的记录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潜在信息来源，因为收集情报是他们任务的核心。因此，独立任用人员必须获准并能够全面审查有关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以确定他们是否掌握有助于了解 SE-BDY 号飞机坠毁情况的信息。在向秘书长报告结果之前，每个关键会员国都应有机会要求不公开披露具体信息。即使发现相关记录，但当时无法披露，那么确认这些记录仍将对历史记录作出重大贡献。

429. 第三，如果要继续开展工作，我建议酌情鼓励所有会员国向独立人士提供协助。如本报告所述，会员国应知名人士的请求，自愿提供资源，协助完成需要完成的具体任务，从中获益匪浅。这方面的例子包括瑞典进行的法医分析和津巴布韦进行的研究的某些方面。寻求任何此类协助的结果应以中立和实事求是的方式通报，并在通报秘书长之前进行独立评价。

430. 第四，我建议，任何进一步的任务规定都应提议就会员国是否遵守大会提出的进程得出结论。目前尚不适宜断定是否可以因某些会员国不合作或部分合作而作出任何推论。然而，大会对这一问题的审议可以提供框架，以确保这一进程有一个具体的终点。

431. 第五，我建议联合国继续努力，通过专门的在线资料集，公开有关达格·哈马舍尔德调查的关键文件。联合国已主动创建一个关于这一议题的专门在线资料

集。作为今后的一个优先事项，应公开联合国与这次调查有关的记录和档案，包括哈马舍尔德委员会、独立小组和知名人士各自审议的源材料，以提高透明度。与我的第三项建议有关，这可能是一个联合国以外的协助可以提供额外好处的领域。

432. 与此相关的一点是，没有任何会员国在保密条件下向知名人士提供记录。如果今后提出这些条件，那么，在本组织与有关会员国今后作出安排的前提下，这些条件应得到适当尊重。

433. 时光流逝并没有降低这件事对 SE-BDY 号飞机遇难者家属的重要性，他们是为联合国的崇高目标而牺牲的。对本组织本身来说，对历史的真实交代也同样重要。我的评估仍然是，存在具体和重要信息的可能性极大，但少数会员国没有披露这些信息。

434. 即使在事件发生 60 年后，缺乏全面信息披露是阻碍对这一悲惨事件的原因得出明确结论的主要障碍。透明度不需要附带任何过错的分担，这从来就不是这次调查的任务和目的。相反，这一过程是寻求解决和结束。我们承认，自 1961 年的背景和事件以来，世界已经完全改变，但对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来说，每个会员国提供必要程度的合作披露，使我们能够最终最终能够找到全部真相，这一点仍然非常重要。
